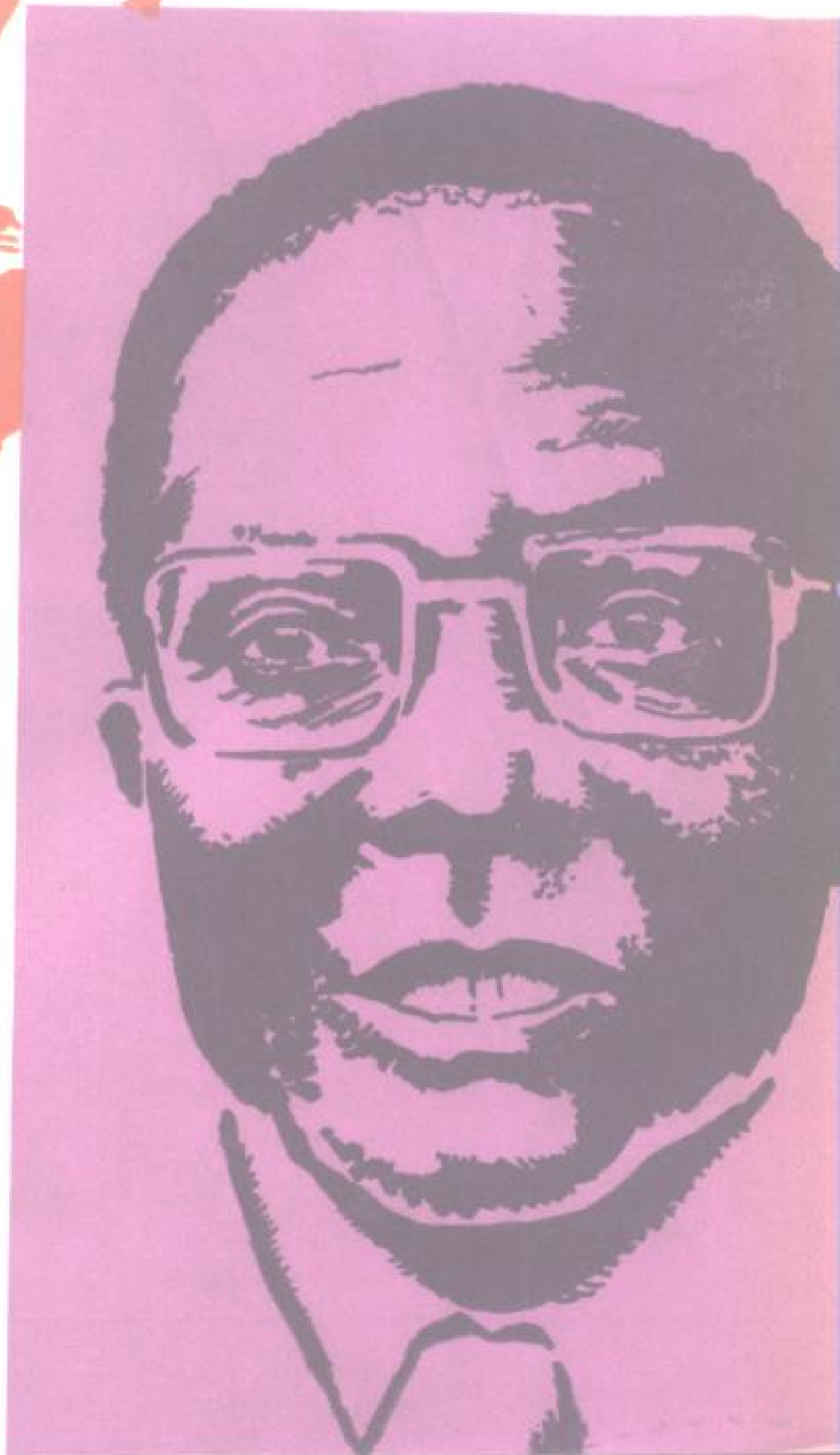


[英] 戴维·史密斯 科林·辛普森 伊恩·戴维斯 著

# 杰出的津巴布韦人

## ——穆加贝



世界知识出版社

## 译者的话

1980年4月18日，位于非洲大陆南部的津巴布韦正式宣告独立。这是津巴布韦历史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9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终于结束，津巴布韦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在殖民统治时期，这个国家的名字叫“罗得西亚”，它是以白人殖民主义者罗得斯的名字命名的。独立之后，非洲人把国名改为“津巴布韦”。他们喜爱这个名字，因为它是非洲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的象征，它是非洲人的骄傲。

在盛大的独立庆典上，一位神采奕奕的非洲人在万众欢呼声中庄严地点燃了独立火炬。他就是独立的津巴布韦共和国的首任总理罗伯特·穆加贝。这位出身贫困的非洲人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和评论。然而由于长期来罗得西亚殖民当局的新闻封锁和污蔑歪曲，外界对他不甚了解，甚至有不少误解。传记《穆加贝》以丰富和翔实材料，较全面而又客观地描述了穆加贝从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转变为津巴布韦民族独立斗争领袖的成长道路，以及他不畏艰险、排除各种困难和干扰、坚持进行反对殖民统治和种族压迫的武装斗争、最后赢得津巴布韦民族独立的战斗历程。该书还适当介绍了穆加贝的出身、个性和家庭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它对于读者了解和研究穆加贝的成长过程以及津巴布韦的民族独立斗争，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书中有些地方过于突出穆加贝同恩科莫的矛盾，过分渲染了英国外交

大臣卡林顿在解决罗得西亚问题时的作用。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和叙述也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了新华社叶进同志的许多鼓励和指教。叶进同志还冒着酷暑，在百忙之中校阅了译稿，在此谨表衷心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为使读者阅读方便，中文本中的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 作者简介

本书由英国戴维·史密斯、伊恩·戴维斯和科林·辛普森三人合著。

戴维·史密斯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进入路透社工作，担任该社驻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记者。1978年转入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工作。作为该公司的记者，他在非洲各地进行了广泛采访。1979年，他负责报道了在伦敦兰开斯特大厦举行的罗得西亚制宪会议，接着他到索尔兹伯里去，报道了罗得西亚的停火和导致穆加贝上台的大选等。

伊恩·戴维斯原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高级编辑，现在《墨尔本时代报》任职。

科林·辛普森自1964年以来一直担任《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特约记者。他是英国几本畅销书的作者。

三位作者为了写好这本书，广泛深入地采访了熟知穆加贝情况的人士，包括穆加贝的母亲、夫人和最亲密的助手，并设法查阅了英国几家著名报刊关于罗得西亚民族独立斗争的大量内部资料。

# 目 录

<b>第一章</b>	<b>自我认识</b> .....	( 1 )
	我长大以后.....	( 1 )
	形成自己的思想.....	( 7 )
	在加纳浮想联翩.....	( 15 )
<b>第二章</b>	<b>斗 争</b> .....	( 19 )
	唤起激情.....	( 19 )
	决心.....	( 24 )
	遭逮捕.....	( 41 )
	民盟诞生.....	( 45 )
<b>第三章</b>	<b>狱 中</b> .....	( 47 )
	铁窗生活.....	( 47 )
	拘留所里的学习班.....	( 50 )
	萨丽的援助.....	( 56 )
	会谈.....	( 59 )
	获得自由.....	( 69 )
<b>第四章</b>	<b>流 亡</b> .....	( 73 )
	内部矛盾.....	( 73 )
	撤退 流亡.....	( 77 )
	寻求国际支援.....	( 83 )
	反妥协.....	( 85 )
	和谈.....	( 90 )

	斗争新阶段.....	( 99 )
	领导地位.....	( 101 )
	形势变化.....	( 110 )
	人民风暴之年.....	( 114 )
<b>第五章</b>	<b>兰开斯特大厦</b> .....	( 123 )
	制宪会议.....	( 123 )
	政策.....	( 129 )
	穆、恩矛盾.....	( 136 )
	争得合法地位.....	( 140 )
	突破.....	( 150 )
	马谢尔的忠告.....	( 156 )
<b>第六章</b>	<b>期 待</b> .....	( 159 )
	竞选战略.....	( 159 )
	真正的敌人.....	( 170 )
	克服“左”的倾向.....	( 175 )
	阴谋.....	( 177 )
<b>第七章</b>	<b>大 选</b> .....	( 183 )
	终于回国.....	( 183 )
	竞选.....	( 196 )
	投票.....	( 206 )
	转折点.....	( 208 )
	获胜.....	( 213 )
	生命线.....	( 218 )
<b>第八章</b>	<b>新 生</b> .....	( 221 )
	新生的国旗.....	( 221 )
	压力和考验.....	( 223 )
	求实精神胜利.....	( 229 )

# 第一章 自我认识

## 我长大以后

下雨季节，地球上恐怕找不到比这里更叫人诅咒的地方了。

一下雨，从这里到八英里以外的冷僻的火车站只有一个办法——徒步穿过浓密的丛林和高高的大象草。据说，狮子常在这一带觅食。这地方与索尔兹伯里相距不过五十英里，却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时代。

这段路需要走上半天时间，最后，你会见到一座哥特式教堂、一个原始的诊所和一片潮湿黑暗的棚屋。

这地方便叫库塔玛。库塔玛(其实际意思是“迁移”)是按照当地一位黑人领袖的名字取的名。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将他自己和他管辖的人统统皈依了基督教。作为报答，耶稣会在库塔玛建了一个传教站、一所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后来，师范学校因为它所培养的男女学生有出息而名声大噪，闻名罗得西亚全国乃至整个非洲。

耶稣会拘泥于礼仪：不是每天举行弥撒、每周举行忏悔，就是每月检查学生的进步情况。对于那些读完初级小学的男孩和女孩，神父还为他们安排了一种独特的毕业典礼。典礼在学年的最后一天举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文化教



育就此为止了。举行毕业典礼时，每个学生都要站到学校的讲台——一个用木头临时搭起来的平台上，当着老师和家长的面宣布他（她）一生立志从事的工作。学生们依次走到讲台中央，用两句诗结束他们的讲话：

“当我长大成人后，如果我能够，我将当一个……”

有些学生披着牧人的斗篷、拿着牧人的鞭子走上台去；有些学生拿着木匠的锤子和锯子、或者伐木工的斧子走上台去。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有个小男孩身穿长袍、头戴学士帽走上了讲台。他的这套服装，是从在传教站工作的父亲那里悄悄借来的。台下的人看着他这副打扮，不禁全都抿着嘴轻声发笑。只见小男孩大大方方地走到讲台中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朝着众人宣布道：

“当我长大成人后，如果我能够，我将当一名教师。”

这一年是1938年。这个小男孩的名字叫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

据有些人说，库塔玛传教站的创建人——一位名叫让—巴蒂斯特·卢别雷的法国人，是在大战初期被调到罗得西亚的，因为早先他在葡萄牙人统治的东非任职时，爱上了那里的一位姑娘。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么，耶稣会认为他在库塔玛的工作已经弥补了他当初的风流罪过。

在卢别雷神父和他的非洲人助手约瑟夫·达姆巴扎掌管库塔玛传教站时，他们采取了近乎修道院式的刻板做法，要想按照非洲人的风俗行事几乎不可能。卢别雷神父和他的助手都笃信，他们一生的使命，就是把尽可能多的黑人送往天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卢别雷神父指令库塔玛人把外部世界看作是罪恶的地狱，告诉他们唯有通过始终不渝的祈祷才

能获得赎救。罗得西亚著名历史学家劳伦斯·范姆贝把库塔玛传教站早期的气氛与法国卢尔德朝觐时期的情形相提并论。库塔玛村的保护神是利西乌克斯·特里萨（意即“小花”）。村民们对她非常虔诚，有时在祈祷中干脆用她的名字代替圣母玛利亚。

库塔玛人的那位最著名的儿子之所以在以后的年月里，坚持要他的人民实行“非洲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时期库塔玛人的非洲生活方式，被传教站消除得太严重了。卢别雷神父甚至强迫妇女穿上高领衣服、长筒裤子，把全身统统遮盖起来，一丝不露。库塔玛人的精神媒介——代表了祖先的意志、人们在战争时期为寻求精神指导和保佑所需要的贤人——不是被皈依，就是被放逐。从传教站创建的那一天起，库塔玛人每天事无巨细，都免不了要为拯救整个人类、尤其是当地居民祈祷和告诫一番。

有一个人觉得库塔玛的气氛太沉闷了。他就是传教站的木工加布里埃尔·穆加贝。他喜欢象闯江湖的手艺人那样，过一种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他在1934年告别了传教站和自己的家属，只身外出寻找木工职业去了。他先是到了布拉瓦约，后来又辗转到南非的矿区，一去没有复返。据说，他在外面又娶了一个媳妇，库塔玛的传教士们为此感到很懊恼。加布里埃尔走后，很少很少——如果不说从来没有的话——给他所抛下的家庭寄钱。在库塔玛村，加布里埃尔一家是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家里有他的妻子博纳——一个意志顽强的女人，富有强烈和虔诚的基督教思想——和他们的四个孩子：米特里·拉斐尔（最大的）、罗伯特·加布里埃尔、唐纳德和最小的萨比纳。在父亲出走那年，老大米特里因为吃了有毒的玉米，可怜巴巴而又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余下的三个男孩都受到了一种传统的和积极的非洲教育。他们懂得自己去尽早谋生，并为家庭的其他人挣钱。他们帮助外祖父放牛，到池塘里钓鱼，很难得到沼泽地附近的森林中去玩耍。沼泽地里雾气腾腾，疟蚊——一种会引起致命疟疾的害虫——横行。即使天气良好，这块糟糕透顶的地方上空也弥漫着奎宁味。

年轻的穆加贝受到的是传教站的禁欲主义思想的熏陶，但他并没有丧失他应有的理智。在家里人和朋友面前，他曾不止一次地避免按照传教站神父的那种非常极端的教导行事。他不喜欢卢别雷神父所提倡的、称城市里的白人实利主义者为“姆博加”——马肖纳语中“狗”字的错误发音——的思想。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0年，卢别雷神父去世了，接替他的是一位出色的爱尔兰人——奥黑神父。他上任后，开始改变前任的那一套“符咒”，逐步把库塔玛引入了20世纪。

奥黑神父给库塔玛村和库塔玛人民带来了一场革命。他将自己的一大笔财产贡献给了他领导的传教站。奥黑神父先是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以补充原有的初等教育学校，后来又办起了一所技术学校。索尔兹伯里白人政府企图给他设置障碍，他们积极反对对非洲人进行任何比较高级的教育。在白人政府拒绝帮助他建造一座医院的情况下，奥黑神父没有退缩，他用自己的钱建起了医院。奥黑神父对白人的藐视和反抗精神使他赢得了一个年轻的追随者——穆加贝。作为回报，奥黑呕心沥血地培养这个小男孩。在1970年他逝世的前不久，他已经意识到穆加贝日后将是一个“具有出类拔萃的思想和心灵的人”。

穆加贝9岁那年，有一天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几

乎最深刻的印象。那是1933年的一天，新当选的总理戈弗雷·哈金斯亲临库塔玛视察。总理还带上了来自伦敦的高级专员奥基夫先生。

奥黑神父因为要为他的传教站筹集资金，设法说服了总督塞西尔·罗德韦尔也去了库塔玛。这是库塔玛开天辟地第一次经历这样一个日子。在此之后，它也只经历了一次——1980年6月，穆加贝作为总理凯旋而归。

学校为贵宾们举行了一场演出。歌咏队唱起了颂歌。学生们午餐时竟然吃到了肉。奥黑神父为了筹措建造医院的资金，竭力进行疏通。这一带共有10,000平方公里，可是居住在这里的非洲人竟然连一个小小的诊所和药房也没有。

罗德韦尔总督对奥黑神父说道：“您干嘛去为一所医院犯愁，这个国家的非洲人毕竟太多了！”

奥黑神父对总督的这句评论决没有原谅，也没有忘记。穆加贝亦是如此。

但是，医院终于建成了。它使库塔玛成了广阔的兹怀姆巴地区人民的中心。奥黑身兼两职，既是神父，又当医生，夜以继日地工作，照顾病人。这使他几乎没有时间、或者说根本无暇再去履行他在精神方面的职责。没有多久，卢别雷神父所制定的那一套严厉的宗教纪律开始土崩瓦解了。男人纷纷开始酗酒，暴力重又成了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懒惰和自我毁灭故态复萌。对于这一切，年轻的穆加贝也始终没有忘记。

甚至在卢别雷神父主持工作期间，库塔玛传教站就收到来自索尔兹伯里<sup>①</sup>的日报，并鼓励非洲学生阅读这些报纸。

---

<sup>①</sup> 即今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译者

现在，奥黑掌管下的传教站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一到晚上，男学生们便聚集在奥黑的办公室外，从他的收音机里收听国际新闻。这时，学生们时常会问：“希特勒是谁？墨索里尼为什么要入侵阿比西尼亚<sup>①</sup>？”他们甚至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教皇为什么要象报纸上的照片所显示的那样，为前去阿比西尼亚征战的意大利士兵祝福？”“佛朗哥元帅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西班牙赢得战争（作为天主教徒，他们支持民族主义者）？”

奥黑神父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形势的发展情况，从不让他们在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什么看法的问题上有任何疑问。这批学生中年龄最小的那个，总是站在背后，几乎一言不发，只是说他不喜欢希特勒。

当时，穆加贝在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但奥黑神父到库塔玛之后没有两年，就注意到了这个孩子，并在脑子里对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是因为穆加贝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或者在家里孝敬母亲，总是陪着她上教堂。而最主要的是如奥黑神父所说，这个孩子踏踏实实、认认真真，“非同一般”的严肃。在奥黑神父的帮助下，穆加贝在班上一马当先，几乎超过了所有同学。“我们全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穆加贝当年的一位朋友、现在已经在一所小学担任校长的戴维·加威回忆道，“他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孩子，虽然他比我小三岁，却只比我低一个年级。

“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比别人年龄小，个儿又矮的缘故，他似乎有点儿不合群。我记得他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活

---

<sup>①</sup> 即今埃塞俄比亚。——译者

动或学校的其它游玩，看上去总是喜欢独自一人。”

六年小学教育结束后，奥黑神父又为他提供机会，让他再到师范学校学习。穆加贝自己乐意去，因为他在前几年就已作出了这一决定，无奈家里对他有压力，希望他接替父亲，或者学一门手艺，或者去当农民，以供养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但若穆加贝进入师范学校继续学习，他家那点微薄的收入就会更加紧张。他母亲的唯一收入来自于教村上的女孩子们学习《教义问答手册》。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穆加贝母亲的信念：当奥黑神父告诉她，他非常想让罗伯特·穆加贝去深造、培养他成为一名教师时，她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她表示，不管家庭将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要让罗伯特去上师范学校。后来，奥黑神父用自己的收入，为罗伯特提供了一份奖学金，其余费用则由穆加贝那位当农民的外祖父承担。穆加贝还在小学毕业典礼上公开选择今后以教书为职业，表示“如果我能够……”的时候，就已想到了今后他将面临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终于解决了。

几年后，奥黑神父说：“我什么事也不会隐瞒他，因为他对其他孩子有影响。没有多久，他就已经在指导他的同学怎样教学了。”

## 形成自己的思想

在以后的两年里，穆加贝学习了很多东西，而不仅仅是掌握了教书的本领。他第一次开始形成他自己的思想，——先是从耶稣会那里吸取各种各样的思想，然后把它们改变为符合他自己的思想。如今，他一定会这样说：“我是耶稣会



培养起来的，我对此不胜感激……我从他们的教育中得益甚大。”

奥黑神父与他的前任不同，他领导的传教站没有宣扬“地狱和天罚”那一套教义。他们宣讲的基督教义要宽容得多，目的在于使非洲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成为“基督教徒”。

奥黑神父甚至对库塔玛人讲，如果他们觉得做弥撒没有什么意思，可以不参加。这种进步思想是卢别雷神父所决不会赞同的。

而且，在罗得西亚乃至非洲的其它地区盛行着种族歧视的时候，库塔玛传教站竟然把人人平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加以宣扬。白人神父与当地黑人打成一片，生活在几乎把一切——从食物、机器到文化教育——都寄托在他们身上的黑人之中，他们享受的特权可谓寥寥无几。奥黑神父一直在为实现他的目标——成为库塔玛人中的一员——而坚定不移地努力。

久而久之，穆加贝从卢别雷神父和奥黑神父的身上、从那一天前去巡视的总理戈弗雷·哈金斯的身上、甚至从他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希特勒的身上得出了结论。虽然当时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这个词，但他梦寐以求的却正好是社会主义。

“在我看来，宗教社团——不管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库塔玛这种情况就属于社会主义。”穆加贝后来回忆道，“由于这样，从那以后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社会主义无疑比资本主义更符合基督教义。”

四十年代中期，穆加贝从师范学校毕业，获得了教师文凭。1945年，穆加贝离开了库塔玛。当时，他已经是一个持



重的青年，就是有点儿性格孤僻。他勤奋、刻苦，求知欲望很强，是一个争分夺秒的读者。他不大喜欢开玩笑。不过，他最大的特点是思想单纯。

离开家乡后，穆加贝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一系列教学工作，但是这位平日斯斯文文、充满热情的青年很少在一所学校连续教二、三个学期。在达达亚传教机构的一所学校里，穆加贝遇到了恩达巴宁吉·西索尔。当时，西索尔已经在追求民族主义政治，而穆加贝却仅仅把时间花在学习和教学上。1949年，已经年满25周岁的穆加贝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上大学的奖学金。

上大学后，穆加贝第一次接受了政治洗礼，第一次体验了非洲的民族主义。

黑尔堡是一所学生全部是黑人的大学，位于南非的好望角。四十年代时，这所大学曾培养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sup>①</sup>中的青年派人士。现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本身正在进行策略方面的大改变：从原先同当局合作的政策，转变为同当局针锋相对的政策。黑人思想上的激进变革，主要是由黑尔堡大学的青年勇士——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所提出的。这时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设法向其成员灌输这种激进思想。在穆加贝进入黑尔堡大学时，当时尚未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大会领导人的纳尔逊·曼德拉、罗伯特·索布克韦和祖卢族“班图斯坦”领导人加查·布特莱齐，以及奥利弗·坦博之类的有抱负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激进分子，正统治着

---

<sup>①</sup>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12年成立，主张“摆脱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民族压迫，”“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南非。”1960年被南非当局宣布为非法。主席奥利弗·坦博。——译者

该校的政治生活。

他们是一股势力。此外，南非耶稣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一股势力。他们不是在那里读书，而是在为各种民族主义会议摇旗呐喊，从中助威。他们向穆加贝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穆加贝事后回忆道。其实，当时他与一个革命者的标准相距还很远，只不过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了解而已。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穆加贝在这个时候还非常象一只蝴蝶。库塔玛培育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黑尔堡大学有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猛烈的革命宣传，实现多数黑人统治的梦幻和对非洲同胞现状的憎恨。不仅如此，在黑尔堡大学的学生中，还有着对“圣雄”甘地的极端崇拜。甘地在印度开展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使他成了他的诞生和成长之地——南非的青年民族主义者崇拜的对象。

蝴蝶虽然已经从蝶蛹中脱离了，但给青年穆加贝带来温暖，使他的翅膀逐渐变硬。太阳不是革命，而是甘地所宣传的、具有更大吸引力的非暴力思想。

穆加贝自己在回顾过去时，把在黑尔堡大学度过的几年，看作他生活中的“转折点”。他在这个时期坚定了反对戈弗雷·哈金斯的一切主张的信心。当然，这时罗得西亚已经出现了公开反对白人的行动。

“在我离开黑尔堡大学时，我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目标。”穆加贝回忆道，“我来自一个大多数黑人已经接受了欧洲人统治的国家。我们中大多数人认为，我们所要努力的是消除我们在这种统治制度中遭受的苦难。黑尔堡大学之后，我思想上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变化。

“我彻底反对……但我当然还是回到了罗得西亚，在欧洲人统治的制度下教书。”

穆加贝依靠他获得的文学博士学位，在乌姆武马附近的德里风特恩传教站找到了一个工作。他在黑尔堡大学学习的最后阶段里，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但是，他回国以后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因为他想在教育方面再攻读一个学位。在取得这个学位时，他已经调到圭洛的一个传教站的学校任教。

穆加贝在圭洛遇到了他在库塔玛时候的老朋友利奥波德·塔卡维拉。穆加贝在库塔玛上学时，塔卡维拉在那里的传教站接受教士职位方面的训练。塔卡维拉虽然要比穆加贝年长几岁，但他对小穆加贝却以朋友相待。这时，塔卡维拉也在传教站教书，他已经放弃了当教士的理想。他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在于政治。

由于塔卡维拉在穆加贝真正成为民族主义的领袖之前就死去了，所以他对穆加贝的影响始终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承认。塔卡维拉是一个精力罕见、个性最吸引人的人。他能够猛烈抨击罗得西亚在种族问题上的不公平，但他同时又总是相信人是善良的。不管是对黑人同胞还是对白人，他都采取这种态度。他离开了神学院，因为他认识到通过教会，并不可能纠正对非洲人的不公平。他觉得，拯救黑人并不意味着拯救他们的灵魂，而是要废除各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法。他认为，正是这些法律，使得非洲人无依无靠，成为他们自己的最不利的特征，和白人统治制度的受害者。

对于当时尚在寻求一种哲学、尤其是在埋头钻研教学业务的穆加贝来说，塔卡维拉可谓是政治上的导师。正是塔卡维拉，第一个帮助穆加贝正确地看待一般的基督教义和卡

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前者是穆加贝在库塔玛的时候学习到的，后者是他在黑尔堡大学接触到的。

后来，穆加贝向伦敦的一家邮购公司发函，购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甚至购买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此外，穆加贝还开始参加诸如“摩羯宫<sup>①</sup>协会”之类的种族混合团体的会议。

摩羯宫协会是由英国陆军上校戴维·斯特林创建的。此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北非征战中的英雄。二次大战后，斯特林来到了罗得西亚。他在那里发现了“假天堂”，这使他着实大吃一惊。于是，他发起和建立了“摩羯宫协会”，作为把黑人和白人结合到一起的一种方式。他希望通过磋商，建立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政府，共同享有经济和政治权力。他认为，这样也许能避免发生他在早先就担心的流血冲突。但是，这位陆军上校最后失望了。他的计划需要欧洲人正视他所看到的现实，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一对名叫盖伊和莫利·克拉顿—布罗克的英国夫妇也严重地卷入了最初这一系列旨在种族和解的尝试。盖伊时常在非洲教师中组织讨论。实际上，他从第一次和塔卡维拉一起参加讨论会起，就记住了穆加贝这个人。

“他那清楚的表达能力和广泛的阅读令我吃惊，”盖伊回忆道，“他既不喝酒，又不抽烟。不错，有时候他似乎有点儿象一条冷冻鱼，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年轻人。他几乎不愿从他自己设置的条条框框中显露出来。

“他的兴趣相当广泛，可以象纵谈政治那样轻松自如地

---

<sup>①</sup> 摩羯宫，黄道12宫的第10宫。古人为了表示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把黄道分为12段，叫黄道12宫。——译者



谈论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或宾·克罗斯比。特别是，他有着一种压倒一切的求知欲。”

退休教师艾尔弗雷德·诺坦贝尔特在盖伊·克拉顿—布鲁克在鲁萨佩附近的传教站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了穆加贝之后，即对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诺坦贝尔特原在南非教书，罗伯特·索布克韦便是他的一位学生。他仿佛是青年民族主义者的鉴定人。“穆加贝参加的讨论比其他任何人都多，”诺坦贝尔特回忆道，“他知道他在谈论些什么，他会无所畏惧地接过别人的话题，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们并不直截了当地谈论政治——这在当时是忌讳的——但是你可以说我们中间有一个青年人，对于黑人的进步需要什么有着远见卓识。”

如果穆加贝在会议上不能谈论政治，他就有时在教室里谈。在5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里，他总是带着介绍肯尼亚民族主义者乔莫·肯雅塔等人的剪报去上课。而且他总是对他的学生们讲，肯尼亚正在发生的一切必定也会在罗得西亚发生，只不过是迟早而已。

但即使是对于象塔卡维拉这样的朋友，穆加贝也始终显得有点儿不可思议：他在内心里和思想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就是不公开表态。有些人，包括塔卡维拉在内，觉得穆加贝在传教站当教师，简直是糟塌自己的才华，他们不遗余力地劝说他，甚至责问他：“象你这样有文化、有才能、而且又有信念的人，既然可以加入到索尔兹伯里非洲青年理想主义的洪流中去，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埋在边远的传教站的学校里呢？”

他们奚落穆加贝，说他是在支持和维护他声称鄙视的制度。每每如此，穆加贝总是回答他们说：他还没有作好准备；



在作好准备之前，他打算继续在这种制度下工作。

实际情况是，穆加贝在这个时候几乎无暇顾及民族主义战士发起的斗争和采取的强硬路线。

在这批劝说者中间，有一个人对穆加贝十分了解，他就是詹姆斯·契克雷马。他是穆加贝在库塔玛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卢别雷神父的助手约瑟夫·达姆巴扎的儿子。这时，他正在成长为索尔兹伯里非洲人抗议白人运动的一位领袖。契克雷马比穆加贝大三岁，在穆加贝之前就到南非上大学去了。他在那里与共产党过往甚密。1948年，南非当局将他驱逐出境后，他回到了索尔兹伯里哈拉雷区，发动黑人支持他的激进思想。这时，契克雷马的共产主义思想已发展到毫无保留地反对库塔玛所主张的一切，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不为教会所容忍。

穆加贝不能接受契克雷马的做法。当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尚在孕育之中，与他的基督教信仰还不矛盾。穆加贝也可能赞同契克雷马提出的目标——剥夺白人的权力，实现多数黑人统治，但他不能支持契克雷马的斗争方式或斗争哲学。

1955年，穆加贝转移到赞比亚教书和学习，准备攻读他的第三个学位。他之所以离开罗得西亚，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自己与契克雷马纠缠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想多挣一些钱。这时，他比以往更加专心致志地刻苦读书，在所有见过他的人看来，他似乎已经把教书和攻读学位作为他的毕生目标。他几乎不再同罗得西亚人谈论政治，好象他已经放弃对民族主义者生涯的一切追求。

## 在加纳浮想联翩

但是，加纳使穆加贝改变了这一切。穆加贝是在1957年秋天转到那里去的。他虽然闭口不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采取了这一步骤，但毫无疑问，他是有人邀请去的。

当时，加纳即将获得独立，这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中还是第一个。加纳民族主义领导人、不久成为加纳首任总统的克瓦米·恩克鲁玛邀请其他国家有文化的非洲人前去他的国家工作、学习和讲学。这不仅是因为恩克鲁玛需要他所能找到的全部人才，而且还由于他相信这些人在其年轻的革命的熏陶下，将会找到实现他们自己国家独立的途径和方法。恩克鲁玛希望整个非洲都把加纳视为榜样。

加纳这个榜样，激起了穆加贝和所有同他一起去那里的人浮想联翩。据当年和穆加贝一起在加纳工作的一位罗得西亚人回忆，他们在那里度过的日子，是激动的和兴奋的。

“加纳人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说道，“但是他们自由了。直到今天，我对我在那里的第一次访问——时间与罗伯特·穆加贝的访问大致相同——记忆犹新。

“最初，我只是想亲眼看看那些当了总理和部长的非洲人。激动之余，我发觉这些非洲人大多与我在索尔兹伯里的非洲朋友并无什么区别，可是我那些朋友所能得到的机会，却只有在加纳的十分之一。

“而且，非洲人不只是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他们还在被任命为公司的经理、学校的校长或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我和其他人一样，带着决心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结束白人阻挡我们的信念，回到了罗得西亚。”

穆加贝十分喜爱加纳这种焕然一新的环境。“我是作为一个冒险者到那里去的，”他说：“我想看一看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究竟是啥样子。

“然而，我终于在那里开始发展明确的思想。可以说，正是在加纳，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否穆加贝将他在加纳受到的“教育”，变为他在罗得西亚的政治生涯，目前还是一个容许争论的问题，但他在那里遇到了萨丽·海弗罗恩是毫无疑问的。

萨丽是圣玛丽学院的一位教师。这所学院位于加纳首都阿克拉西部海滨塔科拉迪，穆加贝到达加纳之初被安排在这所学院。萨丽出身于一个从事教学和社会服务工作的中等家庭，其父是圣玛丽学院的农学教师，其母是社会工作者——当地的专职行政干部和职业裁缝。萨丽在和她的孪生妹妹埃丝特从加纳最优秀的中学之一艾基姆塔中学毕业后，便到圣玛丽学院执教。

后来，海弗罗恩一家改变工作，负责接待和照管恩克鲁玛邀请到加纳讲学的非洲人。因此，当穆加贝有一次身上严重烧伤，需要在医院接受治疗时，萨丽时常去看望他。据他们的朋友说，他们俩并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从一种直接的接触开始，然后随着两人相处时间的增长逐步发展为爱情的。萨丽意志坚强，慷慨无私，办事泼辣而又具有少见的沉着冷静。穆加贝后来意识到，他需要这种沉着冷静。因为多年来正是萨丽磨砺了他的政治天性，使他如今成了一个全面的政治家；正是萨丽，使他具有了钢铁般的意志和灵魂。

如果有人逼着，萨丽会说她之所以爱上穆加贝，是因为他具有男子汉那种特有的温柔和诚实。而穆加贝呢，则会假惺惺地试图说得更确切一些：“我之所以同加纳女人结婚，

是因为她们不让男人什么活都干。”

萨丽一家在许多年里，以一种别人很少采用的方式，逐渐认识了穆加贝。初次见面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教师，一个非常不善抛头露面、尚未跨入政界的普通人。后来见到他时，他们已经成为姻亲。他们没有把穆加贝视为游击队的领导人、谈判者和总理。

\* \* \*

一般说来，人们很少能成为姻亲的英雄，但是萨丽一家却始终不渝地钦佩“鲍勃”（他们对穆加贝的昵称）。二十多年来，他们对这个最为谦让的人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

1980年3月，穆加贝在大选中获胜之后，我们采访了萨丽的胞妹埃丝特和她的丈夫科佐·布赫纳。布赫纳先生几乎无法同穆加贝进行比较，他是一位从事食品加工和销售的富商，其经营范围遍及整个西非地区。但是革命家穆加贝和商业巨头布赫纳多年来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科佐·布赫纳说：“鲍勃是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把关怀下层人作为其政治观点的基础，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和他在这方面所见略同，但是在确定怎样为下层人谋取更多的利益时，我们的观点就不同了。譬如，鲍勃主张在津巴布韦建立合作社，而我认为这些合作社收效不大；我赞成把‘糕’做得大一点，而鲍勃则更感兴趣于让所有的人都来做‘糕’。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样做出来的糕也许不会很大。

“我们就是这样既一致又有分歧。”

讲到这里，埃丝特·布赫纳插了进来：“鲍勃非常诚朴、非常令人喜爱，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如果你说的某件事他不同意，他不会以其渊博的知识来使你难



堪，而只会指出他认为你哪里讲错了。即便你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也仍然会听你说。”

“布赫纳先生，您这个资本家如果是在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经商，会不会逃离那里呢？”

“不会的，我不会离开那里！”布赫纳回答说，“穆加贝毕竟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会从麸皮中分辨出小麦来。如果这些年来你留意他，你便会发觉他一直在这样做。”

“谁曾想到，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鲍勃，竟然会同曾经把他当作狗一样对待的伊恩·史密斯谈判？！谁曾想到，鲍勃这个所谓的‘头号恐怖分子’，竟然会让白人参加他的政府？！鲍勃知道他该怎么做，因此谁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到了1960年底，穆加贝觉得他应该回国了。他想让萨丽和他一起去看看他的母亲和家人，然后再结婚。

他们俩对于这一点已经拿定主意，但对于今后究竟是居住在加纳还是生活在罗得西亚则还未作出决定。这一年的圣诞节，穆加贝利用假期，和萨丽一起到索尔兹伯里旅行。

他们虽然在口头上说这次回索尔兹伯里只是为了度假，但实际上两人心心相印，都知道他们是在寻找机会加入民族主义者的行列，并在罗得西亚仿效加纳。

他们没有等待很长时间。



## 第二章 斗 争

### 唤起激情

凌晨2点30分，他们终于来到了索尔兹伯里哈拉雷区的斯托达特大厅。一路上，人群象滚雪球似地越来越多。

至此，群众的情绪一直很高昂，他们载歌载舞，不断高呼全国民主党提出的口号。这些人都是这个立足未稳的民族主义组织的支持者。该组织的领导人刚被当局抓走。

为此，他们发誓要去同总理直接交涉，而且扬言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将游行到索尔兹伯里市中心去示威，迫使当局释放他们的领导人。

游行群众在斯托达特大厅前停了下来。马路对面，站着500名头戴白色钢盔的警察，一个个全副防暴装备——短棍、催泪弹和短枪。警察告诉游行群众，总理埃德加·怀特黑德爵士已答应在早晨接见他们的代表。消息传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欢呼声。最后，游行群众在马路上就地躺下过夜，警察则站在一旁严密地监视他们。

第二天，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逮捕、集会、游行，怀特黑德答应接见游行群众的代表——如闪电一般迅速传遍了哈拉雷区。

这一天，索尔兹伯里市内和周围地区大约有50%的非洲

工人罢工了，其中有很多人还跑到斯托达特大厅去看热闹。到中午时，聚集在大厅外的人群已增加到4万人左右。穆加贝也站在其中，他从加纳回国后只呆了一个月，这时他不过是路经这里，准备返回到阿克拉去。

这一天是1960年7月20日，这天的游行被称为“7,000人大游行”，因为它是从7,000人开始的。至于这次游行的意义有多大，只需看一看以下的事实便会一清二楚：它促使穆加贝终于投身于民族主义运动。

穆加贝回到索尔兹伯里时，并没有打算逗留很长时间，只是想利用恩克鲁玛政府给侨居加纳的非洲教师提供的慷慨的度假条件，回家非常简短地看望一下仍然生活在库塔玛的老母亲。对于穆加贝和萨丽来说，这次回罗得西亚不仅仅是休假，他们还要作为非正式的使节，在回国后向人们介绍加纳的各种成就。

后来，3个年轻的民族主义者——迈克尔·马维马、利奥波德·塔卡维拉和埃德加·特克雷改变了穆加贝的主意，把他留了下来。塔卡维拉是民族主义斗争中的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50年代时一直担任由多种种族组成的“摩羯宫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马维马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已经显示出具有组织会议、游行和集会的才能；埃德加·特克雷是全国民主党青年团的领导人。他们三人力劝穆加贝留在罗得西亚，将才华、知识和文化贡献给民族主义斗争。不料穆加贝还未作出决定，警察就在7月19日拂晓突然搜查了塔卡维拉、马维马和特克雷的家……

这时，穆加贝正挤在斯托达特大厅外的人群之中。他在这一天表现出了领导才能，这可谓是时世造英雄，而并非他自己所悉心追求的。这正反映了他的性格。

埃德加·怀特黑德根本就不想看到游行群众，甚至不愿接见他们的代表。这时，他正在为非洲工人的罢工而大发雷霆。当全国民主党的两位代表前去求见时，他不但拒绝同他们谈判，反而在广播中下令调集一个营的地方警卫部队。最后他又宣布：从现在开始索尔兹伯里各区一律禁止任何集会。游行群众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一切，但他们依然镇定自若，尽管这时警察已开始带来警犬加强他们的阻拦。

下午，游行群众搭起了一个小小的讲台，那些有志于领导斯托达特大厅外象潮水一般涌来的数千名群众的年轻人，相继走上讲台发表演说。穆加贝也应邀站出来讲了话。他被介绍给一个杰出的津巴布韦人——在非洲作过旅行，已获得三个大学学位，而且不想享受他可能向往过的欧洲人的生活。

起初，穆加贝有点儿心情紧张。他首先从加纳的情况说起——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加纳在怎样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他设法让听众赞同他的观点，把加纳看作是其他人学习和模仿的榜样，但这不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听众，似乎都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

然而，当穆加贝谈到他对“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运动的想法时，人们对他产生了兴趣：先是低声议论，接着是一小部分人轻轻地鼓掌，最后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民族主义运动只有以各阶级的成员联合一致为基础，才能取得胜利！”穆加贝说道。

“无论是大学毕业生、律师、医生还是其他人士，都有必要接受选定的领导人，即便他们不是大学生”。

人群中发出了一阵巨大的欢呼，表示赞同，虽然他们有点儿吃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中间居然有一个有文化、有能

力的人，有一个见多识广、可以跻身于欧洲人的社会，并享受其一切特权的人；而且他还表示，要同他们这些穷苦人，没有文化的人和农民并肩战斗。

在多年来看到许多非洲人因为受到欧洲社会（他们的教育，使他们得以进入这种社会）的各种魅力和利益的引诱之后而蜕化变质，穆加贝的到来，使他们不免感到有点儿新奇。

穆加贝从容不迫地站在临时搭起的讲台上，周围的人因此而决定，他们应该继续留在那里，直至政府作出某种积极的反应。

翌日早晨，游行群众终于得到了这种反应：首先是警察挥舞短棍冲入人群，接着是警犬张牙舞爪地扑向人群，最后干脆开着越野车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担任监视的飞机在头顶上嗡嗡直叫，确切地向地面上的警察报告游行群众在向何处分散，从而使得他们成了警察更容易搜捕的目标。

游行群众撤退到了各自的居住地区，但是警察一直追赶到那里。部分群众不得不在马路上和其他地方设置障碍，并向警察和白人的汽车扔石块。

到这一天的深夜，将近130名非洲人被警察逮捕，几十人受伤，其中有些人的伤势很严重。全市各区到处是骚乱时留下的碎石块和乱砖瓦。第二个周末，骚乱蔓延到了布拉瓦约，当地警察毫不犹豫地开枪镇压，结果，11名黑人遭到枪击。

这次“7,000人大游行”（后来人们就是这样称呼的）不仅促使穆加贝成了一位献身的民族主义者，也导致当局制订了也许是最严厉的镇压法律——《法律和秩序维持法》。它大大地增强了警察对付示威者的权力。确切地说，它使警



察获得了为所欲为、不受任何惩罚、甚至不会出庭受审的权利。

对此，不仅穆加贝感到惊愕，就连罗得西亚联邦法院首席法官罗伯特·特雷德戈尔德也觉得太过分了。“这项法案剥夺了人的一切基本权利。”特雷德戈尔德在辞职时说道，“它使得人们对罗得西亚是否是一个警察国家的最后一点怀疑也会被消除。”

这次“7,000人大游行”——随后便提出了《法律和秩序维持法》——使穆加贝极为清醒地认识到，罗得西亚距离他在加纳看到的变革之年和变革之风还很遥远。

穆加贝兴致勃勃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希望看到变革的迹象，至少盼望看到罗得西亚的非洲人，对于自治的前景有更多的认识。穆加贝亲眼目睹了加纳的独立，并亲身经历了黑人管理国家的生活。加纳是非洲其他国家的灯塔，它不仅显示了独立的可能性，而且教育整个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者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一个有着共同事业——实现多数黑人统治——的整体，而不是一盘散沙、在驱逐殖民统治者的斗争中互相孤立的殖民地人民。

再说，穆加贝在加纳已经看到独立和自治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他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并怀着这种信心回到了祖国。

在回国之后的头几个星期里，穆加贝在一系列会议上讲了话，表达了他对祖国的信心和热情。听众始终热切地希望听到有关其他国家的“故事”，穆加贝因此很快成了一名出色的故事员。他在讲述加纳的发展情况时，常爱穿插一些关于加纳人的趣闻轶事（譬如他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总是提醒听众，加纳人与罗得西亚人并非迥然不同。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加纳人在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在加纳没有城市人和乡村人之分，甚至在有文化的人和没有文化的人之间也无很大区别。”

他时常会用手指指着某一位听众，先是问他干什么工作，然后说道：“象你这样的非洲人正在被安排到行政机构或工业部门工作。”

“然而，这里的欧洲人却说我们不能从事这些工作。为什么？”他忿忿不平地责问道。

## 决 心

穆加贝对罗得西亚警察在斯托达特大厅外采取的行动感到深为不安，他意识到罗得西亚不会马上成为加纳，不会吹过变革之风。然而，他同往常一样，把失望和惊愕变成了决心：决心留在罗得西亚，决心加入民族主义者领导的运动——不管它将向何处发展。

在罗得西亚的白人看来，1960年的变革只能意味着变得最糟糕。罗得西亚与英国在东非和西非的殖民地不一样，那些地方的白人主要是商人和行政官员，这里的白人社会则包括农场主、商人和企业家，他们富足有余，自命不凡。虽然他们的人数不多（当时索尔兹伯里共有30万人口，其中只有10万是白人），但按照当时非洲的标准来说，却是属于最高级的。他们已建立起了在非洲算是第一流的生活方式。

此外，白人的人数在迅速增长：1946年时仅有82,000人，60年代时达到了22.3万人。这些白人主要讲英语，其中有一大半人出生在英国。在战后的年代里，他们在英国的朋友和亲戚络绎不绝地迁徙到罗得西亚来，加入了头几批殖民

者的行列。要究其原因并不困难。罗得西亚的欧洲人生活水平很高，他们的平均家庭收入要比在英国高得多，而生活费用却比那里低得多。

罗得西亚气候宜人，生活轻松。许多白人发现生活在这里满不错。倘若回去，成功和满意的机会只会受到限止，这主要是因为战后的英国，他们的技术有限，经济紧张。

当然，白人在罗得西亚的优越生活，是赖以黑人和白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不平等维持的。他们自己是明白这一点的。因此，他们觉得对变革之风作出任何让步，都只可能吹垮他们在索尔兹伯里、布拉瓦约和乌姆塔利等城市，在普拉姆特里、森特纳里和伊尼安加之类的城镇，以及在养牛场和烟叶农场精心拼凑起来的社会格局。

虽然许多白人仍然感到同英国有着亲戚关系，但几乎没有人会平心静气地去考虑一下重新恢复他们抛弃的艰苦和受挫的前景。所以，他们在罗得西亚扎下了根。他们的态度——很少有所开化——变得强硬了，他们那种为统治当地人、进而殖民化而辩护的思想体系，经过磨砺现在又有了新的形式和涵义。它为他们全面控制罗得西亚和为他们所享有的各种舒适——富丽堂皇的大房子、整整齐齐的乡间别墅、侍从、聚餐会、高尔夫球俱乐部内的鸡尾酒会、高级饭馆的宴会——所辩护。如果黑人获得了多数统治，白人就会逐步失去这一切。

在穆加贝逗留加纳的几年间，罗得西亚局势不仅没有象在加纳那样向前发展，反而倒退了，唯有民族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比以前有所增加。非洲人接近权力和政治决策的机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政治完全成了欧洲人的事。虽然关于选举资格的规定，并没有把非欧洲人排除在外，但它

只局限于那些符合特殊要求——既有文化、又有金钱——的人。其结果很简单：选举权实际上给了所有的白人和一小部分黑人，有资格参加选举的非洲人从来没有超过二、三百人。

欧洲人对这种限制性的选举制度进行辩解，他们的理由是：一旦非洲人达到了“高级”和“文明”（意指“收入”和“教育”）水平，就会准予参加管理国家。这样做的结果是非洲人发生分裂。那些受过教育并拥有钱财的人可以在政府机构中任职，可以有机会进入欧洲人的圈子。那些设法获得这种机会的少数非洲人坚持认为，进入欧洲人社会后，——不论哪一级——只会使他们有机会说服白人：所有的非洲人应该享有同等的机会。

50年代时，有些非洲人曾走了这样的道路，参加了当时的总理加菲尔德·托德领导的罗得西亚统一党或摩羯宫协会、种族混合协会和重振精神协会之类的多种族团体，但是最后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产生了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同高雅开明的欧洲人一起喝茶，并不能够给罗得西亚广大非洲人的命运带来很多变化。实际上，早在1958年托德总理因所谓思想开放而被推翻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极少数有文化的非洲人所采取的这种战略，是缺乏远见的。托德试图扩大选举权的范围，但这就象他反对一项正式谋求禁止白人和黑人在婚姻以外发生两性关系的提案一样，对他造成了损害，使他终于被解除了职务。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白人确实正在站稳脚跟。

其实，托德在那个时候并不激进。他经常象腐蚀剂那样对待黑人。穆加贝在学校教书时，就曾同他发生过冲突。托德在一项预算方案中提出，将黑人教师每月3英镑的薪金减

少60便士，穆加贝代表黑人教师，对他进行了挑战。“他是一个极端专横跋扈的人，”穆加贝说，“我正告他，必要的时候我将给他一拳。”不过，话虽这么说，托德至少还给非洲人带来了希望。然而，托德的垮台，和由怀特黑德取而代之，却毁灭了这种希望——而且毁灭了非洲人的信念：只有通过摩羯宫协会这种途径，通过白人所说的“文明的种族间接触”才能取得进展。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托德的垮台，意味着他们必须到别处去寻找变革的途径。据现在穆加贝的政府中担任新闻和旅游部长的内森·沙穆亚里拉回忆，“种族间接触”——在托德被推翻时达到了高潮——的失败，导致了严肃和强硬的民族主义。

“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接触未能得到广大政府官员和白人政界人士的积极响应……我们在底下认认真真地考虑种族平等和人类尊严的问题，而上面的议会却仍然在通过一系列限制性的法律，如《公安条例》，它使政府有权动用军队打击罢工。

“在经过多年的压迫之后，我们希望很快就有成果，没想到我们却继续蒙受耻辱。”

这时，有一个组织为罗得西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它就是非洲民族青年联盟。在托德被推翻时，这个组织已经活动了两年。

民族青年联盟在成立时就发誓要同白人进行对抗，而不是同他们搞合作。

“不要象小孩那样吊在欧洲人的背上，”民族青年联盟主席詹姆斯·契克雷马1956年在哈拉雷举行的成立大会上谆谆告诫道，“还是自力更生吧！”这与非洲人以前在公开谈论政治时所使用的语言大相径庭了。民族青年联盟与以前的



民族主义组织不同，它没有要求欧洲人接受非洲人提出的享有平等权力和获得较好生活水平的要求，而是直截了当地向他们的权力发出挑战。

1956年，民族青年联盟组织了一次抵制将非洲人从黑人区送往索尔兹伯里上班的公共汽车的行动。这条线路的公共汽车，原为黑人所有，后被白人接管了过去，并提高了票价。在哈拉雷区查蒙尼卡广场举行的多年来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民族青年联盟抵制白人公共汽车的行动得到了广泛支持。抵制行动终于奏效了，政府开始提供车贴。

用罗得西亚人的话来说，这是民族青年联盟及其向政府挑战而不是乞求政策的一次伟大胜利。

这一胜利使其他人受到了鼓舞。1957年9月，一个全国性的民族主义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告成立。该组织将民族青年联盟和布拉瓦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合并到一起。后者早在30年代就已诞生了，但后来逐渐变得死气沉沉了。契克雷马没有当选为新成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领袖职务由乔舒阿·恩科莫担任。恩科莫是卫理公会的职业教徒，在1951到1955年间还曾担任铁路工人工会总书记，以善于谈判著称。他是仅有的几位具有学位的民族主义者之一，通过南非大学的函授班学习了经济和社会学专业。他被认为是一个稳健的、走中间道路的人物。他能根据自己的实力向白人挑战，但不会象比较好战的契克雷马可能会做的那样疏远他们。

恩科莫小心翼翼地强调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目标不是推翻白人政权，而是通过向白人施加压力，在白人应该怎样行使权力方面获得几分发言权。

“因此，目前我们的要求是直接参加各地的立法机构和

政府。但我们不是作为乞丐、而是作为懂得自己的权力不可能被白人无限制地剥夺的人民提出这一要求。”

不久，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在城市和乡村赢得支持者。在各部族地区，非洲人国民大会对地方长官在对待黑人时所表现的傲慢和轻蔑态度提出了挑战。当他们企图以防止耕地土质恶化为名，“囤积”土地以饲养耕牛和种植谷物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便对他们采取这种做法的权力提出了质疑。以前一贯以法律的化身为自居的地方长官，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鼓动下，非洲人对地方长官企图象往常那样实行控制进行了反抗。他们详细地报告了白人的所作所为，尔后在法院内对他们的权力提出挑战。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一位名叫乔治·尼安多罗的官员甚至对总理怀特黑德提出了起诉，控告他对黑人滥用《土地耕种法》。

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当局采取了行动，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195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取缔，500名党员遭到追捕，其中有契克雷马和尼安多罗。恩科莫当时因为不在国内，正在开罗寻求支援，所以逃脱了当局的逮捕。

对付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式就这样在罗得西亚确定了。在以后的几年里，这种方式重复了好几次。任何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只要稍稍有一点向欧洲人的权力挑战的苗头，就会马上被取缔，其资金和设备就会被没收，其领导人就会被逮捕。

怀特黑德的政策虽然从来没有正大光明地宣布过，但它却是很明确的。他试图粉碎民族主义运动，同时扶植起效忠于白人的黑人中产阶级。

他自己的说法显然有点儿前后矛盾。起先，他为宣布紧

急状态辩解，声称这是由于黑人居住区一直在发生骚乱才宣布的。事实上，这些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严重的骚乱。在既未发生任何暴力行为、又无迹象表明其政府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怀特黑德又作了另一种解释。

“英国人有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即政府不应急于采取行动对付颠覆运动，直到暴乱和流血真正发生。然而，本政府不赞成这种传统。我认为，如果说南罗得西亚治安部队往往比颠覆分子提前一步行动，这并非过甚其辞。情况已经很明显，倘若允许这帮人继续无限地发展，最后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动乱，甚至可能出现流血。现有法律，不是为对付以推翻一切现存的权力为最终目标的颠覆运动而制定的。尽管许多人已经被起诉，但不久便可清楚地看到，为了有效地对付威胁，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

然而，到了1959年底，怀特黑德深信他的地位已经很牢固，足以释放大多数拘留犯。当时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尚在禁止之中，所以在1960年元旦那天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党——全国民主党。虽然后来成立的党使该党相形见绌，但它在罗得西亚民族主义政治中仍不失为是一个分水岭。

全国民主党不仅仅是在捡起非洲人国民大会所抛弃的东西。恩科莫领导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把重点放在鼓动非洲人反对《土地耕种法》和《土地分配法》中的不合理的东西，而全国民主党则强调宪法改革和政治基础的改革。这时，民族主义者不再要求公平合理地对待非洲人，而是要求取消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各种种族歧视法律的宪法。

全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塔卡维拉在党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不再要求欧洲人好好地统治我们。”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自己支配自己！”

全国民主党人还受到了其它一些因素的鼓舞：象穆加贝这样一批人在陆续返回罗得西亚，带来了有关加纳之类的国家进行社会变革的第一手材料；肯尼亚、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等非洲国家正在迅速走向独立。

没有迹象表明英国准备插手罗得西亚。但是，约翰·肯尼迪在美国的当选，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将必然会发生变化。罗得西亚民族主义者感到，肯尼迪的“新边界”政策的实施，将使美国有可能对殖民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迅速实行非殖民化。

此外，全国民主党还拥有一批有着某种潜力的领导人，如恩达巴宁吉·西索尔、赫伯特·契特波和穆加贝。西索尔在传教机构担任牧师和教师，他对民族主义事业已经作了最精辟的辩解——创作了一本名为《论非洲民族主义》的书；契特波是在传教机构的学校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位黑人律师，他迫使当局对《土地分配法》作了修改，从而使他得以和白人律师平起平坐，在索尔兹伯里开设了律师办公室；穆加贝刚从加纳回国，对黑人赢得并运用“一人一票制”的能力，充满着理想和信心。

穆加贝下定了决心。不，应该说是斯托达特大厅外的群众集会，和随之而发生的骚乱使他下定了决心。几周后，1960年10月，全国民主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穆加贝在会上当选为宣传书记。

几个月后，穆加贝便利用他担任的这个相对说来无关紧要的职务，着手贯彻一项重要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对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持久的意义。

甚至在穆加贝被推选担任党的任何职务之前，他就已经



在为推行这项政策而努力——在库塔玛和(索尔兹伯里)黑人区召开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他的目的是有意识地在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之中注入感情主义的成份。他从在加纳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要使民族主义运动获得支持，就决不能仅仅依靠在文化方面吸引象他这样的人；为了在罗得西亚的所有非洲人中间赢得广泛支持，必须使民族主义斗争变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必须拆除政治活动和所有其它领域之间的藩篱，必须使人民接受政治，而不要在思想上有所顾忌，认为政治与他们毫不相干。

穆加贝唤起了非洲人的激情，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他还通过党的宣传工作，鼓励他们尊重自己的传统。在将近一代人的时间里，非洲人受到的教育是蔑视传统的宗教、舞蹈、食物、衣服、风俗、甚至姓名。穆加贝从恩克鲁玛领导的青年团中获取了经验，在呼吁探索他所谓的“文化根源”的同时，开始组织全国民主党青年团。内森·沙穆亚里拉回顾了当年穆加贝担任青年团的领导之后所出现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穆加贝作为党的宣传书记，着手建立了半战斗性质的青年团。他认为，该组织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武器。青年团逐渐开始影响并控制党的一些活动。震耳欲聋的鼓声、穿着民族服装的妇女的哀鸣和效法祖先的祈祷，开始比以往更加引人注目地成为各种集会的特征。公共会议成了某个黑人区居民的一种盛大的群众集会。集会一般在星期天举行。星期六晚上，全国民主党青年团（它有一个小小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们分头负责各黑人区每50户居民为一组的工作）挨家挨户地提醒居民将要召开大会。星期一大早，响亮的鼓声和小分队的歌声又一次提醒居民即将举行大会，直

至大会正式开始。什么教堂膜拜、美酒和女人，统统让位了。1962年12月3日，全国民主党在海菲尔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证明，人们的激情已经被唤起来了。在大会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时里，每一条道上都可以看到有一条巨大的、盘绕着的黑蛇，在蠕动着身躯，游向海菲尔德中心的西里尔·詹宁斯大厅。大厅内，青年团员们下令与会者把鞋子、领带和上衣统统脱下来，作为抵制欧洲‘文明’的第一种表示。会场上，传统的水桶取代了出售可口可乐的小商亭。当第一位发言者——一位光着脚的欧洲人——走上讲台时，整个广场已经成了一片人海。大约15,000到20,000名黑人兴高采烈，意气奋发。这种集会在黑人情绪上所产生的影响，比之单纯要求管理国家（即普通人参与创造某种新的东西——一个新的国家）要大得多”。

因为穆加贝起初只打算在罗得西亚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所以萨丽在探亲后即已返回加纳。后来，穆加贝写信给她，要求她到罗得西亚来和他一起斗争，并在这里和他结婚。

1961年2月21日，穆加贝和萨丽在哈拉雷一个普通的、白色的罗马天主教堂里举行了婚礼。这是一次正规的仪式，穆加贝穿着他最喜爱的黑色西服，萨丽穿着一身素雅的白色婚礼服，这是她从加纳随身带来的。

结婚之前，穆加贝和萨丽一起接受了教诲。萨丽皈依了天主教。他们已经多年没有上教堂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堂对他们的影响已经消失，这在他们结婚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穆加贝至今还认为，最早使他懂得在上帝眼睛里的人并不分种族、一律平等的道理的是教堂。在民族斗争的初期，只有

天主教会准备站出来捍卫人人平等的原则。

甚至在举行婚礼那天，穆加贝夫妇就已经意识到，他们俩今后未必能在一起。但是，萨丽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此之后，都未曾有过什么疑虑。

她说：“在我去津巴布韦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自己将会袖手旁观，置若罔闻。我心里明白，我到了那里就会参与进去。”

不过，在她和穆加贝互相起誓的时候，她几乎是不可能想到她的卷入，将会使她和穆加贝付出多大代价的。后来，她和穆加贝一样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被监禁，她和穆加贝一起蒙受了两个孩子死在襁褓之中的损失和创伤。在婚后的很多年里，她只能通过来自铁窗背后的书信，了解自己丈夫的音讯。19年后，即穆加贝在1980年的大选中获胜之后，萨丽很简单地说了这么一句话：“结婚19年来，我们夫妇俩只在一起生活了六年。”

在萨丽和穆加贝结婚时，全国民主党正在推行一项新的政策，试图迫使英国约束索尔兹伯里白人政府的极端行为。全国民主党领导人认为，只有英国才能迫使白人给黑人以政治权力。

后来，英国外交部在索尔兹伯里主持召开了一次制宪会议。会议由英国英联邦事务大臣邓肯·桑兹主持。全国民主党作为罗得西亚民族主义者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该党由恩科莫领导，他已经在1960年11月返回罗得西亚。恩科莫、西索尔和契特波在制宪会议上接受的协议，在他们部下的脑子里留下了持久的怀疑。他们不仅怀疑英国人的意图，而且对恩科莫的决心和能力打了个问号。罗得西亚的白人，希望把英国统治的最后一点残迹——英国享有的保

留权——清除干净，因为它使白厅<sup>①</sup>有权否决种族歧视法。而英国方面呢，当时也想在宪法上摆脱同罗得西亚的所有牵连。因此，双方对制宪会议所达成的一揽子交易都很满意。

以后英国不再干涉罗得西亚的宪法事务了。作为报答，白人决定在由65人组成的罗得西亚议会中，给黑人15个席位。倘若照此办理，实现多数黑人统治便变得遥遥无期了。然而，甚至连邓肯·桑兹也感到诧异的是，恩科莫居然接受了他们的这笔交易。

但是，恩科莫手下的人不同意这样做。当时负责指导全国民主党对外关系的塔卡维拉从伦敦发回电报，对此表示愤怒。电报说：“我们完全拒绝关于南罗得西亚宪法问题的协议，认为这是对300万非洲人的前途的背叛。这项协议犹如凶残的魔鬼，将会带来一场灾祸。外部世界对全国民主党俯首贴耳地接受协议感到震惊。我们因此而失去了朋友们和支持者们的同情。除非你采取坚定的立场……前途将意味着无穷的痛苦和艰难。祈求你毫不妥协地谴责和毫无保留地拒绝制宪会议的协议；请求你立即改变目前的立场。300万非洲人的前途，将取决于你立即采取行动。”

在制宪会议结束之后没过五天，全国民主党执委会就举行会议，推翻了党的领导人，同意在宪法上就选举权问题作出全面安排（黑人议员原可据此产生）的决定。会上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不时吵吵闹闹的辩论，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穆加贝在会上严厉地指责恩科莫所做的交易，说它是一种出卖。

---

<sup>①</sup> 伦敦，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人们常用它指英国政府。——译者



早在制宪会议期间，全国民主党执委会就已在穆加贝的坚持下，要求恩科莫和西索尔在会上无论如何要为黑人争得与欧洲人同样多的席位，决不能少于这个标准。穆加贝因此责问恩科莫：为什么会接受这种失败？

恩科莫大为恼火，气呼呼地退出了会场，并嘟嘟囔囔地威胁说要对塔卡维拉和穆加贝采取行动。

3月份，全国民主党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各地区的青年代表表示赞同执委会拒绝关于选举权问题的协议，但他们同意参加就整个宪法问题举行的公民投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想让怀特黑德总理作出让步——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全国民主党成员，取消对乡村集会的禁止。但是怀特黑德拒绝了。于是，全国民主党再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投票决定抵制公民投票。

穆加贝和他在青年团中的同伴们，设想出了逃避法律制裁的巧妙办法，展开了一场抵制公民投票的运动。由于当局禁止在乡村举行集会，他们无法将有关信息传达给居住在乡村的绝大多数非洲人。为此，全国民主党的支持者们根据穆加贝的指示，分头乘上黑人下班回家的公共汽车，在车上举行临时会议。在各部族地区，全国民主党的支持者，把人们召集到丛林中的空地上举行会议。等到警察从附近城镇赶来，会议往往已经结束；如果还没有结束，全国民主党就将集会变成一种完全合法的聚会。

这时，穆加贝不仅引起了恩科莫和全国民主党其他领导人的注意，而且受到了警察特别支队<sup>①</sup>的监视。

1961年4月，广大公众第一次听说了穆加贝。索尔兹伯里

---

<sup>①</sup> 罗得西亚秘密警察的称号。——译者

的报纸报道了“一个名叫罗伯特·穆加贝的人”和警察在索尔兹伯里机场发生的一场激烈争吵。警察指责全国民主党的一位支持者在机场内携带武器。

“我们正在接管这个国家。我们不能容忍你讲这种废话！”穆加贝回答警察说。

这是今后将要发生的一切的第一个暗示。

这一年的7月，恩科莫在伦敦旅行后回到罗得西亚，带回了不好的消息。他在旅行期间，曾同英国一位比较低级的国务大臣——德文郡公爵举行了一次会谈，公爵告诉他，由于英国在罗得西亚有大量投资，英国不会把权力交给非洲人，害怕因此而使政局不稳定。

全国民主党立即作出了反应。没有一个人提到“战争”这个词，但民主党执委会同意采取这样一种战略：使英国在罗得西亚的投资者和各家公司认识到，危及他们财产的，主要是在少数白人统治的情况下，将会不可避免地逐渐增强的政治动乱，而不是非洲人执政产生多变。

后来，全国民主党让穆加贝宣布了“积极行动”的新政策。

“欧洲人必须明白，除非非洲民族主义的合理要求得到承认，种族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穆加贝说道。

与此同时，宣传书记穆加贝还宣布发起一场自我克制运动。他说，实行自我克制，将表明非洲人愿意为实现他们的目的作出牺牲。

黑人进行了有组织的斋戒，并对各黑人区的啤酒店实行抵制。在全国民主党召开的会议上，与会者必须把鞋子脱下来。这种做法被说成是抵制白人习惯的一种象征。

1961年12月3日，穆加贝在索尔兹伯里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对20,000名支持者说：“今天，你们脱下了自己的鞋子；明天，可能会号召你们把这些鞋子统统毁掉，或者号召你们做其它的自我克制动作。”

“如果欧洲人的企业为的是购买武器以对付我们的话，我们就坚决从这些企业抽回劳动力，不去光顾，并捣毁它们。”

对于白人政府来说，这种话已经足够了。六天后，全国民主党即被取缔，党的经费和车辆被没收，领导人在4个月内被禁止在任何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然而，正如穆加贝所说，他和全国民主党对此已经有所准备。这一次与上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取缔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截然不同，民族主义者巧妙地钻了法律的空子，继续进行活动。

全国民主党被取缔之后不过十天，即被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sup>①</sup>（以下简称“人盟”）取代了。人盟执委会的组成，与全国民主党执委会的组成大致相同，它甚至包括了契克雷马和尼安多罗。在195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取缔后，他们一直处于监禁之中。

最初，政府的回答是，扩大它根据严厉的《法律和秩序维持法》所已经拥有的权力。这样一来，谁要是要求别的人加入某个政党，就可能被监禁达十年。

但是，这还不足以阻止人盟象全国民主党以前所做的那样，去扩大人们对它的支持。9个月后，即1962年9月，人盟即被当局取缔了，其领导人被限止活动3个月。

---

<sup>①</sup> 人民联盟简称人盟，1961年12月成立，前身是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党。1962年被殖民当局宣布为“非法”。主席恩科莫被软禁。——译者

穆加贝被遣送到索尔兹伯里郊外大约50英里的一个部族保留地，住在一间黑糊糊的、用洋铁皮作屋顶的小屋里。

英国女教授克莱尔·帕利当时曾看到过穆加贝。“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说，“他最明显的品质是思想严谨。他能够首先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仔细分析，最后将它们一点一点地吸收。

“至于他当时的政治么……我的印象是他并非一位高谈阔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守旧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会把他列为罗得西亚的第四位或第五位高级黑人领导人。”

后来，帕利夫人见到穆加贝召集了一次由党的支持者参加的会议。她说，穆加贝在那时就已养成“集体主义”的作风。后来，这种作风成了他在担任领导时的一个显著特点。

“所有的事情都由大家一起商量解决，”帕利夫人说，“穆加贝本身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主席……非常善于维持会议的秩序，对每一个人都非常公正，注意听他们发表意见。”

但是，穆加贝在这个时期还缺乏担任党的领导的信心（当时人盟因为遭到白人当局的镇压，亟需有人出来领导）。于是，乔舒阿·恩科莫的做法——起先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然后是提出撤离罗得西亚这种糟糕透顶的战略——严重破坏了罗得西亚民族主义者为重整旗鼓而作出的一切努力。

在人盟遭到取缔，其领导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之后，恩科莫离开了罗得西亚。这种情况在195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被拘留后就发生过。恩科莫政治领导的特点是强调国际支援，而不是巩固和加强国内的政治基地。由于这样，他在国际上作为（罗得西亚）民族主义斗争领袖的名声要比他在国内大得多。因为恩科莫在国际上展开活动，经常不在国



内。所以，在罗得西亚其他高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遭到监禁时，他却几次逃避了当局的拘留。

在人盟被取缔、党的领导人被拘捕那天，恩科莫正好在卢萨卡同肯尼思·卡翁达总统进行磋商。卢萨卡是他那次国际旅行的最后一站。他原准备在一、二天之内返回索尔兹伯里。

内森·沙穆亚里拉回忆道：“原以为恩科莫会立即回国把领导权交给他的同事，不料他在犹豫了几天后，竟然不顾赞比亚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劝告，决定开着汽车到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去。”

只是在其他民族主义者向其反复呼吁，人盟执委会的另一位成员恩达巴宁吉·西索尔离开正在参加会议的雅典，乘飞机前去同他会谈以后，他才被说服，承认他应该返回国内和其他人一起对付当局采取的限制措施，从而提供人盟所需要的精神领导。他终于回到了罗得西亚，但是他的优柔寡断和固执己见，使他本人和他领导的人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当局对民族主义领导人实行的“限制时期”结束之前，恩科莫在他的拘留地普拉姆特里附近的索姆夸部族保留地召开了人盟执委会会议。会上，恩科莫提出执委会的所有成员应全部撤离罗得西亚，到国外去建立一个流亡政府。与会者——包括冒着相当大的危险离开“限制区”前去参加会议的穆加贝——一致拒绝了他的建议。

同年12月，正好是在人盟领导人获得自由的时候，怀特黑德政府在大选中被新成立的罗得西亚阵线党<sup>①</sup>击败。该党

---

<sup>①</sup> 罗得西亚阵线党：1962年3月成立，79年参加制宪会议，80年选举获白人20个席位。81年4月分裂部分另组新党，6月改名为共和阵线，主席为伊恩·史密斯。——译者

是由温斯顿·菲尔德、克利福德·杜邦和伊恩·史密斯领导的。在他们看来，即使是怀特黑德政府作出的微不足道的让步，如在学校、医院和居民区取消种族隔离等，也过分了。菲尔德和他的第一届政府在对付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时，甚至比他们的前任更觉得英国式的法律程序太缩手缩脚。这帮人一上台，就对以前的《法律和秩序（维护）修正条例》作了修改。后来，他们又规定对破坏分子必须处以死刑。在通过这一系列修正案时，穆加贝被允许出走。他到了赞比亚，在那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说。

他说，修改《法律和秩序维持法》，等于“为凶杀立法”。他对菲尔德政府将会采取的行动发出了警告：

“这个野蛮的法西斯殖民政府，为了使殖民者奴役数百万非洲人，正在准备宣布罗得西亚单方面独立于英国。”

## 遭 逮 捕

3个月后，当穆加贝回到罗得西亚时，他遭到了逮捕，被指控犯有一系列违法行为，包括“公开发表颠覆性声明”。在审判的日期确定后，穆加贝被保释候传。

这时，处在一场法律之战中的不单是穆加贝自己，他的妻子萨丽也被卷了进去。这是罗得西亚史上最具讽刺意义的时期之一。准备宣布单方面独立的菲尔德政府，指控萨丽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发表了有可能使女王遭到仇恨和污辱的颠覆性言论”。萨丽在这次会议上猛烈抨击英国抛弃罗得西亚的黑人，并说：“让女王见鬼去吧！”

萨丽因为犯有违法行为被判处了2年徒刑（剥夺政治活动的权利15个月）。宣判后，她被保释在外，准备提出上诉。

恩科莫也遭到了逮捕。他的罪名是在索尔兹伯里东部的鲁萨佩镇召集了一次大会。这时，他也在等待上诉。

恩科莫又一次改变了主意，试图不顾执委会的意愿采取行动。不过，这一次他倒是成功了。在历时5天的会议上，恩科莫终于说服了执委会的成员离开罗得西亚，到达累斯萨拉姆去建立人盟总部。穆加贝与塔卡维拉和西索尔一起，率先表示反对。他们坚持认为，不管留在国内将遭到什么样的惩罚，也必须向人民显示出他们有决心坚持到底，而不能让人民相信他们并不愿意为他们正敦促别人去奋斗的事业作出牺牲。

但是恩科莫稳操胜券。他刚刚从国外旅行归来，声称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认为，人盟应该撤离罗得西亚，在国外同菲尔德政府展开斗争，而不要留在国内，让不可避免的拘押搞得一筹莫展。

穆加贝最后的充满激情的请求失败了。他对恩科莫的立场感到失望。只是在他认为如果盟友赞比亚和坦噶尼喀要求他们离开罗得西亚，他们就必须离开时，他的这种失望的情绪才有所缓和。穆加贝不仅知道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且知道尼雷尔和卡翁达可以通过他们所会提供的帮助，来决定这场战争的结果。

但对穆加贝来说，这次旅行特别危险，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和萨丽都在保释之中，如果在试图逃离罗得西亚时被人发现，就有可能被逮捕，还因为当时萨丽已经处在艰难的妊娠时期。一年前，他们在萨丽分娩时已经失去了第一个孩子，而频繁的转移和随时会遭到拘捕的危险，又使萨丽的第二次怀孕与第一次一样的糟糕。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尼雷尔

已经公开承诺的支援上。然而，他们在抵达达累斯萨拉姆时不禁大吃一惊。尼雷尔对他们说，他对人盟执委会决定离开罗得西亚感到惊奇，确切地说是感到惊愕。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拙劣的行动。

不仅人盟留在达累斯萨拉姆不受欢迎，而且恩科莫对执委会说过的到了那里即可获得资金也成了泡影。人盟执委会就连为自己和家属提供住房的钱都不够，当然更不用说在那里购买设备后送回罗得西亚了。穆加贝为此既恼火又黯然神伤。由于脱离了他感到应该回去组织的政治运动，一连几个星期，他的心中郁结着一种失意和被恩科莫愚弄的感觉。他公开认为，恩科莫必须离开领导岗位。

5月间，在由6人组成的人盟代表团前往亚的斯亚贝巴进行疏通，以谋求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时，穆加贝对恩科莫提出了挑战。他对恩科莫的策略不仅有保留，而且认为这种策略是错误的，认为恩科莫已经走上了灾难的道路。穆加贝虽然得到西索尔和塔卡维拉的支持，但他当时的权力和地位还不足以推翻恩科莫。人盟领导权的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

非洲统一组织的观点当然不是这样。他们的意见与尼雷尔和卡翁达的意见如出一辙：回到罗得西亚去发展组织，表明你们的斗争已经得到人民的支持，然后我们将支援你们。

这时就连恩科莫也顶不住这种压力了。人盟代表团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后，卡翁达给恩科莫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必须立即回到罗得西亚去。尼雷尔在国家宫接见恩科莫时，当面向他发出了同样的指令。于是，恩科莫取消了他原定的南斯拉夫之行，返回罗得西亚。对他来说，这并非纯粹是作出牺牲，他正希望能够挫败穆加贝和西索尔之类的造反派推翻他



的阴谋。回国后，恩科莫发现了阴谋推翻他的证据——名声显赫的年轻律师埃迪森·兹沃布戈从达累斯萨拉姆的“造反派”那里接到的信件。信上说人盟执委会已经不再支持恩科莫，要求留在索尔兹伯里的人盟成员，为党的领导的更换作好准备。

恩科莫拿着这些信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当众宣布：执委会的4名成员停职，他们是人盟主席华盛顿·马利安加以及西索尔、塔卡维拉和穆加贝。

第二天，人盟在达累斯萨拉姆发生了全面分裂。在那里的7名执委会委员进行了投票，以四比三决定由西索尔代替恩科莫。在以后的18年斗争岁月里，这次分裂始终未能真正愈合。

面对这一决定，穆加贝感到十分痛苦，而且在以后的很多年里，这种痛苦仍然纠缠着他。从政治家的角度考虑，他觉得当时应该回到索尔兹伯里去，即便这将意味着被捕和被关押；但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考虑，他又觉得应该留在达累斯萨拉姆，等到他们的孩子出世以后再说。穆加贝知道，如果他不回去，恩科莫就会用他的论点——“作出牺牲”、“返回祖国”——来攻击他。但是，穆加贝最后还是留了下来。8月份，萨丽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夫妇俩给他取名为哈莫德曾尼伊卡。这个名字在马肖纳语中意为“受苦受难的国家”。穆加贝后来说：“这个孩子是暴风骤雨中希望的象征。”

以后的4个月，是穆加贝同他的孩子在一起度过的仅有的4个月。在那么几个珍贵的星期里，穆加贝似乎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尽管直到现在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孩子深沉的爱，和他置身于孩子中间时的那种欢

乐和愉快，但是在他和哈莫德曾尼伊卡一起度过的短时间里，他对孩子的喜爱似乎更加明显。

穆加贝在达累斯萨拉姆兢兢业业，刻苦工作，为民族主义运动争取朋友。他不断地会晤外国驻在那里的大使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官员，他知道今后将需要他们。不过，他的心思更多的还是放在萨丽和孩子身上。

恩科莫这时在迅速展开活动，以巩固其地位，并把反抗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8月10日，恩科莫召开了人盟代表大会。

## 民盟诞生

造反派获悉后，立即进行反击。在恩科莫召开大会的前两天，造反派在海菲尔德伊诺斯·恩卡拉——人盟中的好战分子——的家中举行了一次会议。西索尔以脱离人盟后新成立的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sup>①</sup>（以下简称“民盟”）领袖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

恩科莫准备制定的方针，是通过国际社会对英国施加压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罗得西亚白人政府，而民盟则打算一开始就致力于武装斗争。但是，当时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包括穆加贝在内——认识到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武装斗争变为现实。

到了12月（孩子刚满3个月），穆加贝夫妇下定了决

---

<sup>①</sup> 1963年8月，非洲人民联盟分裂，新组非洲民族联盟，穆加贝任总书记，西托莱任主席。64年领导人被捕。66年民盟重建，发动了反种族主义的游击战争。——译者

心。如果穆加贝和萨丽一起回国，无疑会双双面临监禁。在穆加贝坚持说她不能和他一起回去时，萨丽没有表示反对，虽然她很不愿意与自己的丈夫分离。于是，萨丽准备带着孩子去加纳，把他交给她的父母亲。而穆加贝则将回到罗得西亚去蹲监狱。

当月，穆加贝回到了索尔兹伯里。同他一起回去的有后来担任他的律师的赫伯特·契特波。穆加贝一到达那里就遭到了逮捕，并一直关押到他被审判，即从1964年1月至3月。

穆加贝站在被告席上发表的讲话，实际上等于表明他在以后长期的监禁生活中，将始终不渝地献身于斗争。

他拒绝撤销使他遭到指控的任何颠覆性声明。他反复警告说当局将宣布单方面独立，并又一次强烈谴责了《法律和秩序维持法》中的“绞刑”条款。而且在被宣布判处21个月的徒刑时，他还坚持说他并不是为了避免指控而逃离罗得西亚的。

“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离开罗得西亚。”穆加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说，“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全都必须牺牲我们的个人利益，跑到达累斯萨拉姆去，在那里认真研究人盟的某个行动计划。

“我对这一行动的可取性表示怀疑，觉得这样做是愚蠢的……但是我不得不忘记我的个人利益。结果正如我所预见的，人盟的那个行动计划没有能够实现，所以我回来了。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 第三章 狱 中

### 铁窗生活

自从1963年12月由达累斯萨拉姆返回索尔兹伯里时被捕起，到1974年12月参加“缓和”谈判为止，在整整11年里，穆加贝几乎无时无刻不是在罗得西亚监狱和拘留中心的铁窗下度过的。

这种形单影只的囚禁生活，不仅孤寂骇人，而且在起初阶段萍踪漂零。由于政府企图在他们的任何一座监狱里都防止民族主义者纠集到一起，穆加贝被频繁地从一座监狱转移到另一座监狱：起先关在索尔兹伯里监狱，接着被转移到中部省圭洛市附近的瓦瓦拘留中心，然后又被转移到奎奎的西科姆贝拉监狱。只是到了1966年被押解到索尔兹伯里监狱的押候处后，他才开始知道什么叫安定。他在这个押候处呆了八年。

据穆加贝自己说，对于一个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频繁转移的极端苦恼的。“它虽然消除了单调，却使我们感到非常的变幻莫测和担惊受怕……我们只能听任那些我们决不能信任的家伙的摆布。从他们那里，我们几乎得不到或者说根本得不到有关我们命运的任何消息。”

在乘着密封的囚车经过了漫长的旅行之后，等待着穆加



贝他们的是最为严酷的生活条件。在瓦瓦拘留中心时，穆加贝和其他几位因政治原因而被拘留的人，关在一间又阴暗又肮脏的牢房里。牢房的一角放着一只木桶，算作六、七个人用的“厕所”。白天，牢房内热得无法忍受，晚上又经常冷得异乎寻常。于是，疾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瓦瓦拘留中心时，由于囚犯们一天有23个小时被紧锁在牢房里，一些人终于未能活下去。

面对这种状况，穆加贝竭尽全力建立纪律和信心，不光是对他自己，而且要求那些总有一天会和他一起为自由和革命而奋战的人们。他从被捕的时候起，就开始同白人当局展开斗争，这是他在极其沉闷的铁窗生活中保持头脑清醒，并逐步树立其在难友中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方法。

1964年初，在当局以颠覆罪对他进行审判时，穆加贝要求给予他政治地位。同时，他还要求给予所有被关押的人以同样的地位。起初，穆加贝和普通犯人一起关在索尔兹伯里监狱，监狱当局不允许他学习，限制他的阅读材料。通过不断的控告和争吵，终于获得了他所要求的地位。在他被转移到其它监狱去时，政府终于开始作出让步，表示象他这样的人可以与其他犯人分隔开来，关在监狱的“政治犯牢区”。

然而，当局通过逮捕领导人这种简单的手段，有效地挫败了民族主义运动。在穆加贝被捕后的3个月里，人盟和民盟两党的将近150名领导人先后被拘捕。2个月后，恩科莫被押送到罗得西亚东南部的戈纳库津瓜拘留中心。最后，西索尔又于1964年6月被关进了穆加贝他们的监狱，他的罪名也是搞颠覆活动。

同年8月，当局取缔了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逮捕了一小批尚在自由活动的战士。

穆加贝从这批人以及西索尔那里获悉，民族主义运动内部正在发生混乱和纷争，使得运动四分五裂。据他们说，人盟和民盟之间这时已公开交战，民族主义者把以前在向白人当局进行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愤怒，转移到了非洲人身上。

两派的支持者之间时常发生激战。那些公开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的人的房屋被付之一炬，一些被堵在房子里的人在大火中活活烧死。在索尔兹伯里的非洲人居住区和一些已经具有党派倾向的部族地区，暴徒肆意横行。

白人当局决意撒手不管，任其发生。党派之战——只要是非洲人内部的——加强了他们的论点：非洲人就是不能或不配参与管理国家。

穆加贝感到很伤心，确切地说是担心民族主义运动的全面崩溃。但是，在西科姆贝拉拘留中心，他看到了改变这种灾难性进程的机会。

西科姆贝拉拘留中心，就在圭洛北部那个又脏又乱、潮湿荒凉的奎奎丛林旁边，它是专为拘留人数的不断增加而设立的。起初，这里是一块四周架着带刺电网的圈地。政府为看守人员盖好了房子，但把犯人们居住的草棚，留下让他们自己动手盖。

当犯人们听说穆加贝正在由瓦瓦拘留中心转移到那里去时，他们已经盖好了大部分的草棚。为了表示对穆加贝的敬意，民盟拘留犯们特地为他盖了一间用茅草作屋顶的小屋，小屋的门是他们用芦苇一根一根辛辛苦苦地编织起来的。他们让穆加贝住在他的良师益友利奥波德·塔卡维拉旁边。

穆加贝到达后，民盟执委会举行了一次会议。穆加贝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是他在关押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的

第一次。他没有说别的，只是要求大家努力工作，相信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

他告诫大家：不要期望很快就会获得释放，在西科姆贝拉这样的地方可能要蹲好多年；不要期待人们会站起来支持他们，建立一支能够对政府造成威胁的军队，需要若干年的时间。然而，对于赢得多数统治和独立的能力，必须抱有信心。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在狱中的时间，为民族解放作好准备。他说：“不管拘留的时间是几个月还是几年，都绝不能虚度过去。”

## 拘留所里的学习班

穆加贝提出在拘留所里举办各级文化教育班，由那些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来教那些稍有文化或没有文化的人。文化班以政府允许基督教福利组织和基督教救济组织之类的援助团体提供的书籍和材料作教材。每天上午为文化班的上课时间，下午为“教师”自修时间。拘留人员在一天之内通过一系列会议，选出了各级文化班——从小学最低年级到罗得西亚发给文凭程度——的教师。穆加贝担任校长，全面负责监督各班级的课程。

这时，他自己开始通过伦敦大学的函授课程攻读法律学位。每天，他的时间表都安排得象他在学校里当教师时那样满满的。他既要自己学习，又要花好几个小时辅导和鼓励其他人，帮助他们改正作业上的错误。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穆加贝总是通宵达旦地读书和打字。”穆加贝当年的一位难友后来回忆道。他上午教别人学习，下午由穆加贝辅导他去参加英语

一般水平<sup>①</sup>考试。

当黎明到来时，穆加贝总是简单地洗刷一下，然后与其他人一起象往常一样洗刷盘子和准备上午的课程。

“每天早上，整个拘留中心一片寂静。偶尔有人来探望，也会被告知在下午来，以便让大家有时间教书和学习。”穆加贝的那位难友回忆道。

穆加贝在西科姆贝拉拘留中心所形成的作息制度、处事的有条不紊和自觉遵守纪律的作风，一直保持了下来。直到今天，他依然不改当年在关押期间所养成的习惯：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然后进行他所称的“瑜伽”——一种健身体操与意念相结合的运动。他对抽烟者的严厉态度——不只是象一般不抽烟的人那样对烟味感到恼火——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他时常说，他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同香烟进行着无聊的搏斗。如今，无论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经常与他来往的人，几乎全都不抽烟。穆加贝的一位警卫员曾经诙谐地说，他是因为不抽烟才得以在他身边工作的。

教育、纪律和规律使得西科姆贝拉这样的拘留中心的生活有了目的。但是，这一切并未能改善严酷的生活条件。质量糟糕和缺乏多样化的饭食，使拘留人员的健康无一不受到损害。拘留犯们自己做饭，给养由警察送到拘留中心，通常是在星期五那天。如果碰上好运气，他们会得到少量的肉。犯人们总是先把肉放在阳光下晒一晒，这样便可慢慢吃，而不致于腐烂变质。如果运气不好，他们就只能没完没了地吃大豆和玉米面。犯人们领到这类食品后，通常把它们熬成一种叫“萨扎”的稀粥。这可谓监狱生活的另一种“馈赠”，直

---

<sup>①</sup> 相当于初中毕业程度。——译者



到现在，穆加贝还吃这种“萨扎”。

1965年11月11日，伊恩·史密斯单方面宣布罗得西亚独立于英国。在西科姆贝拉拘留中心突然加强了安全。穆加贝问新去的看守这是为什么时，他才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史密斯政权因为害怕“单方面独立”会引起破坏活动和游击队活动的加剧，放弃了将西科姆贝拉拘留中心关押的人释放出去的打算。实际上，民盟和人盟当时太涣散了，并不可能对史密斯政权或“单方面独立”发起任何严重的挑战。

民盟执委会在西科姆贝拉与仍在罗得西亚国内和国外自由活动的民盟战士建立了秘密联系。一些黑人看守虽然在为史密斯政权的一支最严酷的镇压部队效劳，但他们对于民族主义事业是同情的。他们偷偷地把民盟执委会的信件送出去，给仍在自由活动的民族主义者，有一封信甚至送到了契特波的手中。契特波当时一直在卢萨卡组织规模很小的游击队。民盟执委会在信中告诉他有权建立党的国外组织。后来，这个组织定名为“军事委员会”，在民盟领导人被关押期间，它承担了全面负责民盟各项事务的责任。“军事委员会”的宗旨简单而又明确：进行民族解放战争。1966年4月，一支由14名民盟游击战士组成的小分队，从赞比亚渗透到罗得西亚境内，试图摧毁锡诺亚的电缆塔，结果失败了。这支小分队虽然装备很差，训练无素，指挥糟糕，却在向哈特利附近的一个白人农场（距离索尔兹伯里仅仅50英里）发动袭击，打死了农场主亨德里克·维尔乔恩和他的老婆。没过几天，这批游击战士被当局的治安部队统统打死了。但是，民盟对这次没有成功的行动大加赞颂，称它为“锡诺亚之战”。当然，这是名不副实的，但它象征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游击战争的开始。这些游击战士为了把枪口转向一位欧洲人，竟然从赞比亚深入到罗

得西亚境内如此深远、靠首都索尔兹伯里如此之近的地方，这使民族主义者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不仅如此，这一行动还在欧洲人自负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裂痕，不管它是多么的小。锡诺亚事件在欧洲人中间引起了一阵恐慌。事件发生以后不久，当局便把民盟执委会的成员和民盟的另外30名拘留犯，转移到了索尔兹伯里监狱的拘留犯区。

穆加贝及其难友们也许以为到了索尔兹伯里后，条件会有所改善，没想到他们40个人被关在4间本来只能容纳20人的集体牢房里。牢房里同样没有足够的床垫，一连好几个月，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穆加贝再次坚持认为纪律和教育是对漫长而又严酷的牢狱生活的唯一回答。他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推进自己的学习，根本不象在大学攻读学位那样悠闲和从容。当朋友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刻苦学习时，他总是回答说：“我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津巴布韦，因为我知道我们总有一天都会需要这些学位的。”

一般说来，处在他这种境地的学生获得一个法律学位，需要三、四年时间，但是穆加贝只学习了18个月，就恳请伦敦大学让他参加考试，以便使他可以学习其他东西。

虽然穆加贝实际上从未见过他的指导教师，但指导教师却通过远距离函授，对他有着非常清楚的了解。

“我得到了一个颇为明确的印象：穆加贝为了今后的任务，在充分利用他的才智”，他的一位指导教师回忆道。他称穆加贝是“日本学生”，因为他爱好读书。他说：“穆加贝对书本喜爱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他确切地知道他自己要干什么，以致迫使我要他牢牢记住就教学而言，应该听我的而不是听他的。我仿佛是在驾驭一匹烈性马。他使我想起了

尼赫鲁——一个同样专心致志的人。

除了文化教育以外，监狱里的另一种主要“消遣”便是宗教。在拘留人员中，许多人是在基督教社会里长大并在传教机构的学校里受的教育。直到今天，教会对民盟的许多领导人仍然有着难以消除的影响，即使是那些已经不再上教堂的人亦是如此。

在关进索尔兹伯里监狱的第一年——1966年年底，穆加贝遭受了个人生活中最大的不幸。前去看望他的人寥寥无几，而且间隔时间很长。只有基督教救济组织的杰克·格兰特和夫人艾达偶尔获准去看望他，并给他捎去一些书和报纸。起先，象格兰特这样的探监者在探监时可以同拘留犯一起站在院子里，但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时便只允许他们——甚至包括那些教育犯人的人——隔着玻璃窗和通过电话与被拘留人员交谈了。这样，他们之间的全部谈话便遭到了监听。

一天早上，穆加贝被突然叫进一间询问室。他发现，里面站着罗得西亚警察特别支队的巡官托尼·布雷德肖，监狱的一位看守和他的妹妹萨比娜。萨比娜的泪水正顺着脸颊向下流淌。

萨比娜告诉穆加贝，他的儿子哈莫德曾尼伊卡因患脑炎——大脑疟疾——在加纳萨丽父母的家里不幸去世了。萨丽的妹妹埃丝特——本身就是医生——到医院去看望了孩子。她说：“如果这孩子一开始就身体强壮，那他是可能活下来的。然而他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孕生和成长的，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各种感染。”

穆加贝从不轻易流泪，然而他在听到这一消息时，却不禁当众潸然泪下，而且以后连续多日都沉浸在悲哀之中。他恳求监狱长允许他暂时离开拘留中心，到加纳去埋葬他的儿

子，并和萨丽团聚一下，不管时间多么的短暂。他抱着一线希望，期待监狱当局答应他的要求。

穆加贝曾同布雷德肖发生过多次冲突，他没有理由相信对方会特别同情他。然而，布雷德肖确实向政府提出了请求，要求允许将穆加贝假释3个月，条件是他保证如期返回拘留所。

布雷德肖认为可以信任穆加贝会信守这一条件，他的理由是，如果允许将穆加贝假释，那么政府就可能对他施加一些影响。然而，无论穆加贝还是布雷德肖的请求都枉然了，政府表示拒绝考虑假释穆加贝的想法。

在那关押和战争的岁月里，几乎每一个民盟领导人都能说出他们个人所发生的悲剧。多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对白人感到怨恨和憎恶时，曾回顾了这些悲剧。穆加贝的个人悲剧是他儿子的不幸去世，但这与其说引起了他的愤怒，毋宁说造成了他的深切悲痛。他真正的愤怒，是在4年后塔卡维拉去世时爆发的。塔卡维拉患的是糖尿病，按理说这种情况即使是最草率的医疗检查也能发现，然而却没有诊断出来。在逝世前的六个月里，塔卡维拉的体重从195磅猛降到145磅，但监狱里的医生却坚持说这是由于心理因素造成的。

穆加贝对儿子的死所表现出的悲伤，以及后来围绕着他是否应该获释的问题进行的争吵都是罕见的。当然，他不是对着监狱当局，而只是偶尔对着他的难友。他把悲伤埋藏在心间，下定决心生活下去，同时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学习。萨丽在儿子死后离开了加纳，准备去为穆加贝助一臂之力。



## 萨丽的援助

尽管失去了儿子，丈夫又不在身边，但萨丽还是决意为罗得西亚的自由和独立进行准备。她知道届时罗得西亚将需要有技术的非洲人。

在萨丽和罗伯特1963年动身去坦噶尼喀之前，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萨丽出狱的当天晚上，他们夫妇俩在索尔兹伯里同艾里尔基金会的丹尼斯·格伦南共进了晚餐。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当穆加贝夫妇走进餐厅时，所有的招待员都毕恭毕敬地站在两旁，其他人这时几乎已得不到什么招待，因为所有的眼睛都在凝视着他们夫妇俩。

基金会作出了决定，如果罗伯特遭到监禁，就给萨丽提供去伦敦学习的奖学金。后来，正好有部分课程可以报名，萨丽便决定到伦敦大学女王伊丽莎白学院攻读家庭经济学学位，重点学习饮食和营养专业，因为这些是罗得西亚殖民社会所忽视的领域。她在获得学位后，又到鲁尼米德信托公司工作，直到1975年才离开伦敦。

在此期间，萨丽象穆加贝那样，以其特有的精力紧张地进行活动。她参加了许多招待会，在这些场合结识了英国议员，并情绪激昂地对他们进行疏通，甚至时常跟着他们回到下院，为穆加贝的释放和罗得西亚的前途继续进行疏通活动。

萨丽并不是大量地同激进的左派组织和反对种族隔离团体打交道，而是把主要目标集中在那些当权者的身上。当官僚式办事程序的车轮向她压去时，事实证明采取这种走上层路线的战略，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

作为一个已经不再是学生的加纳人，她的签证已经期满，不能再居留英国了。但若她是一个罗得西亚人，那情况就不同了。虽然从来未曾有人对萨丽是罗伯特·穆加贝的妻子这一事实提出过疑问，但给外国人办理签证的英国官员，不可能都听说过穆加贝。这纯粹是一个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问题。鉴于象她这种情况的人，没有继续留在英国的先例，因此萨丽也应该离开。所幸她在威斯敏斯特宫<sup>①</sup>交了很多朋友，他们联名写信给内政府大臣，向他指出了驱逐一位政治犯的妻子所产生的后果。萨丽终于被“破例”允许继续居留英国。

萨丽的很多夜晚是在伦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她有时摘要抄录，有时全文复印穆加贝在狱中学习所需要的书籍和资料。七十年代初期，罗得西亚监狱当局对犯人们的学习材料实行了一系列控制：限制他们接受书本的数量，强迫他们在看完之后就把书本交给监狱当局，以防止他们再转给其他也已开始学习的被拘留人员。面对这些限制，萨丽的唯一办法是把穆加贝所需要的参考资料抄录下来，然后冒充信件寄给他。英国上院工党议员沃尔斯顿的夫人伊丽莎白·沃尔斯顿是萨丽居留伦敦期间的一位亲密朋友。在她的记忆中，萨丽“本身就是一位不露声色的强人”。

她说：“萨丽异乎寻常地用手工抄写罗伯特的法律书籍。她时常连续伏案数小时，一行一行地抄写。她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身陷囹圄的罗伯特。我记得她曾为他的毯子而操心。我们设法给他送去，但他始终没有得到。”

即便是在身负重担——与穆加贝被迫分离11年，自己又

---

<sup>①</sup> 英国议会大厦。——译者

不得不忍受各种压力——的情况下，萨丽也显示了帮助别人的坚强决心，表现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在居留伦敦期间，她帮助建立了一所多种族的女子学院，学生主要是跟随丈夫来到伦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由于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障碍，如果她们不去学习，就只能被孤立伦敦的外国人圈子里。萨丽自己在英国也遭受着种族主义之害，特别是那些认为她的丈夫是“恐怖分子”，遭受监禁是罪有应得的人，总是对她另眼相看。女子学院办得颇为成功，最后由伦敦教育中心当局接管了过去。

1967年至1968年是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处于低潮的时期。“锡诺亚之战”鼓舞了民族主义者的士气，使他们认识到游击队能够、而且准备向欧洲人发起进攻。但在此之后的2年里，民族主义者的事业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虽然从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渗透到津巴布韦的游击队员数量有所增加，但其结果却令人失望。

许多游击战士的武器和训练都还不够。史密斯政权在宣布“单方面独立”后，加强了治安部队，游击队在军事上直接面临的问题增多了。游击队不被察觉地渗透到罗得西亚境内并攻击选定目标——摧毁这些目标可望成为民族主义事业重整旗鼓的象征——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1964年当局取缔了人盟和民盟，大规模地拘捕这两个政党的领导人后，民族主义者采取的发动群众的政策逐渐消失，变得无所作为了。积极分子已经被关押，治安的加强，使得一般老百姓不愿以任何方式加入民族主义者的事业。许多以前曾经那样做的人，不得不逃亡到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在乡村，人们对当局变得更加俯首帖耳，拒绝加入任何可能会引起当局注意的活

动。在城市的黑人居住区，人们因为过于害怕工作得不到保障或者失去工作，不愿冒险参加政治活动。

史密斯政权对那些看到游击队后不报告的人实行严厉的惩罚。如果在某个村子里发现了游击队，就要对全村进行惩罚：政府牵走村上的耕牛，或者干脆把村民们赶出家园。对游击队来说，这种情况不能说不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游击队的活动能量非常小，无法对帮助他们的村庄提供保护，使它们免遭当局的惩罚，因此各乡村不愿意帮助游击队，甚至经常发生向治安部队告密游击队的情况。

## 会 谈

在民族主义运动受到削弱的背景下，威尔逊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它是在罗得西亚白人当局宣布单方面独立前的12个月上台的）恢复了同史密斯政权的谈判。

在罗得西亚宣布“单方面独立”之前，威尔逊已经同史密斯进行过谈判，试图竭力避免罗得西亚当局采取这一行动。1965年10月，即史密斯同英国决裂的前一个月，威尔逊飞赴索尔兹伯里进行了会谈。他在那里对津巴布韦所有真正具有政治地位的代表人物讲了话，甚至设法迫使史密斯将恩科莫和西索尔从拘留所里暂时释放出来，以便使他能够同他们会谈。但是，威尔逊的策略，始终是试图通过与史密斯政权达成某种协议，来防止他宣布“单方面独立”。他同史密斯达成协议的基础，是史密斯接受1961年的宪法，加之作出其它一些保证——保证不对宪法作有损津巴布韦非洲人地位的倒行逆施性质的修改，含糊其辞地承诺将改善津巴布韦非洲人的政治地位。然而，津巴布韦的民族主义者早在1961年



的宪法未曾通过之前（恩科莫在1960年索尔兹伯里制宪会议上表现出优柔寡断之后），就已经拒绝了这部宪法。因此，恩科莫和西索尔明确地告诉威尔逊，现在是1965年，他们不会从当时采取的立场上朝后退。

由于威尔逊一贯热衷于英国脱离罗得西亚，特别是由于他的政府未能成功地采取任何行动，反对罗得西亚当局非法宣布“单方面独立”，英国在联合国和英联邦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1966年，史密斯和威尔逊在停泊于直布罗陀海峡的英国“老虎”号巡洋舰上，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会谈均告失败了。1968年，他们俩又在英国“无畏”号巡洋舰（也停泊在直布罗陀海峡）上举行了新的会谈。这两次会谈的中心问题是1961年的宪法。威尔逊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英国准备根据1961年的宪法，加之其它一些保证津巴布韦非洲人地位的条款，允许罗得西亚独立。

“无畏”号巡洋舰会谈的结果，是提出了一些尚在桌面上讨论的建议，以及史密斯和威尔逊一致同意回去后，与各自的政党和其他有关的党派讨论这些建议。

11月7日，英国负责罗得西亚问题的不管大臣乔治·汤姆森以及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大臣莫里斯·弗利，飞抵索尔兹伯里的萨勒姆空军基地，同穆加贝、塔卡维拉和西索尔举行了90分钟会谈。为了防止罗得西亚当局搞窃听，他们一直走到了基地的中心。在那里的一棵大树底下，弗利和汤姆森向民盟的三位代表通报了“无畏”号巡洋舰上的会谈结果——少得实在可怜。

两位大臣说，尽管威尔逊首相没有能够取得在制宪会议上可能期望的全部成果，但总算“聊胜于无”。鉴于威尔逊

愿意根据1961年的宪法进行会谈，这在某种程度上讲，等于慷慨地提供了成果。

民盟代表对威尔逊准备讨论1961年的宪法感到很恼火，他们认为这样做，有损民族主义者的地位，并会破坏8年来在实现多数统治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不管怎么说，非洲人早在1961年就已拒绝了这部宪法。汤姆森反驳说，接受这部宪法，至少可以保证民族主义者有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他们目前所没有的。

穆加贝提出挑战说，英国有办法挫败那些等于非法篡权的行为。汤姆森回答说，英国已经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他声称：“如果使用武力，将是一种入侵，”因为英国在罗得西亚周围没有军事基地，只有通过赞比亚才能出兵。汤姆森强调：“这样做会造成严重的流血。发动一场战争是轻而易举的，但战争如同森林中的大火一样，一旦燃起，就会四处蔓延，谁也无法知道它何时才会结束。”

穆加贝马上责问道：“如果你们在其它地方遇到这种情况，难道还会不动用武力吗？！我们认为，你们之所以不使用武力，是因为他们（史密斯政权）与你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塔卡维拉接着说：“我们无法相信你们不能使用武力。什么叫‘没有办法’？难道你们的陆军比史密斯先生的少？难道你们的空军也比他的少？你们究竟在担心什么……一场血战？”

“说得对！”弗利马上答道，“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塔卡维拉又说：“你们是想溜走，把我们非洲人撇在这里的白人手里不管。这对你们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更大的道德问题吗？不妨想一想，究竟是把我們丢在这里让这帮家伙任

意摆布，使我们处于危险之中为好呢？还是你们动用武力，虽然流一点血，却能把事情妥善处理为好？不要忘记，这里的欧洲人对非洲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可以动用军队，把所有的非洲人统统关押起来，而我们却无法对他们解释说：英国政府实际上不能使用武力。他们是不会相信我们的。如果斯威士兰在独立之前遭到了入侵，难道英国人会袖手旁观吗？”

“在斯威士兰，我们有一支军队和警察部队，”汤姆森辩解说，“我们当然会镇压一切反叛，因为我们在那里有一支军队。”

穆加贝试图澄清英国拒绝采取行动的立场，于是问道：“难道前景会象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果你们动用武力，南非人就会到这里参战吗？”

“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会来交战。我已经同南非的官员会谈了几次，他们使我相信南非会来交战。”汤姆森答道。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了。随后，汤姆森和弗利飞回英国。穆加贝、西索尔和塔卡维拉则被带回索尔兹伯里监狱。

威尔逊和史密斯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渐渐销声匿迹了。由于民族主义者明确表示，他们决不会受根据1961年的宪法达成的任何协议的约束，史密斯政权不得不回避了上述建议，再次向英国枢密院发出呼吁。

1970年6月，爱德华·希思领导的保守党在英国东山再起，重新执政。英国再次恢复了同史密斯政权的谈判。这一次，双方关于罗得西亚独立的协议不是根据1961年的宪法；而是根据史密斯在1969年制定的一种新的共和制宪法达成的。新宪法对选举权的限止更加严格。

英罗两国政府的协议，是在有迹象表明这种解决方案能

为“整个罗得西亚人民”所接受的情况下达成的，最后没有通过举行公民投票来征求非洲人的意见，而是由英国政府委派了一个由皮尔斯勋爵为团长的调查团，前往调查津巴布韦人对解决方案的态度。使保守党政府感到吃惊的是，据调查团报告：“整个罗得西亚人民并不认为那些建议是实现罗得西亚独立的基础。”于是，这个方案同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早在史密斯—威尔逊在“无畏”号巡洋舰上举行会谈之前，以穆加贝为首的民盟拘留犯，就已对西索尔的领导地位产生了严重怀疑。西索尔不能适应监狱生活的环境。据说，他不仅老是动辄发火，而且行为很荒唐，以致民盟执委会的其他成员不得不背着作出决定，然后作为既成事实向他提出。

在“无畏”号巡洋舰会谈之后不久，西索尔建议民盟执委会的成员莫里斯·尼亚贡博设法暗杀伊恩·史密斯，以及罗得西亚阵线党政府中的两位主要部长德斯蒙德·拉德纳—伯克和杰克·豪曼。尼亚贡博尽管在按照西索尔的意见，进行暗中准备，但他说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一计划能够实现。然而西索尔不顾一切地催促他行动。

1968年10月，西索尔试图将一信件，派人偷偷送出索尔兹伯里监狱，指示民盟在海菲尔德的关系去执行他的暗杀命令。

比尔·克拉克牧师，是罗得西亚各监狱的首席牧师，也是当时极少数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接触拘留人员的人之一。在1980年罗得西亚大选前夕，他第一次感到可以痛痛快快地谈论他在监狱里所劝导过的人了。



“恩达巴宁吉·西索尔在索尔兹伯里监狱期间，与那些和他关在同一牢区的同志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克拉克回忆道，“我经常听到有人在叽叽咕咕地对他的领导表示不满。

“西索尔虽然失去了领导魅力，但他继续担任着领导职务，直到他在向监狱围墙外的同党扔内藏暗杀指令的柑橘时被抓获为止。他的一伙同党根据事先安排，假装成探监者，聚集在监狱外等待开门。不料，当时警察特别支队的特务，也在那里转悠，他们发现监狱内扔出的柑橘后，便马上抢了过去。切开一看，发现里面塞着怎样暗杀史密斯的指令。”

克拉克牧师说，随后，西索尔即被转移到了一个远离穆加贝这样一批人的牢房里。有一天，他派人送出急信，要求克拉克无论如何马上去看望他一下。克拉克发现，素来冷若冰霜的西索尔，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克拉克回忆道。

“因为那件事（指下令暗杀史密斯），我将受到绞刑，”西索尔精神恍惚地说道，“除非我能做些事情来保护自己。”

他提出要给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马拉维的海斯廷斯·班达和在卢萨卡的契特波写信。

“他们都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克拉克说，“西索尔给他们写信，这等于是说他的内心和意图已经发生了变化，准备抛弃革命的策略，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他的理想。”

西索尔写完信后，急不可待地问克拉克牧师：“您意如何？”

克拉克说，这一切似乎有点太突然，他怀疑穆加贝和其他人会支持他这样做。

西索尔对他说：“我是在为我自己的生命努力。我必须

拿出点真凭实据的东西来保护自己。一定不要让这些信件落入特别支队的手中。”

1969年1月底，西索尔因被控阴谋杀害史密斯而受到审判。西索尔在法庭调查时声称，他当初是这样想的：“‘无畏’号巡洋舰会谈中提出的建议，意味着英国‘出卖’了非洲人。为了确保英国人回心转意，唯一的办法是干出一些惊人之举，譬如暗杀伊恩·史密斯。”

审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不仅是因为暗杀史密斯的阴谋实在怪诞离奇，而且还由于西索尔——他的立场已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审判结束时企图所做的一切令人难以相信。在法官判定他有罪后，西索尔竟当庭苦苦哀求道：“法官老爷，我愿公开宣布：从今以后我将洗心革面，在言论上、思想上和行动上脱离任何颠覆活动，脱离任何恐怖活动，脱离任何暴力活动。”

穆加贝在牢房内听说了西索尔当着法庭发表的声明，他对这种“变节行为”表示惊愕。而在私下里，他却毫不惊愕。他知道，这时西索尔已经结束了他在民盟内的领导地位。正如克拉克牧师所回忆：“在监狱的拘留区内，西索尔原先的追随者们非常欣喜，他们毫不掩饰心中的快乐。

“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终于永远摆脱了西索尔。罗伯特·穆加贝被宣布为他的接班人。”

克拉克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在他的印象中，穆加贝是一个顽强的、毫不妥协的领导人，他在监禁期间不断发展成长。

“无论是从智力方面还是学术方面来看，穆加贝都是一个有坚强的信念、明确的目标的人。”克拉克说道，“他早已显示出他具备当领导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在我有幸接触

他的八年之中，我完全有理由尊敬他。

“毋庸置疑，他是一匹不可超越的纯种马，其他竞选人都承认他最有可能赢得大选……人们说他是上帝挑选的。在实现自己使命的征途上，他决不会误入歧途。

“他身处逆境而不气馁，善于用理智支配和控制自己。”

西索尔被判了6年徒刑。宣判之后没有过几天，民盟执委会便在狱中组织了一次无记名投票，以选举党的领袖，接替西索尔。结果穆加贝当选了。这时，有一个人接近了西索尔（当时他已经与关押在极端森严的拘留区内的其他人隔离开了），他就是警察特别支队的头目、警长比尔·鲁宾逊。鲁宾逊设法使得西索尔同意和他做一笔交易：西索尔下令解散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白人当局作为回报，允许西索尔到美国去，在那里过流放生活。

西索尔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穆加贝和塔卡维拉，并暗示他们也可以和他一起来做这笔交易。穆加贝和塔卡维拉表示又惊又气。穆加贝这时相信西索尔已经被白人当局彻底拉下水了。据尼亚贡博回忆，西索尔当时对他们的反应是：“好吧，你们拒绝了我的建设性建议，但我可以向你们明确地说，我不准备在监狱里蹲满6年，我打算脱身。”

事实证明，西索尔的脱身之计犹如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并于1973年3月重新加入了穆加贝等人的民盟执行委员会。由于执委会尚未正式作出任何决定将西索尔开除出去，穆加贝作为狱中的民盟领导人，并不是没有争议的。西索尔再次提议解散民盟。他表示，作为回报，他可以让当局保证释放他们。

有人主张中止西索尔的执委会委员资格，但是穆加贝因

为渴望避免民盟内部出现任何可能会发展到公开化的分裂，并由此而引起混乱，宁愿采取另外一种策略。他说，西索尔是“局外人”。后来，西索尔同执委会其他成员的一切来往都被冻结了。

从1970年起，穆加贝所获得的绝无仅有的一点儿好消息大多来自莫桑比克。萨丽和朋友们在给他的信中虽然谈的不多，但已经足够告诉他所需要的消息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抗击葡萄牙殖民政府的战争中，在取得缓慢但稳定的进展。到1972年，该党游击队已经控制了莫桑比克北部的大片国土。穆加贝感到，他们越是向前推进，民盟人数不多的部队在边境地区搞渗透的自由就越大。而且，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获胜的可能性也越大，穆加贝对于为他自己的部队的武装斗争，建立一个长久基地的信心也就越足。

这一年的圣诞节，穆加贝听说民盟发动了6年前锡诺亚事件以来第一次真正引人注目的进攻。

12月21日，一支游击小分队袭击了森蒂纳里附近——距离莫桑比克边境约50英里——一个农场主的家。有一个孩子被打伤，其余3个孩子和他们的祖母在袭击中逃跑。农场主随即不得不举家转移到邻近的一个农场。可是两夜之后，他们在那里又一次遭到袭击，农场主和他的一個女儿，被游击队发射的火箭弹和手榴弹的弹片打伤。游击队撤退时，纵火烧毁了农场的仓库和附近的一座教堂。次日早上，当军方的一支巡逻队前去查看时，他们的卡车碰上了一颗地雷，一位白人下士被当场炸死，他的3个同伙被炸伤。

白人始终把森蒂纳里附近发生的这次袭击事件确定为（民族解放）战争的开端，而民盟则总是把战争追溯到比这



更早的“锡诺亚之战”。但是，无论是在“锡诺亚之战”时，还是在森蒂纳里附近发生袭击时，白人和民盟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战争将会持续多久和进行的多么残酷。

然而，南非的约翰·沃斯特认识到了。多年来，他一直在暗暗地同卢萨卡的卡翁达总统进行对话，始终让谈判的大门敞开着。他对1972年底游击队的突然袭击，感到惊恐不安。事实上，他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随着莫桑比克民族解放战争的不断加剧，以及葡萄牙人由于伤亡日益严重而将逐步消亡，沃斯特担心他的国家不久将会处于前线。他一方面主动向卡翁达表示要为罗得西亚问题作出努力，另一方面却在罗得西亚加强史密斯的军事力量。南非的第一道防线是罗得西亚（北部）边境—赞比西河。任何侵越这道防线的行动，都会在比勒陀利亚引起和在索尔兹伯里一样迅速的惊慌。1974年4月，斯皮诺拉将军在里斯本发动军事政变，这使沃斯特的战斗计划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鉴于在里斯本掌权的将军们发誓要从非洲撤军，和尽快实行非殖民化，沃斯特无法再指望葡萄牙人来坚决抵抗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游击队了。南非的前线也已经不再是罗得西亚，而是它同莫桑比克的边境。鉴于这一形势，沃斯特马上意识到，无论是他或是他的国家，都不能再对罗得西亚的战争承担义务了，否则就会引火烧身，招致他的黑非洲邻居们的义愤。这时，他几乎想不惜一切代价地索取和平，甚至准备以牺牲史密斯来达到和平。

史密斯这时仍象以往一样的顽固不化。虽然他感到变革之风更加强盛了，但他在这一年的8月仍然说：“哪怕是这场变革要经历1年、2年或者10年，我们也要挺过去……我们

当然希望问题的解决，但必须符合我们的条件。”

同年10月，沃斯特同卡翁达进行对话——不是双方直接进行，而是通过各自的助手。双方共同为谈判制定了一项基本方案。卡翁达表现得异常热情，似乎他已经忘了在1973年关闭同罗得西亚的边境后所遭受的经济后果。

关于目前，他们同意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宣布结束紧急状态，并恢复民盟、人盟和其他民族主义政党的合法地位。

关于今后，他们一起确定了进行谈判的基调：通过5年过渡时期，实现多数统治，实行接近满足卡翁达提出的一人一票制的选举制度，任命非洲人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担任较高级的职务。

缓和在进行之中。但无论是沃斯特、卡翁达或是尼雷尔都不知道，这时穆加贝已经是狱中民盟的实际领导人。史密斯从警察特别支队的汇报中掌握了这一情况，但他没有声张。

然而，当卡翁达的助手马克·乔纳11月初到罗得西亚召集关押中的民族主义者去卢萨卡举行会谈时，史密斯直截了当地向他发出了非同一般的警告。“如果你能把他们搞到一起，”史密斯摇晃着手指对乔纳说，“你就回来把我的手指削掉！”

## 获 得 自 由

在1974年这一年里，拘留人员被转移了好几次，但穆加贝一直没有动，仍然被关押在索尔兹伯里监狱。他怀着激动和迷恋的心情，越来越多地阅读和研究有关莫桑比克的形势

和葡萄牙专制统治垮台的材料。尼亚贡博、恩卡拉和持克雷三人被转移到了奎奎。他们在那里强烈要求穆加贝将西索尔停职，并说一旦举行谈判，他们不能被迫让西索尔作为他们的领导人。据尼亚贡博说，穆加贝和马利安加强烈反对这种意见。然而，在赞比亚开始放出“缓和”的空气后，他们意识到有必要采取行动了。11月1日，执委会通过投票，中止了西索尔的执委会成员资格。

这个时间实在是巧得不能巧了。第二天，他们就第一次听说关于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谈判已经迫在眉睫。

自从有人暗示要举行谈判起，穆加贝不仅坚决反对缓和这种想法，而且对卡翁达怂恿这种思想进行了嘲讽。

“我们真不明白，”穆加贝说，“象卡翁达这样一个献身于泛非主义和我们的民族主义事业的人，竟会同我们的敌人一唱一和，亲如手足。”

狱中的民盟执委会表示，只要他们还关在监狱里，就拒绝谈判。卡翁达派乔纳去同他们交涉，或者说派他去说服西索尔，因为象卡翁达和尼雷尔这样一些前线国家的领导人，仍然以为他是民盟的领袖。西索尔对于谈判丝毫也没有表示反对。当他被叫到监狱的一间办公室里去见乔纳时，恰好穆加贝坐在那里考试。穆加贝发现后，马上放下手中的钢笔，参加了他们的谈话。乔纳掏出一封由尼雷尔、卡翁达以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马谢尔和博茨瓦纳总统塞雷茨·卡马写的信，信中敦促西索尔去参加谈判。

穆加贝和西索尔回到牢房后，民盟执委会商定派穆加贝和马利安加去卢萨卡参加谈判。穆加贝先是乘坐一辆高级轿车来到机场，然后登上了一架专供政府高级官员乘坐的喷气式飞机。在这么多年来饱尝了身陷囹圄、一无所有、痛苦厌

烦、蒙受耻辱和可怕的孤独的滋味后，他体验到了罗得西亚政治生活的另一个方面。然而这种体验是短暂的。

穆加贝和马利安加到达赞比亚时，尼雷尔几乎无法掩饰他心中的怒火。他说穆加贝不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领袖，民盟的领袖是西索尔。穆加贝和马利安加因此而被立即打发回索尔兹伯里监狱。

穆加贝在返回他的牢房时气愤地说道，整个过程就象一出“虚假的……闹剧”。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穆加贝附和了谈判，因为他认识到这样可以为他换来自由。西索尔再次披上了民盟领袖的外衣。确实，他也只不过是民盟名义上的领袖，即便是尼雷尔总统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穆加贝在这次急匆匆的卢萨卡之行的结束之际，见到了他的妻子萨丽，这是他在10年中的第一次。萨丽已经赶在他之前从伦敦飞抵卢萨卡见他。这对穆加贝来说真是太突然了，就连萨丽自己也不知道将给他造成多大的惊奇。“刹那间，我从索尔兹伯里来到卢萨卡的那批人中看到了他，”萨丽说道，“我马上就瘫痪了，晕倒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我再次看到他，是在国家宫卡翁达总统的私人房间里。当时的情景感人至深，但就是缺少时间。两天后，他们就把罗伯特带回了索尔兹伯里监狱。”

然而，穆加贝在返回索尔兹伯里监狱后没有蹲多久。这一年的12月中旬，伊恩·史密斯宣布实行停火，于是他和恩科莫、西索尔以及艾贝尔·穆佐雷瓦主教一起被释放了出去。但是，当一大群人聚集在黑人区欢迎他们回家时，穆加贝的思想上并没有休战。

“我们决定接受缓和，这纯粹是一种策略，为的是赢得



我们在组织和加紧武装斗争时所需要的时间。”穆加贝说道。

总之，在穆加贝这样的情况中，缓和不过是自由的代名词。他需要自由——进行武装斗争的自由！

## 第四章 流 亡

### 内 部 矛 盾

民盟主席、民盟游击队司令赫伯特·契特波意识到，他的生命已处在危险之中。

早在1973年年初，他就产生了这种担忧。这一年的9月，民盟在卢萨卡举行了两年一度的代表大会。显而易见，与会者对党的领导权怀有野心。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什么政治分歧，但对权力的欲望，却使他们都想利用民盟、特别是民盟战斗部队内的种族结构，以求达到目的。

尽管对契特波的民盟主席职位的挑战，始终未能实现，但以契特波为首的民盟领导机构，在这次党代会上进行了大改组。民盟一向主要是由卡兰加和马尼伊卡两个派别组成的。历史上，它们是马肖纳部落中的两个敌对的民族。经过这次改组，以乔西亚·通戈加拉为首的卡兰加派——民盟游击队的核心职务由他们担任——确保了在财政、新闻和国防等方面的领导权，而以契特波为首的马尼伊卡派只是获得了民盟主席、外交书记和民盟游击队政委等职务。

第二年，权力斗争先是处于酝酿时期，然后由于民盟游击队在战场上遭到严重挫折而发生激化。民盟游击队因为执行契特波和通戈加拉在民盟代表大会之后制定的一项新的作

战计划，搞得弹尽粮绝，人员短缺。

契特波在1973年11月写道：“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让敌人把兵力部署到全国各地，从而削弱他们的战斗力。敌人因此而将从工业、商业和农业部门动员大批平民，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会大大影响白人的士气。”

从理论上讲，这一战略不无道理，但实际上却一事无成。到了1974年11月，也即执行新战略的第一年年底，罗得西亚人在维持着这样一种局面：白人每损失1人，游击队就被打死10人。在罗得西亚的东北部，民盟游击队仅仅剩下了150人。由于把战争推向全国，游击队本身铺得太散，从而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

就在这一个月里，民盟游击队发生了一次哗变。在赞比亚—莫桑比克边境上的奇福姆博民盟营地内，一批游击队员逮捕了他们的指挥官，控制了游击队的指挥权，并推举一位名叫托马斯·恩哈里的人为他们的领袖。此人是索尔兹伯里大学法律系的一位毕业生，五年前加入民盟。哗变人员全部是马尼伊卡人。哗变后，他们立即发表声明，谴责卡兰加人通戈加拉造成了民盟在战场上的失败。

12月9日，恩哈里带着20名游击队员来到卢萨卡，先是诱拐了通戈加拉的爱人和内弟，然后又绑架了民盟的3位领导人：行政书记穆库泽·穆德齐、福利书记孔比莱·坎盖和负责财政的书记亨利·哈马德齐里皮。当叛乱分子冲向通戈加拉的家中时，民盟负责新闻和宣传的书记鲁加雷·贡博发现了他们。他马上叫来警察，大部分叛乱分子当即被逮捕。

通戈加拉奉命到前线去镇压叛乱。元旦那天一早，他率军直捣奇福姆博营地，45名叛乱分子被打死，营地重新归由

效忠于他的部队控制。

一月二十二日，以契特波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对奇福姆博营地的叛乱者进行了审判。那些被认定有罪的叛乱分子——对其中一些人的审判只进行了几分钟——在距离法庭仅数百码的地方即被枪决了。奇福姆博营地的哗变事件，不只是引起了这次即决裁判，它还使卡兰加人确信，马尼伊卡人已经起来造他们的反。于是，他们掀起了一股绑架和枪杀马尼伊卡人的浪潮。一些人在莫桑比克遭到暗杀，另一些人在赞比亚被暗杀：被暗杀者足有一百余人。

在这些“猎手”们看来，哗变阴谋的总后台必定是契特波。于是，契特波的地位很快就变得摇摇欲坠了。由于他的一些朋友是由他下令枪杀的，而那些仍然活着的支持者，便指责他出卖了他们，背叛了马尼伊卡人。而卡兰加人则相信，契特波是叛乱分子企图推翻通戈加拉的后台老板。

在1月至2月的两个月里，通戈加拉派的人有效地控制了民盟，契特波这时已是民盟名义上的领导人。3月16日，他对卡翁达总统说，民盟已经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并且说他自己的生命也已危在旦夕。当卡翁达问他“谁在威胁你？”他回答说：“通戈加拉和哈马德齐里皮。”

大约36小时以后，当契特波在卢萨卡他的寓所前准备开车离开时，车内突然爆炸了一颗炸弹，契特波被当场炸死。

这次暗杀事件，在民盟军队内和党内引起了严重混乱。通戈加拉逃到了莫桑比克，他的盟友则逃到了坦桑尼亚。卡翁达总统获悉后暴跳如雷，发誓要“千方百计”追捕暗杀契特波的凶手。

暗杀事件发生后没过两个星期，卡翁达就宣布一个由14个非洲国家的官员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契特波



遇刺事件。调查委员会经过一年的调查，才得出结论。通戈加拉被遣送了回去，并被判决有罪。

据调查委员会声称，以通戈加拉为首的民盟高级军事指挥部，在事件发生的前两天，发出了暗杀的命令。这样便排除了史密斯或赞比亚参与暗杀事件的可能性。

但是，通戈加拉直到临死那天，仍然矢口否认对他的指控。他一方面谴责史密斯、沃斯特和卡翁达，同时坚持认为：契特波的死如果不是他们造成的，就是他们所推行的“缓和”政策的一种胜利。后来，穆加贝也同意了通戈加拉的这一观点。他在1976年的时候说：“我认为暗杀行动是通过赞比亚政府进行的，或者说赞比亚政府直接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

确实，通戈加拉在1979年12月临死的前一天还曾问萨莫拉·马谢尔：“您相信我曾杀害过什么人吗？”

马谢尔总统回答说：“我不相信。”

通戈加拉听后说道：“我对此感到很高兴。”

然而，这次暗杀事件给民盟、特别是通戈加拉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被监禁了18个月，正当民盟和民盟游击队需要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期待着新的领导人时，他却被关在铁窗背后。

由于契特波遇刺身亡，通戈加拉身陷囹圄，民盟的领导职位出现了空缺。在此期间，穆加贝终于逐渐成为民盟和民盟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虽然他受到了挑战。

但是，穆加贝在索尔兹伯里享有的自由是相当有限的。契特波的死和西索尔的被审判，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他只有一种选择：逃到莫桑比克去！

卢萨卡暗杀事件发生后才一周，西索尔即被指控为领导非法组织——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当南非的沃斯特插足

进来时，审判已经进行了11天。沃斯特提醒伊恩·史密斯，审判西索尔只能破坏实现和平的机会。史密斯非常勉强地中止了审判。24小时之后，西索尔即同恩科莫和穆佐雷瓦一起，去坦桑尼亚参加首脑会谈。

这时，穆加贝对媾和者们不仅表示怀疑，而且对他们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史密斯和沃斯特的动机很简单，那就是勾引恩科莫、莫佐雷瓦和西索尔出卖非洲人。穆加贝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不会奏效的，因为真正的民盟——他领导的民盟——是决不会接受和谈的花招的。

## 撤退 流亡

但是，他首先必须使自己成为民盟无可争议的领袖。然而，这在罗得西亚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而这时由于契特波的死和卡翁达为此而产生的狂怒，他如果到赞比亚去建立他的领导地位，也是不可能的。

4月中旬，穆加贝和埃德加·特克雷准备离开罗得西亚。他们有足够的证据相信，如果采取这一行动，就可望有数百名自告奋勇的游击队员跟随。他们与其他同在12月份获释的拘留人员一样，获释后，一直在家乡偷偷地招兵买马，新兵们需要在莫桑比克有训练营地和落脚之处。

特克雷十分支持穆加贝。“我那时和现在一样，热爱穆加贝。”三年后，特克雷在莫桑比克回忆道：“穆加贝给予我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给了我非常多的教诲，在整个关押期间，他一直让我坚持学习。

“他教育我懂得了自己，教育我懂得了斗争。我毫无疑问地跟着他走，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道路。”

但是，他们不能自由自在地离去，只能偷偷地跑出去。最后，他们实际上是徒步走出了罗得西亚。穆加贝翻山越岭，偷偷地逃到了莫桑比克。有趣的是，数年后，他领导的军队又顺着同样的道路，翻过同样的山岭，向罗得西亚发起进攻。穆加贝和特克雷有时坐汽车，有时步行，几天后终于到达了边境。然后，他们在尼阿富鲁农业合作社里停了下来。这地方与罗—莫边界仅相距数英里。

多年来，这个大约有3,000人组成的部落，一直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同史密斯政府进行战斗。早在第一批白人到达之前，酋长雷卡伊·唐韦纳的祖先就已埋葬在这里。然而，这对史密斯政府来说，却几乎毫无意义。他们的土地一半分给了白人，因为政府说这些土地是他们擅自占有的。政府派去推土机，将尼阿富鲁人的茅屋推倒，尼阿富鲁人被迫跑到山上，最后在英国传教士的帮助下，组建了一个合作社。

穆加贝被尼阿富鲁合作社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和特克雷在这里呆了两个星期。“这是我一生中受教育的两个星期。”穆加贝后来回忆道。

穆加贝和特克雷在那里休息、读书，并观看了合作社劳动时的情景。四月底的一天夜晚，唐韦纳派一批部落人将他们偷偷地送出了边境。他们没有走最容易的道路进入莫桑比克民族解放军控制的地区，而是在穆加贝的坚持下，插入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以下简称“民族解放军”）游击队的驻地和活动地带。在穆加贝一路上所遇到的游击战士中，有一些是前几个月他在罗得西亚秘密召开招募会议后，被送到莫桑比克去的。对穆加贝来说，与这些游击战士重逢，是至关重要的，这使他有机会表明，他对自己正在试图领导的军队有兴趣，并同它有关系。

几周后，尼阿富鲁部落的七位长老，因为帮助穆加贝等民族主义者逃跑，被判刑入狱。由于存在这一背景，以下的情况也就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酋长唐韦纳和他的数百名部落人，属于最早跟随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人；酋长唐韦纳于1980年6月胜利返回尼阿富鲁，是独立后最早返回家园的津巴布韦人。

穆加贝正好是在马谢尔上台前的两个月到达莫桑比克的。当时，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已经偃旗息鼓，预定总统马谢尔正面临着使他的国家逐步适应和平这个直接的问题。

两人是初次见面。马谢尔对穆加贝能否领导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疑信参半。再说，当时他也无暇顾及这种导致契特波遇刺身亡的角逐和纷争。这些因素使得马谢尔在见到穆加贝之前，对这位初来乍到的居民满腹狐疑。可是，一见到穆加贝，他就疑团顿释了。

就经历和成长过程而言，马谢尔和穆加贝之间，真是大相径庭。马谢尔是一位尚武的总统，他一直是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丛林战中上的学；而穆加贝则是一位文质彬彬的、有点儿学究气的革命者，主要是通过监狱里的大量阅读受的教育。

但是，“慧眼识真珠”，两人一见如故，互相钦佩。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对方有什么吸引力，而是双方都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们可以取长补短。

不过，马谢尔当时除了给穆加贝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处以外，还无法给他提供任何别的东西。再说，这位莫桑比克领导人希望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穆加贝是津巴布韦民盟和民族解放军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尤其是后者，对他来说更为重要。马谢尔深信，今后津巴布韦的领导人也要象他那样，从



战斗部队中脱颖而出。当时他还不能肯定穆加贝将是这样的人。

由于这些因素，他将穆加贝“包藏”了起来，把他安置在海港城市——克利马内的一间房子里。这虽然不能完全说是对穆加贝的软禁，但穆加贝却毫无行动自由。

以后的几个月，是穆加贝一生中最最孤寂的时期，但似乎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几个月。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得以有机会建立了他的领导地位，并巩固了若干年前在狱中进行的那次“投票”的结果。

他需要获准外出“旅行。”但他的“旅行”非常的频繁，一会儿到莫桑比克北部省份，视察正在日益壮大的游击队营地和难民营。一会儿到坦桑尼亚去建立训练营地（后来解放战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会儿又进行首次争取外援的尝试（他知道以后需要这些外援）。

1975年，当恩科莫、西索尔和穆佐雷瓦在通过沃斯特与史密斯搞缓和——以同年8月在维多利亚瀑布为达成一项解决方案而进行的尝试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时，穆加贝则在精心地培育他在民盟军队中的威望。虽然对于穆加贝来说，担当游击队领导的角色丝毫也不轻松，但凡是在他多次走访营地时，听过他满怀激情地宣传武装斗争的人，都不会怀疑他的坚定信念。穆加贝从越过边境进入莫桑比克的人数方面判断，知道他已经在赢得为创建他的权力基地而进行的战斗。

在穆加贝逃离罗得西亚以后的六个月里，跟随他而来的难民大约已有1万人，其中很多人都适合参军。不过，伊恩·史密斯和他的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彼得·沃尔斯也没有失分。当时的形势，迫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同非洲人全国

委员会进行谈判。

穆加贝预料，史密斯决不会作出足够的让步，在解决罗得西亚问题时，将西索尔、穆佐雷瓦或恩科莫三人中的任何一个吸收进去。他据此确定了战略方针。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维多利亚瀑布和谈的失败，终于使前线国家的总统们，特别是卡翁达和尼雷尔相信，除了进行武装斗争以外，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和马谢尔一样，所需要的是证明穆加贝地位的“证书”。

不久，“证书”就得到了。同年10月，民盟在坦桑尼亚的最大的游击队营地——姆加高营地的数十名军官发表一项备忘录，严厉谴责穆佐雷瓦、西索尔和詹姆斯·契克雷马。不然的话，这三个人可能会声称民盟游击队是属于他们领导的。

“事实证明，这三个人根本没有希望，也没有能力担任津巴布韦的革命领袖。”军官们在提交非洲统一组织以及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政府的备忘录中写道，“他们醉心于自己的权力之争，千方百计地阻碍民族解放斗争。他们根本不关心革命，不关心人民，只关心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倾心的是对权力贪得无厌的追求。”备忘录接着指出：“只有罗伯特·穆加贝才能作为中坚。”

维多利亚瀑布和谈的失败，也促使恩科莫的人盟军和民盟军之间实现了停战，并签订了盟约。同年11月，双方经过数周耐心的谈判，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津巴布韦人民军”（以下简称“人民军”），其高级指挥机构是一个由18人组成的委员会，双方各派9人。

由于民盟在战场上的人数，要比人盟多得多，所以它给人民军提供了一位体格强壮的总司令。此人名叫雷克斯·尼

翁戈。他虽然年仅27岁，却已经是游击队的一位领导人。此时仍还关押在赞比亚监狱的通戈加拉，不得不赞同对尼翁戈的任命。当时，马谢尔曾婉转地问通戈加拉是否支持穆加贝，他回答说支持。

不久，穆加贝所需要的武器开始来临了——虽然不象汹涌的洪水那样，却也犹如涓涓细流，但这足以证明他至少已经拥有火力，而不仅仅是对史密斯和沃尔斯有某种刺激。

苏联的枪支弹药——原本是给恩科莫的人盟军的——开始运抵莫桑比克港口。接着，穆加贝扩大了他的来源网，又从中国获得了武器。

1976年元旦，游击队从莫桑比克向罗得西亚境内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渗透行动。近1,000名游击队员——其中许多人尚未受过正规训练，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刚从坦桑尼亚的训练营出来——试图尽可能偷偷地混入罗得西亚东部边境的部族托管地。他们在那里可望得到与穆加贝有着密切联系的部族的支持。游击队的战术一如既往，还是袭击白人的农庄和仓库。其结果当然也相同。游击队每发动一次袭击，都有许多人被治安部队打死。但是，这时白人当局，对于通戈加拉和契特波提出的作战计划——把战争尽可能扩大，以打掉白人的锐气——不得不认真对付了，因为游击队的人数已非同以往。

结果正是通戈加拉和契特波所期望的：罗得西亚白人当局不得不加紧征兵，将兵力增加了50%，凡38岁以下的男子，一律都得服役。

1976年2月，穆加贝将前线国家的总统们请到他新的家乡克利马内。前来参加这次首脑会议的有马谢尔、尼雷尔和博茨瓦纳的塞雷茨·卡马。恩科莫告诉他们，他同史密斯的

谈判——寻求缓和的最后尝试——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穆加贝耐心地坐在一旁，他知道他必将成为主要的获利者。

首脑会议结束时，卡翁达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前线国家对于史密斯的忍耐已经丧失殆尽；西方国家由于未能支持前线国家的和平呼吁，使它们感到失望。卡翁达的发言还指出，战争和穆加贝式的马克思主义人物（这一点是暗示的）的黯淡前景。

他说：“现在，他们一贯最害怕的因素——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被引入津巴布韦，因为现在多数统治必须在战场上才能作出决定。”

彼得·沃尔斯迅速作出了回答：“我们决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也决不会向马克思主义分子鼓动的任何夺地运动投降。我们将进行战斗！”

## 寻求国际支援

穆加贝最需要的是马谢尔的支持。在克利马内首脑会议上，他终于得到了这种支持。几天后，当罗得西亚空军向一个正好位于莫桑比克境内的村庄发动袭击时，马谢尔总统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他关闭了同罗得西亚的边境，让其年轻的革命政权立足于战争。

更重要的是，他允许并全力支持穆加贝，把莫桑比克北部太特省作为向罗得西亚发动军事进攻的基地。

但是，穆加贝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他还需要到外部世界去结识朋友。次月，穆加贝去到瑞士的苏黎世，这是他作为民盟名正言顺的领导人所进行的第一次出国旅行。

对于穆加贝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挑战。这次旅行是在



局势极不明朗的情况下进行的。不错，他在党内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他不能轻松地说他已经是民盟的“军事领袖。”当时这个头衔属于尚在赞比亚监狱里的通戈加拉。津巴布韦人民军团结一致的可能微乎其微，民盟军和人盟军之间的相互怀疑日益严重。

此外，穆加贝当时的健康情况也很糟糕。克利马内地区的气候，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也潮湿得令人讨厌，因此，他被累垮了。在前往欧洲的途中，穆加贝在加纳作了停留，以便亲自去看看他儿子的坟墓。他象往常一样，触景生情，悲痛欲绝。

他在苏黎世进行的募款和寻求支援，均未获得很大成功，尽管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对他的才智和对事业的忠诚不渝留下了印象。

在穆加贝即将离开时，一个支持民盟的组织——“战斗的非洲”赠给他10,000瑞士法郎。这是穆加贝代表民盟所接到的第一笔大宗赠款，从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确切地说，这是对他的一种鼓励，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这笔钱本身并无多大意义，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对穆加贝的支持。

在苏黎世一次规模很小的仪式上，一位小姑娘送给穆加贝一笔钱。这位小姑娘一直没有被忘记。四年后，穆加贝确定邀请她前去参加津巴布韦的独立庆典。在索尔兹伯里的招待会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大使和外交官们惊异地大声打听这位小姑娘究竟是谁，象她这般年龄的孩子，为什么得到与他们相同的礼遇和款待，包括当选总理不时紧紧地拥抱她。原来，她就是那位苏黎世小姑娘，穆加贝缺少朋友时的一个见证。

## 反 妥 协

穆加贝返回克利马内时，满有把握地感到，他现在可以给民盟以及民盟的宗旨和政策打下自己的烙印了。4月15日，穆加贝向民盟全体干部和党员发出了一份备忘录。从上端的地址——莫桑比克克利马内279号邮政信箱——可以看出，这份备忘录一开始就很谦恭。备忘录首先写道：“亲爱的同志们，首先向你们表示祝贺！现在，民盟再一次昂首阔步地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备忘录接着说：“诚如你们大家所熟知，民盟在1974年12月7日以后的将近一年时间里，一直在为它的生存和消除它所遭遇到的最大不利而战斗。这种不利是那些狡诈的缓和设计师们所造成的。面对这场斗争，我们队伍中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竟然选择了软弱、屈膝投降的道路，而不是去走坚持斗争这条艰辛的道路。”

“一点不假，我们发现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总司令（西索尔）玩弄了空前严重的反革命手法。他突然摇身一变，可耻地投降了敌人，从而抛弃了他自己曾经帮助建立的武装力量。在这过程中，他与敌人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堕落成了整个革命事业的地地道道的叛徒。”

“面对这些情况，一个普通的民盟党员可能会问（这是理所当然的）：‘同志，既然黄金都已生锈，生铁还有什么用？’我们的回答相当简单：真正的黄金决不会生锈。问题是我们上了当、受了骗，错把青铜当成了黄金。”

“要知道，青铜是一种低劣的金属，它会随遇而变，是机会主义的大王；而黄金却是一种优质的金属，它蔑视变幻

无常和自己的境遇，它坚强不屈、矢志不渝。”

穆加贝在表明了他担任领导的条件后，谈到了在他领导下整顿民盟的问题。他对民盟各地方委员会和它们的分会（包括卫生、社会服务和教育等部门的分会在内）的构成、作用和职责等，都作了清楚的说明。

凡是备忘录中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

“有必要提出的是，”穆加贝在备忘录中写道，“在制定组织计划的时候，要把赞比亚排除在外，虽然那里是民盟国外成员最多的地方。道理很清楚，因为赞比亚至今仍是一个敌对国家。但是，在赞比亚的民盟组织，要在这样或那样的隐蔽之下，继续相当有效地进行活动。因此，在北美必须建立我们的特别工作组。联合王国和欧洲是我们的国外支持者人数次多的地方，那里的特别工作组将随后建立。

最后，穆加贝谈到了军事和战争问题。他在这些方面的地位是不牢固的，当时他还在设法争取民盟军队的支持，并力图控制它。穆加贝知道，在过去几个月里，恩科莫（直到这时仍控制着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和西索尔（正在试图建立非洲人全国委员会的国外组织——津巴布韦解放委员会）已先后走访了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游击队营地。

但是，穆加贝毫不让步，态度严厉，坚信游击队需要他去当领导。他说：“让我利用这一机会澄清一个仍在引起人们关心的问题：民盟—民族解放军和非洲人全国委员会—津巴布韦解放委员会<sup>①</sup>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民族解放军决不会受津巴布韦解放委员会的干涉和控制。决不会！决不会！”

---

<sup>①</sup> 非洲人全国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机构。——译者

“我们有必要允许小小的人盟军队的士兵加入我们的部队，这样可以排除发展起另一支军队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要求这支军队的士兵，与恩科莫及其反革命同伙彻底决裂。

“这样，民盟和人盟之间就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战线。但是，这种统一战线仅仅囿于作战方面，不扩大到其他领域……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混淆。我们只是同人盟在军事方面建立统一战线，在这中间我们的人员占多数。”

最后，穆加贝以谦恭和坚定精妙地交融一起，结束了他给同志们的第一封信：

“如果你们对整顿民盟的计划有什么改进意见，欢迎你们向我们提出。如果没有，那就请你们使民盟的各级组织踏上战斗的征途，贯彻既定方针，不必再等待我们的进一步指示。

顺致

战斗的敬礼！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总书记

罗伯特·穆加贝”

这是穆加贝从克利马内发出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备忘录。这一年的春天，他频繁地前往马普托。在那里，马谢尔总统分配给他一间面积不大、但很舒适的葡萄牙式别墅。别墅坐落在一条两旁建着平顶房屋的街道尽头，紧靠海滨大道。这条路的名字叫玛丽亚·塞贡达大街，它是莫桑比克独立后，全国各地幸存的几条仍以葡萄牙人的名字为路名的街道之一。在以后的四年里，这间别墅成了穆加贝的家。萨丽以其特有的“物尽其用”的本领，迅速地将别墅变成了住家。不久，院子里欢跑着一只只小鸡。萨丽自己则再次一头



扎进了厨房。穆加贝终于感到，他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基地了。于是，他在马普托的博拉——专供达官贵人和外国使馆人员居住的地区——附近开设了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在一幢高楼里，并不怎么理想。办公室的顶上是苏联驻莫桑比克的外贸专家，楼下是民盟办公的地方。但这不过是一种开端。

穆加贝从一开始就同驻马普托的苏联人关系不好——最佳时冷若冰霜，最糟时大发雷霆。当时苏联已经选定它在津巴布韦的“代理人”。此人就是乔舒阿·恩科莫。在以后的3年里，穆加贝一次又一次地同苏联人交谈，要求给他的部队提供重武器。但是他每次都小心谨慎地坚持说明，在提供援助时不能附带任何条件。

穆加贝总是得到苏联人千篇一律的回答：他，穆加贝，必须承认恩科莫是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者的首领。有一次，苏联在向穆加贝提供武器时，居然要求他以书面形式承认恩科莫是领袖。穆加贝大为恼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求助于苏联人。相反，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人。1976年年中，他同北京建立了一种“义务关系”。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北京将要求得到什么报答？

穆加贝马上否认了中国的援助使他成了中国代理人的谣传。

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援助，我们就不能进行民族独立战争。但是，中国人在向我们提供武器时，从来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在中国人和我们之间有着一种谅解，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朋友，可以自由地推行我们认为最最适合于我们国家的各种政策。

“我们从中国人那里获得武器，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嫁给了他们。”

他接着说：“我们决不会屈服于任何企图让我们抛弃中国朋友的压力，他们对我们非常好。”

穆加贝是驻莫桑比克的大多数西方国家使馆的常客。这些使馆大多竭尽全力向它们的政府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个正在莫桑比克建立权力基地的人的情况。穆加贝在走访时，总是客气但又固执地告诉他们他在想什么，几乎首次见面就给所有这些使馆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位当时曾见过穆加贝的西方外交官回忆说：“我同他一接触就感到，他远远超过了（罗得西亚）其他各位民族主义领导人。记得当时我曾想，这个人应当领导罗得西亚。”

纽约国会议员斯蒂芬·索拉兹与这位西方外交官所见略同。他是在穆加贝居住莫桑比克的第一年里见过他的极少数西方政治家之一。索拉兹在南部非洲进行实地调查时，对他所听到的有关穆加贝的情况很吃惊。于是，他决定在调查结束时，到克利马内去看看他。

“当时——和现在一样——穆加贝给我的印象是，他是非洲大陆最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索拉兹在1980年穆加贝当选后说道，“他最显著的特点是聪明、老练，以及善于接受形形色色的思想和观点——不管它们是来自北京的、莫斯科的还是华盛顿的。当然，他并没有使我感到他是一个狂人。”

穆加贝开诚布公地介绍民盟情况的作法深深吸引了索拉兹。他说：“穆加贝非常率直。从他介绍的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民盟内部存在着分歧。但是穆加贝一再表示，他把民盟的完整和团结看得高于一切。”

在中国人的支持下，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者的武装斗争日益发展。4月份，当穆加贝迁移到马普托去居住时，500多名

战士偷偷地越过了边境。同年6月，又有300人被派遣到罗得西亚。这时，游击队虽然还集中在边境地区，但随着它们在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方面的改善，斗争的成果也比以前好多了。游击队在当地居民中，首次成功地进行了策反工作。在奇雷齐和齐宾加周围的蔗糖和小麦种植园，游击队开始向工人们发布罢工命令。游击队声称，如果工人们违抗命令，就在他们上班途中，伏击公司的公共汽车。游击队用地雷炸毁道路，甚至用迫击炮轰炸磨面厂和抽水站。

索尔兹伯里方面的回答是，首先进一步征兵，然后在8月间向莫桑比克境内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袭击。

罗得西亚白人袭击的营地，位于尼阿佐尼亚，距离罗—莫边界大约35英里。罗得西亚人事先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演习。在真正袭击时，他们首先派出一支先遣队，穿着莫桑比克解放军的军装，乘着上面印有莫桑比克解放军标志的卡车，甚至唱着莫桑比克解放军的战歌。尼阿佐尼亚营地的数百个难民——营地中还有大约700名游击队——看到他们前来，立即聚集在一起表示欢迎。就在这个时候，罗得西亚军队向他们开了火。

史密斯声称，这个营地是游击队的一个训练营。而穆加贝则一再说它不是。

据派往实地调查的联合国特使向新闻界宣布，在这次袭击事件中，有670个“难民”——他重复了“难民”这个词——被杀害。

## 和 谈

亨利·基辛格制订了一系列在罗得西亚实现“旋风式和

平”的计划。穆加贝认为，这些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基辛格又是诱骗，又是劝说，最后促使史密斯同意了“多数统治”（但史密斯并不同意“黑人多数统治”）。然而，这一事实压根儿也未能使穆加贝相信白人会作出全面妥协。

不管怎么说，基辛格1976年中在南部非洲的穿梭来往，毕竟使得穆加贝能够在国际上以名正言顺的民盟领袖的面貌出现。前线国家——至少愿意接待基辛格这位变幻莫测的美国国务卿——试图在召开任何形式的和平会议之前，消除罗得西亚民族主义者中间的分裂和分歧。前线国家的总统们经过亲自试探，知道穆加贝已经在民盟游击队和津巴布韦人民军内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信任。于是，他们彻底抛弃了西索尔，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恩科莫，对他在前几个月同史密斯的谈判，感到某种程度的厌恶。

这样，效忠于恩科莫的人盟武装力量便遭到了孤立和威胁。这些部队已经同驻扎在坦桑尼亚难民营中的民盟部队发生过冲突。当他们获悉要被编入津巴布韦人民军，并归雷克斯·尼翁戈指挥后，就逃跑了。

1976年9月，前线国家的总统们把穆加贝、恩科莫、西索尔和穆佐雷瓦召集到达累斯萨拉姆。如果说他们曾经希望把他们撮合到一起的话，那就完全错了。穆加贝和恩科莫根本就不打算消除分歧、言归于好。尤其是穆加贝，对恩科莫的态度十分严厉。他指责恩科莫故意将人盟撤离战场，让民盟—人民军单枪匹马地进行战争，单独蒙受损失。西索尔在会上宣布退出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并声称他将单独成立他自己的民盟组织。穆佐雷瓦准备返回罗得西亚，以期成为一个在国内建立基地的民族主义者。



3个星期后，史密斯向全国发表了他的历史性讲话，宣布接受多数统治的原则。他声称提供了“我们以前从未有过的机会，让罗得西亚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

这时，所有各派都不得不走到谈判桌旁来。难道果真如此吗？不！在史密斯发表上述讲话之后才3天，穆加贝即对驻扎在赞比亚的游击队发表谈话。迹象表明，他要打消和谈的想法。在他看来，参加这种会谈不会有什么收获。基辛格的和平计划，使白人仍可实行有效的控制——控制军队、控制警察。说到底，实际掌权的还是白人。

在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失败之后，穆加贝受到了过多的指责——指责他公开拒绝妥协，指责他在会议开始之前就企图破坏会议的信誉。

实际情况是，穆加贝在这个时期，完全相信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迫使史密斯真正进行谈判。而且，他还在设法巩固他同游击战士的可靠关系，因为他认识到，如果游击战士对他缺乏忠诚和信任，他就始终不能迫使史密斯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

9月27日，穆加贝对游击战士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彻底摧毁史密斯的军队，并立即用民盟的武装力量代替它……我们不必担心基辛格——英国建议，他们可以扶植起任何他们所需要的傀儡政府，但傀儡政府不可能把我们包括进去。”

后来，前线国家为了设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阵线，试图将恩科莫和穆佐雷瓦结合在一起。如果这两个人没有因为争风吃醋而发生火并，那么前线国家的这一努力是有可能奏效的。恩科莫和穆佐雷瓦都回到了索尔兹伯里，去同

他们的支持者商讨有关建立联盟的问题。穆佐雷瓦回国时，受到了一大批人的欢迎，而迎接恩科莫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两个人是一贯依据出来迎接的人数来估量他们的威望的。穆佐雷瓦因此而感到，他并不需要恩科莫。这样，恩科莫便只有一条出路了：与穆加贝妥协。他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眼睁睁地失去自己的军队和前线国家的支持。10月初，尼雷尔总统把穆加贝和恩科莫召集到达累斯萨拉姆。两人在一起整整会谈了7天。10月9日，双方宣布结成联盟。他们把这个联盟称为津巴布韦“爱国战线。”<sup>①</sup>但实际上，爱国战线并没有共同思想和战略，甚至缺乏信任和友谊。他们的结合，主要是一种权宜之计。

穆加贝和恩科莫一起发表声明，要求召开日内瓦会议。他们提出的条件是：罗得西亚取消对政党的各种限制，停止政治审判，释放政治犯，以及把史密斯的代表团并入英国代表团，从而把它削弱为英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侧翼”。

穆加贝作为未知的因素前往日内瓦。当时基辛格还没有见过他，英国人虽然通过驻马普托的大使馆，小心谨慎地发展了同他的关系，但据说穆加贝对他们的意图仍然非常怀疑。穆加贝从英国使馆人员那里接受伦敦《泰晤士报》，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报纸，但是他不愿让他们的关系超越亲热和礼貌的界限。

当英国大使馆把穆加贝和他的代表团成员叫去领取赴日

<sup>①</sup> 1974年，人盟、民盟、津巴布韦解放阵线、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共同组成联合阵线，不到一年即解体。1976年10月，民盟与人盟组成爱国阵线。

内瓦参加会议的机票时，他们表示不能接受这些机票，因为其中有几张是头等舱的票（穆加贝一张，穆增达和其他两个人各一张）。于是发生了一场可笑的纠纷。最后，穆加贝他们把机票退给了英国人，然后用退票的钱全部买了经济舱的票，这样，他们便多派了几位代表。

穆加贝和英国人经常在动机方面互相发生误解，这是他们关系的特征。

“是的，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年前，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道，“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运用这些原则的方式却有所不同。我们国家的情况非同一般，我们有大约500万人在农村当农民，而其他地区大约只有100万人，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经济状况（这种状况是由殖民者造成的）。

“要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对改变津巴布韦目前形势，提出一个明确的方案。”

当爱国阵线宣告成立时，马谢尔总统和穆加贝、恩科莫在一起照了相。莫桑比克的报纸刊登了这幅照片，电台播送了公报的全文。18个月后，穆加贝终于得到了主人的全面接受和支持。

穆加贝在与恩科莫会谈时，双方都同意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和磋商，这在几天前还是不可思议的。

他们到达日内瓦后，穆加贝立即抓住机会采取了主动行动。当有人问他希望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罗得西亚时，穆加贝回答说：“我要说的是，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准备仿效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抛弃自由企业。即便是在苏联和中国，也还存在着小资产阶

级。

“不过，我们不允许津巴布韦的任何一个白人剥削者保留一英亩土地。”

穆加贝的这番谈话，加之有人向新闻界透露他在前往日内瓦途中，曾对代表团成员说，他们的目的是去“挫败史密斯的势力”，给人造成了他是“残暴成性的恶魔”的形象。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这个形象始终萦绕着他。

但是，不管有人给穆加贝贴上了什么样的标签（伊恩·史密斯说他是“乔装打扮、腾云驾雾的妖魔”），这次日内瓦会谈还是给穆加贝提供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使他得以肯定自己已经控制了全党。在日内瓦会谈即将开始之际，穆加贝作出了请求释放仍然关押在赞比亚的通戈加拉等人的决定。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它反映出穆加贝又有了新的信心。通戈加拉（他在抵达日内瓦时发表了诸如“史密斯是我的敌人”之类的不痛不痒的战斗声明）因此而欠下了穆加贝的帐。在与外界隔绝的18个月里，通戈加拉多亏了穆加贝的忠诚和支持。而通戈加拉在第二年的关键时刻，也决没有忘记穆加贝当初曾把释放他，作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先决条件之一，否则，他也许会接受反对穆加贝领导地位的思想。

日内瓦会谈吵吵闹闹，甚至还未开始就几乎失败了。恩科莫和穆加贝重申了两周前他们在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时提出的要求。穆加贝的代表团甚至当着面，严厉批评会议主席、英国人艾弗·理查德。

在会议开幕前夕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和通戈加拉一起获释的穆库泽·穆齐对理查德说：“你别以为我们只是一大帮该死的黑鬼”。



最后，当爱国阵线提出理查德就是没有足够的资格来主持这次会议时，甚至连英国人也承认感到灰心丧气了。后来，爱国阵线虽然放弃了这一立场，但由于敌对、怀疑和仇恨的气氛十分浓重，以致达成协议的前景已经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害。

会议的第一个障碍，是独立前的过渡时期问题。史密斯顽固坚持基辛格提出的、其实质是保护白人的计划，一再表示他已同意过渡时期为两年。而穆加贝则提出过渡期只能是12个月。

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僵持了1个月。随后，各方在临时政府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上又无法取得统一。

在会上，穆加贝有时显得情绪非常好，他那争论和答辩的才能在不断地发展，这时就连他的对手和英国人也承认他具有争辩的才能。而私下里，他准备在会议开始几天后就回去。他觉得这样开会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只是由于尼雷尔和卡翁达的压力，他才不得不留下来，直到会议在独立问题上发生争执为止。穆加贝对民盟的财政开支很担心，他下令他的代表团搬出收费昂贵的旅馆，住到小客店去。尽管穆加贝坚持由他们自己做简单的饭食，并采取了其他一些节省开支的措施，但在民盟代表团离开日内瓦时，仍欠了客店一万瑞士法郎。穆加贝让民盟的几位干部暂时留下，设法从同情他们斗争的团体那里募集一部分钱。最后，瑞士政府出面支付了民盟代表团的全部欠款。

穆加贝有史以来第一次登上了世界舞台——每天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大群的记者等候在他的旅馆和会议大厅外，报纸和电视台不断要求采访他。这一切与其说使他感到烦恼，毋宁说使他感到惊奇。他意识到从此以后再也不能享受

他以前一贯喜爱的隐居生活了。

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穆加贝每天都是很早就起床。大约在清晨五点的时候开始进行1小时的“瑜加”，即沉思默想和体育锻炼。然后，他乘着城市还未醒来的当儿，作漫长的散步。他很喜欢利用这种机会，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漫步穿过城市中心。有时，他会在奢华商店的橱窗前驻足凝神。穆加贝说，这是他一天中唯一不引人注目的时候。

5周后，津巴布韦人民军司令雷克斯·尼翁戈飞抵日内瓦，加入穆加贝的代表团。数天后，他所住的旅馆房间里突然起了火。尼翁戈立即叫醒通戈加拉和住在同一层楼的其他人。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地冲了出去。这次火灾的原因始终未能查清。民盟说这是罗得西亚白人搞的鬼，而罗得西亚白人则隐隐约约地暗示说，这是民盟内部的宗派斗争引起的。在日内瓦会议失败后的几周内，他们都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

日内瓦会议之后，通戈加拉开始重新树立他的权威。津巴布韦人民军一事无成。民盟和人盟的军队仍还是一碰到就互相干仗。人民军名义上还存在，实质上已经成了民盟所属的民族解放军的代名。

津巴布韦人民军的高级指挥机构内，有三个人站在通戈加拉一边：首先是尼翁戈，其次是齐纳谢·马钦古拉（一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极端分子，曾在赞比亚讲授过经济。他与其说是一位战士，毋宁说是一位理论家），还有一位是伊莱亚·杭多（一位富有经验的游击队员，从60年代末期起就一直在前线）。

甚至在日内瓦会议和通戈加拉获释之前，这3个人就已对穆加贝僭越的领导地位首次提出了严重挑战。他们毫无保留地反对日内瓦会议，甚至拒绝考虑去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把穆加贝视为温和派，担心他会不可避免地被拉入一项把游击队排除在外的解决方案。1976年9月，马钦古拉在马普托电台发表讲话时，婉转地拒绝了穆加贝。他说：“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试图领导我们的宗派。”

他们的挑战不仅仅如此。马钦古拉强烈主张亲华，他在莫桑比克北部希莫约“契特波学院”的毛派组织中培植了一批追随者。“契特波学院”是给出类拔萃的受过军事训练的干部上政治课的地方。马钦古拉之流对穆加贝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补偿民盟的武器短缺不成功，感到很不高兴。甚至在日内瓦会议之前，他们就已计划关闭“契特波学院”。

尼翁戈和马钦古拉等人——被认为是持不同观点者——非常勉强地打着穆加贝的旗号来到日内瓦。到达后，他们发现穆加贝和通戈加拉已结成了政治—军事联盟。通戈加拉被任命为最高军事指挥，作为回报，他向穆加贝保证将全力支持他担任党的领袖。马谢尔总统获悉后，心里很高兴。

持不同观点者们回到莫桑比克后，发现自己已被孤立起来。以前，马谢尔总统允许他们随便进入马普托电台，而现在却不允许了。几周后，根据马谢尔总统的命令，整个马钦古拉集团——共约90人——都被抓了起来。其中有一些还是民盟的高级成员，如安全和情报局副局长詹姆斯·梅伊卡齐纳谢和穆加贝的妹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姆·盖扎博士。此外，分散在坦桑尼亚各大学的将近100名“持不同观点者”也遭到了拘留。

## 斗争新阶段

战争进行得很糟糕。日内瓦会议期间发动的一次进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穆加贝的领导地位遭到了威胁，这使他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打开权力之门的钥匙，最终还是掌握在那些指挥游击队的人手里。穆加贝决心不失去他们的支持，他对马钦古拉在抱怨缺乏武器和武器质量低劣时发出的警告予以了重视。5月间，穆加贝在非洲统一组织举行首脑会议时，公开严厉地批评该组织没有给他的军队提供足够的援助和武器。同年7月，穆加贝和通戈加拉一起前往北京，强调他的急需。在那里他发挥了他朴实但又坚定有力的劝说才能。这种才能，已成为他在同他认为是朋友的人相处时的特点。他决不会被人看成是在乞求，而只使人觉得他始终是在强调他的领导和党的独立性。

这时，萨丽也在从事巩固他们地位的工作。她走访了莫桑比克北部以及坦桑尼亚的游击队营地和难民营，一连几天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缺少食物、衣服和药品）。不久，萨丽又到国外去寻求支援。她定期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进行访问，并根据她的亲身经历，向人们生动地、充满激情地汇报罗得西亚难民的艰难困苦，事实证明，她既是一位出色的筹资者，又是民盟的一位能言善辩的宣传鼓动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穆加贝设法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实行一点儿军事纪律。在马普托列宁大街他的办公室里，他仿佛成了一位司令官，他的那些助手们则很象是他的副官。在前去见穆加贝时，他们总要踉踉脚跟或踉踉脚，以引起他的注



意。穆加贝在民盟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开始称他为“Chef”（葡萄牙文，意即“长官”。——译者）。如果不是叫他为“长官”，就是称他“同志”——即便现在当了总理，穆加贝仍然宁愿人们这样称呼他。

马钦古拉的未遂反叛，也对穆加贝的安全提出了问题。1977年，民盟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由于拆了一封装有炸弹的信件，在马普托的办公室内被炸死。这颗炸弹非常强烈，差一点把这位工作人员所在的办公室全部炸毁。事隔仅仅几个月，恩科莫的主要军事顾问贾桑·莫约又在卢萨卡被一颗装在邮包内的炸弹炸死。这一事件迫使马普托的安全和情报系统进行全面整顿。于是，穆加贝所到之处都带上了警卫员。他的办公室门外有一名警卫员，大门口又有一名警卫员。他请求莫桑比克人给他提供一台X光检查仪，以便检查他的所有邮件。可是，检查仪始终未能得到，他的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很快便堆满了信件和邮包。莫桑比克政府竟然说，民盟只能把邮件抛入海中。民盟的支持者们表示拒绝，他们小心翼翼地拆着邮包，以获取急需的衣服和书籍。直到1979年4月，民盟才从丹麦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台X光检查仪。

在通戈加拉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后，用他的话来说，民盟开始“咬人”了。民盟的进攻比以前有所选择，目的在于使白人毫无疑问地相信，如果他们维持现状，他们的处境就会很不稳定。2月间，民盟游击队打死了穆萨密圣保罗传道站的7名传教士。这地方距离索尔兹伯里市中心仅仅25英里多。8月间，索尔兹伯里市内的一家商店爆炸了一颗炸弹，有11人被炸死，76人被炸伤。民盟对于这种不加区别、随意杀害无辜平民的行动未作很多的辩护——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进行辩护的，但是他们认为这是迫使史密斯屈膝投降的唯一办法。

这一事件标志着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盟游击队根本不再认真考虑种族或原则方面的问题。结果是，无论是白人还是非洲人都受害。在部族地区，数百所学校被迫关闭，传教站的医院和医疗站面临着“不留就走”的绝对选择，农场主纷纷逃离农场，黑人农民停止工作。民盟的征兵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每月都有1,000多人离开罗得西亚奔赴莫桑比克。

## 领导地位

穆加贝严正声明：“独立是不可谈判的。”

正是根据这种不妥协的精神，1977年8月3日，民盟中央委员会在莫桑比克北部希莫约举行了历时9天的会议，最后确定了穆加贝的领导地位。在希莫约难民营和游击队驻地的露天会场上，穆加贝被宣布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主席，统一指挥党和军队。

“对我们大家来说，当时的情况已经很明显”，埃德加·特克雷在3年以后回忆道，“我们——民盟中央委员会以及民族解放军高级指挥部、总参部和全军将士——终于有人来掌舵了。”

穆加贝号召全党和全军发扬献身精神，讲究实际，更加有效地进行工作。他谴责最近的和解企图，和由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博士、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提出的英—美和平倡议。

他说：“这一切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花招，目的在于抵消我们的战争努力，和破坏我们的胜利。这一切是通过一个以国内为基地的走狗和（国际）反动势力的头面人物来推进

的。这些头面人物口头上大讲“多数统治”的原则，实质上却在怂恿它们的走狗，祈求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主子来破坏人民的斗争。

穆加贝并不只是慷慨陈词，他对欧文和扬的所作所为毫不信任。在公开场合（在达累斯萨拉姆和卢萨卡），穆加贝由于受到前线国家的压力，不得不表现出一点乐意。但他马上就意识到，殴文那种傲慢无礼、咄咄逼人的谈判方式，必定会促使爱国阵线和前线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对于扬，穆加贝的态度要好一些，但他始终不认为卡特总统任命一位黑人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就表明美国政策将发生全面变化。他深信，殴文和扬，都还不会迫使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里亚当局作出适当的让步。

不过，穆加贝对于这一点还是欣赏的：无论是欧文还是扬，都决心在任何一项解决方案中把爱国阵线包括进去，从而比以前基辛格的计划推进了一大步。据说，恩科莫和穆加贝在1977年这一年里，一直在设法建设他们争论不休的联盟。他们定期举行会晤，或是在马普托，或是在卢萨卡。穆加贝同往常一样，总是敦促恩科莫对民族主义战争承担更多的义务，强调为了他们的事业有必要放弃个人的追求。而恩科莫则坚持说，谈判仍然可能导致罗得西亚问题的解决。穆加贝进行反驳，他认为“武装斗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当时，敌对情绪仍然非常严重。恩科莫主观上讨厌去马普托——他把它称之为“敌人的国土”。一连好几个月，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缺乏统一，军事上也就未能结成联盟。

同年9月底，伊恩·史密斯和肯尼思·卡翁达在卢萨卡举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破坏了穆加贝和恩科莫形成较为密切关系的一切机会。毫无疑问，史密斯试图通过卡翁达与

恩科莫达成一项协议。卡翁达始终认为，恩科莫最有可能、也最合适接任总统职务。

史密斯和卡翁达秘密会谈的消息不胫而走。穆加贝获悉后大为恼火。他说，这次会谈的目的，只可能是增加恩科莫回国同史密斯做交易的机会。民盟内部对卡翁达方面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许多人对契特波被谋杀后进行的大逮捕记忆犹新。

穆加贝谴责卡翁达同史密斯会谈，并要求知道当时恩科莫是否也在场。卡翁达回答说没有。但是穆加贝说他不相信。他说，他现在总算知道恩科莫为什么不愿把他的所有部队投入战场了：他在等着同史密斯做交易，即使是史密斯在南非和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有可能垮台。

10月底，最新的和平特使卡弗勋爵抵达达累斯萨拉姆。恩科莫和穆加贝总算以爱国阵线的名义出现。会谈原计划举行2天，没想到实际仅仅历时了70分钟。恩科莫和穆加贝两人断然拒绝了英国和美国关于向罗得西亚派遣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确保停火的设想，要求由他们自己的部队来维持治安。穆加贝说，光宣布停火没有什么意思，同时还必须有白人当局移交权力的明确计划。

史密斯与恩科莫和穆加贝一样，显得几乎没有什么热情。当时，他已经在期待着同国内的民族主义者西索尔和穆佐雷瓦达成一项“内部解决”协议<sup>①</sup>。首先，他必须遏制——如果不能摧毁的话——穆加贝的日益强大的军队，以

---

<sup>①</sup> 1978年3月3日，史密斯撇开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同黑人民族主义者穆佐雷瓦、西索尔和酋长奇劳通过谈判，共同签署了关于内部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八点协议。后来，该协议简称为“内部解决”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产生的政府叫“过渡政府”。——译者



及这支军队在整个与莫桑比克接壤的边境上所构成的威胁。如果不把恩科莫包括进去，任何“内部解决”方案，都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人盟在罗得西亚与赞比亚和博茨瓦纳接壤的西部前线发动进攻。

同年11月，罗得西亚人深入到莫桑比克境内，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突然袭击。这次行动虽然并没有象沃尔斯和史密斯所期待的那样，改变战争的进程，但它给了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寻求一项独立于华盛顿、伦敦和比勒陀利亚的解决办法。

11月23日早晨7点30分左右，罗得西亚部队来到了莫桑比克北部的希莫约。这支部队不仅有喷气式轰炸机、战斗机，还有直升飞机（它们从大约60英里外的乌姆塔利空军基地运来了伞兵）。罗得西亚部队首先向难民营进行了一阵猛烈的扫射，然后进行轰炸，最后投下伞兵，把残剩的人和东西统统收拾干净。

3天后，有人发现埃德加·特克雷的妻子安妮·特克雷躲在一个茅坑里。她因为躲在茅坑里，才没有被罗得西亚非洲人步枪队（他们在发起第一次进攻之后，在那里停留了48小时）看到。安妮关于这次袭击事件的描述值得一读，不仅因为它对这次事件提供了骇人听闻的证据，还因为它在安妮的丈夫和民盟中央委员会其他一些同志的心中，引起了对白人政府的深仇大恨。

安妮是难民营的一位教师。她回忆道：“袭击行动正好是在孩子们早晨集合的时候开始的，我们先是听到一架飞机的声音，但因为当时天空阴沉沉的，我们没有看出是轰炸机，直到它们飞到我们头顶上才知道。随即，我们的四周和头顶上响起了一阵阵的爆炸声。于是，我们设法进行疏散，

告诉孩子们跑到附近的树林里去。

“在此以后，就不可能再将孩子们集中到一个地方了。我们没有受过军事行动方面的训练，因此不知道该怎么办。头顶上有比较小的飞机，也有喷气式轰炸机。有些飞机还投下了伞兵。而且，当时还有直升飞机，它们用机枪向逃跑的人们扫射。

“我们营地有一支小小的保安部队，大约100人。战士们用机枪进行还击，但是打了几分钟就没有子弹了。炸弹好象是酸性或易燃一类的。它们把孩子们都烧焦了，并在树林里燃起了大火。

“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得很远。当我朝希莫约方向看去时，发现伞兵已经在那里着陆。于是我当机立断，跑去躲在一个茅坑里。粪便深至我的腰部。最糟糕的是，一条条的粪蛆爬满了我的全身。但由于粪坑没有被炸弹摧毁，我感到比较安全。

“我站在茅坑里，不断地听到炸弹声和枪弹声，心里害怕极了，真想跑出来。我担心敌人有狼狗，会发现我躲藏的地方。每当听到有人声，我就吓得差一点哇地叫出声来。

“后来，我听到遥远的地方传来引擎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听出有人在讲马肖纳语，于是我便高声喊叫起来。他们发现了我。来人试图用绳子把我从茅坑里拖出来，但由于我的手在茅坑里浸坏了，无法将绳子绕在身上。最后，他们只好把茅坑砸坏，把上面的木条移开。我听到有一位学生问我：‘您是特克雷太太吗？’”

穆加贝（一年前他在听到尼亚佐尼阿难民营遭到袭击时，不禁失声痛哭，悲叹不已）对这次袭击事件极为愤怒。他大声责骂驻在马普托的英国外交官，要求知道英国人为什

么无动于衷，看着罗得西亚人“屠杀无辜的难民——妇女和儿童”。

欧文博士对这次袭击事件所作的评论使穆加贝更为恼怒。据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穆加贝在马普托时每天都收听），欧文说这次袭击行动正好显示了罗得西亚人的决心。“欧文居然这样讲话，因此怎么可能期待我同他这种人谈判？！”穆加贝气愤地说道。

不管难民营中的游击队人数实际上有多少——罗得西亚人声称他们在袭击时打死了1,200名——这次袭击事件使得穆加贝不可能再作出任何让步。不仅如此，它还促使穆加贝的那些“持不同观点者”终于企图推翻他。

一个时期以来，民盟中央委员会中的一些主要成员对穆加贝在思想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领导一直有疑问。这时，他们试图利用希莫约袭击事件在民盟内引起的混乱和不满，发动“政变”，推翻穆加贝和通戈加拉。

这批人以民盟负责新闻的书记鲁加雷·贡博和负责人事的书记亨利·哈马德齐里皮为首，得到民族解放军营地中一部分精干的指挥官的支持。为了获得支持，他们着重对穆加贝的领导才能和他所指引的方向发难。他们攻击他缺乏军事知识，不愿和游击战士一起上战场，甚至无所顾忌地同欧文和扬之类的人谈判。他们还指责穆加贝和民族解放军高级指挥部应对希莫约营地发生的大灾难负责。据他们说，希莫约营地的防务体系相当差劲（私下里，甚至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政府也对该营地缺乏安全感到惊愕）。

最主要的是，这批“持不同观点者”指责穆加贝等领导人未能认真地发展9月份民盟中央委员会在希莫约召开会议时所确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要求给

予游击队更大的政治权力，就象一年前马钦古拉所要求过的那样。

起先，穆加贝以为可以通过辩论来解决这次反叛。然而，当他在一月份听到叛乱分子的头目，已经同恩科莫进行了接触，企图通过将民盟并入人盟获得权力的消息后，便立即采取了行动。反叛分子被及时地逮捕了。据说，他们已经制定了绑架通戈加拉的计划。

这场反叛使穆加贝感到格外失望，因为他意识到，这可能会削弱他对付恩科莫和西方国家的能力。反叛也使穆加贝感到伤心，因为他知道这有可能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即便是当贡博、哈马德齐里皮以及象约瑟夫·契穆雷恩这样的前战地指挥员在狱中时，穆加贝也拒绝了他的中央委员会内的一些人提出的处决这批反叛分子的要求。

相反，穆加贝选择了另一种办法：在全党开展一场彻底的“清理”运动。这场运动不象清洗那样厉害，它主要是为了恢复穆加贝自己所一贯奉行的勤俭节约和禁欲的原则。对贡博的指控之一是滥用党的经费，在非洲和欧洲到处游山玩水，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民盟驻伦敦的一位官员因为动用公款在那里购买一套房，不久受到了审查。在马普托，穆加贝亲自下令全体党员在公开场合检点行为。马谢尔总统已经亲自要求他立即制止酗酒和玩弄女人，因为民盟的一些高级官员，在莫桑比克首都仅有的几处色情场所沉湎于酒色。

民盟内部的清理运动在顺利进行。1978年1月底，穆加贝前往马耳他，同恩科莫、扬和欧文进行会谈。当时，史密斯已经开始同穆佐雷瓦和西索尔就“内部解决”罗得西亚问题进行会谈。一切迹象表明，他们的谈判将会获得成功，过渡政府很快就会产生。



华盛顿和白厅都愿意为过渡政府和爱国阵线之间的谈判铺平道路，马耳他从中帮忙。爱国阵线同意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发挥作用，但穆加贝仍然坚持在罗得西亚过渡时期必须由游击队领导人来控制治安部队。

扬后来说：如果你碰上了一个既受过耶稣会的教育，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那是很难对付的。同罗伯特·穆加贝打交道的麻烦就在此。然而，穆加贝虽然在表面上显得顽固不化，其实却在慢慢地走向以英—美计划为基础的妥协。

恩科莫和穆加贝都担心，英国可能会接受“内部解决”协议。如果“穆佐雷瓦和西索尔这两个傀儡”——他们喜欢这样称呼他们——获得承认，对他们的制裁就有可能取消，这样便会使得战争在游击队正好可以实行控制的时候，变得从根本上有利于索尔兹伯里。

1983年3月（爱国阵线在坦桑尼亚举行了一次会议），尼雷尔总统预料罗得西亚有关各方很快就能在英—美—揽子建议方面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卡特宣布了一个召集有关各方举行会议的新计划。争取实现包括爱国阵线在内的解决方案的势头在不断增长。

卡特政府的国务卿塞勒斯·万斯、英国外交大臣欧文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在接触中均得到了对方的让步。但是，当他们4月份在达累斯萨拉姆会见穆加贝和恩科莫时，却大吃了一惊。

有关各方在卡特政府特派员的任务——他将监督罗得西亚的过渡时期——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作用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协议。爱国阵线甚至同意，不再坚持要求控制行政委员会。

但是，穆加贝毫不妥协地提出他的部队在过渡时期必须在治安部队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且坚定不移地坚持他的下述观点：只有爱国阵线和英国才有资格参加谈判。

尽管这一切，他们还是准备去参加和谈会议。穆加贝也表示同意。但正如欧文的一位助手所断言：“光去参加会议并无多大意义，除非我们在他（穆加贝）所提出的实质问题上达成协议。”

史密斯在“内部解决”问题上进行的冒险，是以下述重要信念为基础的：穆佐雷瓦和西索尔能够通过谈判使游击队跑出丛林，进入和平。彼得·沃尔斯也抱有这种观点。但是到了1978年6月，即史密斯、穆佐雷瓦和西索尔等人共同签署“内部解决”协议后3个月，情况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穆佐雷瓦和西索尔这两位民族主义者所具有的影响。

最后，仅有数十名而不是数百名游击队员利用了大赦的机会。随即，穆佐雷瓦和西索尔着手建设他们自己的军队了。

这时，民盟在战场上的人员大约有8,000人，人盟大约有2,000人渗透到了罗得西亚西部边境。这一切意味着从事农业的白人现已处于前线。他们孤立无援，经常受到包围，有时被袭击，有时被绑架，有时被地雷炸死或炸伤。由于游击队偷走他们的耕牛、破坏他们预防牛疫的药液，并迫使他们农场里越来越多的非洲工人逃跑，白人农场主们居住下去的理由迅速地减少了。对于这时进入第三代的殖民者来说，1978年是改朝换代的一年。在美丽的彭哈朗加山谷（位于乌姆塔利的北部、紧靠罗—莫边境），原来居住着一百多户人家，现在所剩寥寥无几了。那些仍然居住在那里的白

人，蜷缩在一小块孤立无援的地方，进行着抵抗。穆加贝的游击战使他们晚上足不出户。在领取生活用品时，他们不得不在重兵保护之下前往。他们的太太甚至不敢接电话，因为她们害怕让游击队的密探知道他们在农场上。伊恩·史密斯喜欢吹嘘罗得西亚人的创造精神。现在，这些人果然开始创造了五花八门的防地雷车辆——时常是在越野车的顶上和两旁，装上一分钟能发射几十发子弹的自动机枪，使之成为小型装甲车。

史密斯政府认为，东部高地和东南部地区的保护村（当局为了防止部族人受到游击队的“策反”，不让他们给穆加贝的人提供帮助，强迫成千上万的部族人集中在一起居住）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了，因为守卫这些保护村的卫兵，需要调去遏制游击队向该地区的城镇挺进。

史密斯政府是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的，但在游击队已经控制了周围大部分乡村的情况下，再维持这些保护村已经没有什么大意义了。

游击队声称，他们已经控制了全国70%的地方，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凡是以前治安部队一贯占有火力优势的地方，现在它们几乎仍然都能进入。

## 形 势 变 化

但是，战争的潮流已经发生变化。游击队第一次开始赢得胜利。正如穆加贝后来对访问马普托的外国记者说，游击队的胜利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五年，但结果将是相同的。

这一年的5月至10月，穆加贝发动了一场国际性的进

攻。他不远万里，四处奔走，寻求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此期间，他先后访问了莫斯科（由于他同驻莫桑比克的苏联人关系很糟，他没有得到任何一位苏联重要人物的接见）、越南、北朝鲜和古巴。中国这时由于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被逮捕，正在处理自己的问题。由于北京的武器弹药供应逐步减少，穆加贝通过耐心的谈判，开始获得东欧集团的援助。这些援助是通过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等国获得的，苏联始终没有直接提供援助。同年9月，穆加贝在参加埃塞俄比亚革命日的庆祝活动时，碰到了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这是他们在几周内的第二次会晤。两人当即确定了长期计划，由古巴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训练驻扎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等国营地的穆加贝部队。这一举动给华盛顿和伦敦敲响了警钟，并增加了对戴维·欧文前几个月的谈判失败中拯救英—美计划的压力。

但是，这时西方舆论越来越认为，不应该向穆加贝及其“残暴的游击战”妥协，这使欧文的手脚受到严重束缚。

6月间发生的一起事件，空前严重地损害了同爱国阵线的缓和。这个月的23日，一帮人袭击了位于莫桑比克边境武姆巴山区的埃利姆传教站。该站是当时不顾战争仍然开放的极少数传教站之一。传教站的8名英国传教士和4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刚刚满月）遭到残杀，另一名传教士受了重伤，后来在医院中死去。

虽然以前传教站也曾遭到过袭击，但由于这次袭击事件非同一般，其残酷程度引起了全世界的谴责。一位遇难妇女被强奸。当治安部队赶到时，发现一位被木棒和刺刀致死的妇女手臂伸向她的婴儿，孩子已被残杀在她身旁。还有一个身穿睡衣的小女孩，破碎的头上有踢伤的脚印。



在英国，许多人在埃利姆·本特科斯塔尔教堂举行集会，为宽恕那些肇事者而祈祷。但是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英国议会，则有人呼吁立即停止同穆加贝的任何谈判，并立即承认罗得西亚的“内部解决”。

证据准确无误地表明，这次袭击事件是由穆加贝的游击队制造的。但是几周后，穆加贝对这一指控进行了反击。他说这一事件应该由罗得西亚的精锐部队——塞卢斯侦察队负责，他们企图挑起一场世界范围的反击游击队事业的运动。

“我们这样做能得到些什么呢？”一次，穆加贝在马普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们这样做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难道这会推动我们在军事上的进展？难道我们不能通过纯粹的逻辑推理，来证实这种性质的行动将会阻碍我们的革命？但愿我们在说没有干这种残酷的勾当时谁也不会怀疑。”

一位西方外交官听了他的这番话后说道，“穆加贝是说到做到的，但在进行自我辩护时，他最好想一想：他手下有帮人却热衷于搞种族残杀呢！”

看来，穆加贝在马普托那番慷慨激昂的话，正好提醒了这一点。8月间，穆加贝自己那个党的刊物《津巴布韦新闻》援引穆加贝的话说，穆佐雷瓦、西索尔和酋长奇劳将会被打死，因为他们“犯了罪”，在3月份同史密斯签订了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内部解决”协议。有一篇社论接着说：

“任何一个津巴布韦人——无论他（她）是牧师、酋长或者一般公民——都不应该允许用这种方式来损害人民。这一罪孽的报偿是众所周知的。人民的手很长，他们的记忆是用鲜血凝成的，他们必定会进行惩罚！”

“白纸黑字，无法更改！”

《津巴布韦新闻》刊登了对伊恩·史密斯的死刑判决。

有人问穆加贝：“你将审判史密斯先生和其他主要战犯吗？”

穆加贝回答说：“史密斯是一个罪犯，他犯下了各种极其严重的罪行。他在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残杀津巴布韦难民，如果把这些罪行加在一起，足以保证他会遭到人民的严厉惩罚。我想，人民将要求对他判处死刑，不过这一决定不会由我来宣布。

“我只能作出这样的判断：根据上述罪行，他应该被判处极刑。但是，我们将让人民去审判他，如果在我们接管政权的时候他还活着的话。”

看样子，史密斯完全打算再生存一段时间。“内部解决”并未使他捞到什么东西。为了结束战争，他必须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承认。如果他能说服恩科莫加入“内部解决”，那么他就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承认。这一年的夏天，史密斯在外交战线发起了一场攻势。肯尼思·卡翁达为他打气，英国从中相助。

8月中旬，史密斯和恩科莫在卢萨卡举行了极度保密的会谈。关于这次会谈，两人都没有对自己的“伙伴”——穆佐雷瓦和西索尔站在史密斯一边，穆加贝站在恩科莫一边——透露半点风声。

史密斯提议由恩科莫担任罗得西亚过渡政府的首脑，直到正式举行大选为止。恩科莫被史密斯的这一表示迷住了心窍——至少可以这样说。他想把穆加贝也包括进“内部解决”政府。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否则，战火就要烧到他身上。

史密斯和恩科莫商定几天以后再次会晤，并邀请穆加贝

一起参加。随即，恩科莫和穆加贝之间乃至所有民族主义者之间多年来存在的互不信任、互相怀疑和互相敌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恩科莫就是不肯自己告诉（也许用“坦白”一词更为合适）穆加贝他一直在背着他同史密斯谈判。这事留给了积极怂恿恩科莫和史密斯谈判的尼日利亚人。他们把穆加贝叫到拉各斯，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穆加贝获悉后非常气愤，当场拒绝会见史密斯。当尼雷尔和马谢尔总统最终发现卡翁达参与了“内部解决”后，也同穆加贝一样十分恼火。

9月初，穆加贝和恩科莫在卢萨卡会晤。恩科莫的说法——史密斯似乎准备投降，所以他才同他举行谈判——几乎没能使穆加贝息怒。据报道，穆加贝当时对恩科莫说：“你将成为史密斯的又一个傀儡！”

两天后，恩科莫和史密斯的交易告吹了，但这并不是由于穆加贝的抵抗造成的。

原来，恩科莫的部队在卡里巴附近击落了一架子爵号客机，残杀了机上的大多数幸存者。由于发生了这一事件，史密斯的白人选民，根本不可能赞成他同恩科莫进行任何谈判。

几周后，罗得西亚空军未受惩罚地向赞比亚境内发动了轰炸性的袭击。爱国阵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 人民风暴之年

穆加贝说：“除非恩科莫加入‘内部解决’，我们深信爱国阵线将拧成一股绳。在过去5年中，我们设法使穆加贝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尽管差距不小。我们已经学会怎样同恩科

莫和人盟合作。此外，还有来自非洲国家、特别是津巴布韦人民自己的压力。

“我可以肯定，在爱国阵线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将不会发生战争！不会！”

然而，反对索尔兹伯里政府的战争仍在进行。1978年年底，穆加贝称新的一年为“人民风暴之年”。

不管穆加贝可能会多么的讨厌动听的口号和夸大其词（他过去确实是这样的），但他对他们的宣传作用还是承认的。而且，他在必要的时候采用了这两种做法。

“最后的打击——人民武装力量最决定性的打击——不久必定会生效。”穆加贝在致民族解放军战地干部的信中说道，“敌人将会遭到沉重打击，被搞得晕头转向。现在，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向敌人发起进攻，让我们始终记住：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是由人民自己进行和为了人民的战争！”

“可以肯定，胜利在期待着我们。胜利不会躲避我们，决不会！”

这时，人们看到了另一个穆加贝——一个抛弃了教条主义、无需在战场上鼓舞士气的领导人；一个出类拔萃、既有才华又有原则的非洲人。人们对他的这种看法，是1978年11月在意大利北部城市艾米利亚雷焦形成的。当时，意大利的一大批政党和团体，组织了一次“南部非洲团结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穆加贝最佳地显示了他的自学才能、他对世界政治的理解能力、和他相信自己的事业符合正义的特点。

尤其是，他显示了他非常的善于选取词汇、表现方式和主题，以迎合听众的需要。这时，他正在掌握政治生活的艺术。后来，这种艺术，在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中，以及津



巴布韦独立以后都为他提供了帮助。在这次大会上，穆加贝第一次在西方显示了他的这种艺术。

使意大利人显然感到惊奇的是，穆加贝一开始发言，就简单地回顾了一下意大利的历史——从罗马帝国谈到民主共和国，从马志尼<sup>①</sup>、马基雅弗利<sup>②</sup>谈到墨索里尼，最后谈到了当今的意大利。

他说，南部非洲正在经历着某种相似的情况，它需要那些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提供帮助。“我们战斗的前方将始终需要你们后方的支持。”

接着，穆加贝向与会者介绍了过去一年中的谈判经过：在马耳他发生僵局，爱国阵线在达累斯萨拉姆接受了英—美建议中的主要之点，史密斯同恩科莫进行秘密谈判，以及华盛顿和伦敦抛弃英—美建议。穆加贝利用他的论证才能，在良好地“编织”主题后，将听众引向了他的结论：“我们依然相信，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武装斗争是实现我们的目标——获得民族独立，从而在我们的国家创造和平——的唯一有效手段。”

这种娴熟而又巧妙地运用词汇的演说，正是意大利人、特别是意大利政治家们所喜欢的。演讲结束时，听众向他起立欢呼。意大利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位内阁部长说：“不管你对他的政治和战争有什么想法，他都会使你信服，因为他在论证时似乎照顾到了各个方面，——你依然会相信

---

①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复兴运动）中的民主共和派领袖。——译者

②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所谓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译者

他是正确的。”

年底，萨丽·穆加贝给沃尔斯顿夫人写了一封信。秋天的时候，萨丽曾到伦敦去看望了正在医院里奄奄一息的穆加贝的弟弟。但她当时没能见到沃尔斯顿夫妇。这时，她在信中向他们介绍了最新情况。“关于我们的斗争，诚如你们所知，我们还在继续进行。今年我们取得了许多成绩，这是值得庆贺的。但是，我们将保持谨慎，防止骄傲自满，因为现在敌人已经被推到了绝望的境地。”萨丽写道。

“我们的所有战斗都是在津巴布韦国内进行的，但是，敌人在继续进攻我们的后方基地国家，给莫桑比克和赞比亚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相当简单：迫使这些国家停止支持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幸运的是我们有许多好朋友，他们始终不渝地站在我们一边。

“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决心解放我们的国家……可以肯定，胜利将是属于我们的。”

新年伊始，穆加贝就警告他的中央委员会：应该预料到西方列强和索尔兹伯里在新的一年里将发起重大的外交和军事攻势。

据他估计，彼得·沃尔斯将会奉上司的严格命令，为4月份的“内部解决”选举尽可能创造最好的气氛。要想“内部解决”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主要依靠战争中出现退让趋势后的高投票率。这样也许会说服西方国家把索尔兹伯里政府称之为罗得西亚人民的“代表”。穆加贝的战斗计划是加快战争的步伐，让部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城市，同时让他们散布如下信息：人民必须抵制投票。这是人民战争中的人民风暴之年。游击队员必须通过教育懂得，这时他们不仅仅是在进行战斗，而且还在教育和培养党一旦所需要的选

民。现在，党需要他们去防止史密斯·穆佐雷瓦和西索尔的“内部解决”，赢得足够多的非洲人的支持。

12月间，游击队发动了到当时为止最大胆、令当局最烦恼的攻击：他们炸毁了索尔兹伯里市中心最大的燃料库，引起了一场长达5天的大火。大火烧毁了将近一个月的燃料供应。随后，通戈加拉向游击队发出了进攻首都索尔兹伯里的最详细命令。第二年1月，数百名战士被派遣到距离索尔兹伯里最近的部族托管地。

穆加贝认为，即使根据史密斯一伙的“内部解决”协议进行的选举取得一般性胜利，他也会立即受到英国和美国要他同索尔兹伯里新领导人讲和的压力。为了抵制这种压力，这时他比以往更需要保持独立。同时，他需要结交新的朋友。在新年的头几个星期里，穆加贝设法同埃塞俄比亚人、古巴人和他在东欧集团中的盟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交往。同年3月，甚至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译者）人——在此之前一直忠实于克里姆林宫的贬低穆加贝的政策——也来到了马普托。穆加贝没有接见他们。他经过认真安排，让西蒙·穆增达去接待他们。东德人脑子里考虑的是中国出兵越南，他们在同穆增达会谈援助和武器问题之前，就要求他同他们一起发表声明谴责北京。

穆增达虽然一向态度和蔼，象后辈一样地可爱，但他也有脾气。他对东德人说，他们的上述建议，是对他的极端凌辱。如果民盟想要——其实并非如此——发表诸如此类的声明，它当然也就不需要东德人或其他人提供援助了。东德和民盟之间的“接触”，甚至还未开始就断绝了。

但是，不管进行了多少次激烈的交锋，穆加贝的外交出击，对西方还是产生了两种非常重要的影响。穆加贝通过不

断接近——尽管步子非常缓慢——苏联的卫星国（埃塞俄比亚、古巴），显示出他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可以肯定，这样的战争既能防止西方国家承认史密斯—穆佐雷瓦的交易，又可防止它们再次设法拉拢恩科莫加入“内部解决”。

当时，穆加贝对恩科莫参与“内部解决”的可能仍然忧虑不安。尼雷尔总统比他更为担心。穆加贝的策略是，不断提醒恩科莫对爱国阵线和他面临的严峻抉择所负有的责任。他们之间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心理战。穆加贝一方面警告恩科莫：如果误入歧途，后果极为严重。另一方面设法使他感到，他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如果有人斗争中不准备进行战斗，那么他们决不要期待自己会掌管政府——人民的胜利之果。”

如果同以前的担心相比，这次选举可以说是成功的。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一周里，沃尔斯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炫耀火力。尽管在靠近索尔兹伯里的部族托管地区发生了一些冲突，但当游击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和装备情况后，便迅速地隐伏了起来。

投票情况比预期的要好。城市的投票率比较高。但在农村地区，游击队显然可以阻止人们去投票。虽然正如一些中立的观察家们所说，穆佐雷瓦的胜利决非毫无意义，但就整个选举结果而言，仍还不足以说服英国和美国承认由此而产生的政府。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同年（1979年）5月3日，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大多数票当选，从而使保守党在1974年10月（当时穆加贝尚在关押之中，西索尔之类的人被承认为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后首次重新执政。



在此之前，撒切尔夫人已经派英国前保守党政府殖民大臣洛伊德·博伊德前去罗得西亚观察选举。他的结论是：这次选举是尽可能“自由和公正地”举行的。选举之后，萨丽·穆加贝在瑞典逗留了几个星期，向瑞典各地的大中小學生发表了演讲。在她回到马普托时，发现穆加贝正在认真地关注着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态度。她也同样如此，正如她在给沃尔斯顿夫人的信中所说。

“津巴布韦的政治形势一如既往，动荡不安。”萨丽在信中写道，“但从目前情况看，撒切尔夫人政府似乎准备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取消制裁，承认一个非法政权。

“英国如果只顾18万白人的利益，打算放弃自己原则的话，那么，将会造成一种非常可悲的事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就不禁会问：英国为什么不在1965年就承认史密斯政府……如果史密斯没有干什么非法勾当的话？”

“数百万非洲人为什么要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制裁、处决、数十年囚禁、婚姻破裂、沦为孤儿寡母……？”

“撒切尔夫人究竟想证明些什么？难道证明她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怀疑她是这样的……只有种族主义者才会强调史密斯—穆佐雷瓦政权。”

但是，8月初撒切尔夫人在卢萨卡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的做法，却使人们无一不感到吃惊。

从表面现象看，卢萨卡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与过去若干年中为谋求在罗得西亚问题上达成协议而作的几十次努力完全相同。而且，当时争取和平的环境，也与以往没有什么区别：前线国家亟需实现和平，以便能够重振遭受了破坏的经济；就个人愿望而言，卡翁达和尼雷尔等人希望在南部非洲避免一场国际性的冲突。

就连当时所面临的反对，也同以往非常相同——主要是预料穆加贝和恩科莫不可能接受在举行新的选举之前的过渡时期内提出的，任何不平等对待民族主义者——或是在军事方面、或是在政治方面——的决议。

甚至撒切尔夫人自己也没有想到，她在卢萨卡首脑会议上，能就召开罗得西亚所有各方会议的问题，成功地达成一项协议。穆加贝当然也没有想到。他委派埃德加·特克雷作为观察员兼说客前去参加这次会议。他的这位秘书长在抵达卢萨卡时，主动发表了一篇对英国新任首相充满敌意的讲话。

他说：“撒切尔夫人将设法使首脑会议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有必要解散殖民统治者和种族主义者的罪恶军队，用人民的爱国武装力量来取代他们。

“她将千方百计地拒绝考虑这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因为她的种族主义思想使她非常赞赏这样一种观点：少数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将由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军队来确保。狡诈的穆佐雷瓦就在依靠这支军队。”

在撒切尔夫人听来，这种言论似乎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雷管里爆发出来的，但是她不屑一顾，她在抵达卢萨卡时，一再散布说：“要知道，我是不会被吓倒的！”

撒切尔夫人知道，她最大的特长是令人惊奇。这次她又发挥了这种特长。在她向首脑会议致开幕词时，每个代表团可能都预料，最后会感到异常失望。

不料，他们听到的却是他们认为属于“橄榄枝”一类的话。他们很快理解为英国将作出全面妥协。

这位英国首相说，她的政府准备让罗得西亚实现非殖民化。她知道英国所负有的责任，她决心履行这一责任。首相

并且说，“内部解决”是“有缺陷的”，因为其宪法给予白人的权力，与他们的人数不相称。她的愿望是制定一部“比较公平的”宪法，它保证白人在议会中的地位，但必须实现真正的多数黑人统治。

也许是因为象尼雷尔和卡翁达这样一些人原来指望的东西太少了，所以他们的反应非常强烈。不管他们的心理变化究竟如何，总之他们对此是感到很高兴的。

紧接着，一个由坦桑尼亚、赞比亚、尼日利亚、牙买加和澳大利亚等六国组成的“接触小组”，同撒切尔夫人及其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一起坐了下来，认真制订详细方案。他们一层一层、一步一步地拟定了一项供罗得西亚有关各方会议讨论的工作协议。有些人主张派遣一支维持和平部队，但这又引起了人们对英—美计划的不吉祥回忆。工作协议规定，罗得西亚在过渡时期和选举期间“将由英国政府统治，英联邦派遣观察员”。这一规定扫除了存在已久的障碍。在经历了多年的仇视、怀疑和不信任之后，终于在几个小时之内达成了协议。虽然确切地说谁也没有走上街头跳舞，但撒切尔夫人确实设法同肯尼思·卡翁达跳了一轮华尔兹舞。

谁也不知道穆加贝和恩科莫是否会参加定于9月在伦敦召开的罗得西亚各方会议。但是，前线国家的协议，等于向他们发出了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请求。

听到这一消息，恩科莫似乎呆愣了一会。“召开一次各方会议？”半晌，他迷惑不解地问道，“各方是谁？这方面只有我们（爱国阵线）是代表！”

当消息传到马普托后，穆加贝要求解散罗得西亚治安部队，用游击队去取代它。这不过是举行大选的一种前提。穆加贝没有这样说，但他已经在为此进行谈判。

## 第五章 兰开斯特大厦

### 制宪会议

在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开幕那天，出现了一幕很不谐调的情景。在正式程序结束之后，60多位与会代表退到一间豪华宽敞、俯瞰着圣詹姆斯公园的廊房，出席招待会。伊恩·史密斯紧挨着他的代表团成员，站在房间的一角，偷觑着在另一角落的乔西亚·通戈加拉。他们俩——一位是穆加贝的将军、一位是穆加贝的头号敌人——互相颌首致意。他们还是4年前在日内瓦见的面。不过，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更加久远的时候——通戈加拉在塞卢奎的少年时代。塞卢奎位于索尔兹伯里的南部，那里是史密斯的家乡。平时，“通戈”<sup>①</sup>在史密斯的家中干活，一到收获季节，便随同家里其他人到史密斯的农场干活。虽然通戈加拉离开那里已经有25个年度了，但是他仍然记着伊恩·史密斯的母亲史密斯奶奶。

通戈加拉身材魁梧，人们往往误以为他是一个残暴的将军。而且，这种身躯也掩盖了他对那些他所喜爱的人的特别温和。面对史密斯，通戈加拉首先采取了行动。

---

<sup>①</sup> 通戈加拉小时候的昵称。——译者



“老奶奶还好吗？”他问史密斯。

“很好，谢谢您！只是现在老多了。”史密斯答道。

通戈加拉对他笑了笑，接着说：“请代我向 她 热烈问好！我常常想起老奶奶，你知道吗，她过去经常给我吃糖。”

如果是史密斯，他以后是决不会对人讲起他和通戈加拉的这次谈话的，但是通戈加拉却愿意告诉别人。几周以后（由于史密斯和穆佐雷瓦率领的“过渡政府”代表团在可能得到英国承认的情况下返回了罗得西亚，通戈加拉的士兵准备发动战争，制宪会议面临着失败的危险），通戈加拉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他在这次谈话时，第一次认识到可以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我们交谈的那几句话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通戈加拉说道，“重要的是它们使我第一次认识到战争不是个人之间的事——不是穆加贝和通戈加拉对史密斯和沃尔斯，也不是黑人对白人，而是制度之争——压迫制度对……”

“我不想摧毁史密斯或史密斯奶奶，我要摧毁的是史密斯所建立起来的压迫制度！”

9月7日，穆加贝抵达了伦敦。英国警察特别警卫队特意选择位于肯辛顿·海伊大街的皇家庭园旅馆作为民盟40人代表团的下榻处。这家旅馆是一座现代化的高楼层建筑，保安工作比较好做。在出席制宪会议的代表中，英国特别警卫队对穆加贝的安全确实最为担心。安全问题一度成了主要问题。当年日内瓦那家旅馆发生的火灾，给人们留下的记忆是长久的。穆加贝住进收费昂贵的旅馆已经感到相当不自在，因为这不 符合他所奉行的节约原则。因此，他提出警卫工作

由他的保镖担任即可。但是英国方面坚持要给他派去特别警卫队的人，结果他们赢了。在以后的15个星期里，穆加贝的身旁日日夜夜都站着2名英国特别警卫队的队员和2名民盟“仪仗队”的队员。这4个人在一起经常谈论各自手中的武器，渐渐关系搞得相当热乎。

恩科莫、穆佐雷瓦、甚至史密斯，都是抱着对达成协议比较乐观的心情来参加制宪会议的，唯独穆加贝不是这样。他始终不渝地相信“武装斗争”，似乎它本身就是他的党准备夺取政权的最终目的。在抵达伦敦参加会议时，他不仅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而且感到无所谓。他想，如果不得不回去进行武装斗争的话，他也不会遭到重大损失。他对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深表怀疑，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兰开斯特制宪会议只能使得英国保守党人有可能为他们承认穆佐雷瓦—史密斯政府辩护，从而掩盖保守党政府的右翼倾向。用穆加贝的话来说，这伙人是“当今世界的儒略·艾默里。”

在制宪会议开幕前的那个周末，穆加贝在皇家庭园旅馆的门厅里被人稍稍地截了一会。他表现出了一种典型的不妥协态度。

“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同史密斯或穆佐雷瓦谈判的，我们也不是到这里来就实行多数统治的原则进行谈判的，我们到这里来是同英国人谈判移交权力方面的事宜的。”

这番话使人觉得穆加贝在重蹈日内瓦会议时的覆辙，只是这次他决心不犯上次那样的错误。他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在宣传战中败北。他从日内瓦会议的教训中认识到，公开

的——在电视上或报纸上——谈判，同会议室内的谈判一样多。因此，民盟这次打算借助——如果说不是利用的话——宣传工具。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穆加贝亲自挑选埃迪森·兹沃布戈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兹沃布戈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律师，在2年前贡博被清洗出去后，他已经成为民盟实际上的新闻和宣传书记。他爱吹嘘说，早在1963年民盟在索尔兹伯里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他就已经是一位“司仪大师”，并说他有着广泛的朋友——从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上校到特迪·肯尼迪。尤其是，他声称自己是穆加贝的“耳朵”。在以后的几周里，他确实抓住了不少头条新闻。他具有非常自觉地为新闻记者提供迅速而又方便的引语，以及主动摆好姿势让电视摄像机的镜头拍摄的能力。后来，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晚上——正式签署罗得西亚和平协议的前10天——兹沃布戈的宣传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让撒切尔夫人“跳进泰晤士河”，并隐晦地说“她同（南非总理）撒旦博塔关系暧昧”。

兹沃布戈争辩时的调子和使用的诸如此类的语言，导致英国外交部在私下斥责他为制宪会议上的野蛮人，——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说他“喜欢喝得过度一点”，骂他甚至不能代表穆加贝和民盟中央委员会的观点。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兹沃布戈是穆加贝安插的一个非常自觉的“代理人”。兹沃布戈对恩科莫在公开场合的表现感到担忧，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在爱国阵线中的这位同伴会说错话。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兹沃布戈作为一名合乎宪法的律师，被任命为爱国阵线的高级发言人。这样，新闻方面的事务便一概由他去处理了。他时常既代表穆加贝，又代表恩科莫。而且，他的顶头上司还向他发出严厉的

命令，要他执行强硬路线。因此，当穆加贝有可能在制宪会议上作出让步时，兹沃布戈却总是在众人面前为武装斗争论战和辩解。

在兰开斯特大厦会议的第一天，除了穆加贝以外唯一感到悲观的是彼得·卡林顿。情况相当清楚，在撒切尔夫人同年5月当选时，这位外交大臣除了谋求召开这次有关各方会议来解决罗得西亚问题之外，还有别的选择。英国保守党内——正如穆加贝所清楚地知道——显然在掀起一股主张同穆佐雷瓦主教做交易的浪潮。有些人要求承认穆佐雷瓦领导的政府，取消对它的制裁，并给沃尔斯将军提供机会，让他去做他一再请求做的事情：粉碎爱国阵线。虽然这样做会在非洲大陆遭到除比勒陀利亚当局以外的所有政府的谴责，在联合国内引起大哗，在英联邦内遭到沉重打击，但它可以掩盖保守党的右倾。保守党毕竟是撒切尔夫人自己的权力基地。右翼人士甚至主张：“现在就采取行动，战胜风暴，马上把爱国阵线拆散。否则，就再也无法使得穆加贝之流坐到谈判桌旁来。”

但是，卡林顿勋爵没有走这条“小人之路”——毋庸置疑，有人以为他会走这条路。这一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这个人和他那特殊的政治标记。甚至在他的支持中间，也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业余绅士”。这种称号贬低了卡林顿的才智程度和他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卡林顿在从政之初是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一位忠实信徒。作为这样的信徒，他接触的关于非洲问题的第一本“入门书”是麦克米伦关于“变革之风”的演讲。麦克米伦在演讲中提出了保守党的高级路线：英国对其在非洲的殖民地负有责任。麦克米伦说：“从历史的角度讲，我们教育和培养了非洲人民，给他们提供了



一切：从传教士到军队，从教师到商人。现在，英国有责任引导他们走向独立。”他警告说，如果不能履行这一职责，就会看到莫斯科在这块大陆对西方进行翼侧包围。

正是麦克米伦的这种哲学，导致卡林顿这时在罗得西亚问题上走了“高等之路”。此路也许危险性更大，但对于一个有着象他这种坚强原则的政治家来说，这是唯一可走的道路。

然而，如果撇开伦理道德这个因素不谈的话，卡林顿是幸运的。诚如他的一位助手在卢萨卡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后同他开玩笑时所说。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以及前线国家的那次非凡的会议）表明，与会各方是真诚地希望和平的。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无法再让战争继续下去了；如果战争持续进行，赞比亚的卡翁达恐怕难以生存；莫桑比克的马谢尔意识到，战争是对他的年轻的革命政权的威胁。倘若是个人，也许这三个人谁也不会去劝说穆加贝和恩科莫进入和平。但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有力地帮助了卡林顿向穆、恩两人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实行和解。虽然并非不顾一切代价，但应该说和解的条件无疑是几个月前还不可想象的。

卡林顿领导下的英国外交部喜欢用婉转的语言说话。他们说罗得西亚“已经成熟，可以摘了”。而卡林顿自己则另有一种说法。他希望把“疖子挑穿”，以便一劳永逸。在兰开斯特制宪会议开幕前的几天，这位外交大臣对前景仍还感到悲观失望。而当会议正式开始举行时，他又确实无法相信他自己居然会在这个许多人都失败了的问题上获得成功。他知道，如果他愿意，可以同穆佐雷瓦达成协议，但这毕竟是“小人之路”，也即新闻界所称的“二等解决办法”。他觉得他能够把恩科莫也拉进去。然而，这样一来，穆加贝怎么

办呢？在以后的几周里，卡林顿一次又一次地碰到这个问题。而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可能作出的答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 政 策

穆加贝在制宪会议之初迈出的步伐是相当缓慢的，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的心里“颇为平静”（他自己的判断），不时“非常乐观”（英国外交部的估计），对他的敌人“毫无兴趣，因为他无论如何打算退出制宪会议”（穆佐雷瓦的说法）。从制宪会议的第一天起，他就意识到会议将拖得很长，除非他退出去。直到9月底，与会各方仍在为会议的议程争论不休。这时穆加贝和萨丽已搬到贝斯沃特大街的一座寓所居住。其他一些代表，如伊恩·史密斯等人，则每个周末都自找乐趣，或出外游览观光，或观看足球比赛。然而，穆加贝没有这种闲情逸趣，他不得不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制宪会议民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几乎在兰开斯特大厦每次开会之后，他的中央委员会都要举行一次长时间的会议。穆加贝夫妇居住的大房间里总是挤满了人，时常多达20人。萨丽从马普托带去了一批民盟办公室的姑娘。从她组织她们采购物品、洗衣服和做饭的作法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穆加贝准备在伦敦长住下去。

正如穆加贝在制宪会议上所表露的，他心里感到快快不乐。他同史密斯和穆佐雷瓦在谁有权控制罗得西亚局势和谁有权到兰开斯特大厦出席制宪会议的问题上的争吵，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不过，这时最使他担心的是英国方面的立场。他意识到卡林顿在采取一种消耗政策，企图逐步使他作出让

步。偶尔，穆加贝会对“出色的勋爵”——他就是以其最出色的讥讽和怀疑的口吻来称呼卡林顿的——发一通脾气。

“主席先生，我们是不会被吓倒的！”他常常以颤抖的声音对卡林顿说道，声音中既包含着愤怒，又夹杂着失意。

“我们进行了这么一场战争，不是为了在几分钟内将它全功尽弃。”不久，穆加贝得出了结论：外交大臣准备实行“二等解决办法”。不错，他相信这笔交易早在制宪会议开始之前就做成了，但他坚信，如果这次会议一旦失败，国际舆论将不会谴责他回去进行武装斗争。这次会议与日内瓦会议时的情况不一样，人们将会看到他已经为实现和平竭尽了全力。

正是本着这种思想，他和恩科莫在10月18日同意了英国提出的宪法。“这不过是促使会议继续进行下去的一种方式，”当天晚上，穆加贝对前去采访他的一批记者说，“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喜欢这部宪法。”民盟不喜欢这部宪法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它并非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白人尽管失去了他们根据史密斯——穆佐雷瓦的“内部解决”方案实际所拥有的否决权，但他们在新议会中仍可保证得到百分之二十的席位。在土地方面，新宪法规定对白人的财产权实行保护。其程度足以使人觉得，民盟长期来所作的，将把白人的土地分配给人民大众的诺言是空洞的——如果不说它纯属谎言的话。穆加贝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但实际上他对两个与他关系最重大的问题——大选前的过渡时期和实行停火——时刻作好“战斗的准备”（如果说英国外交部喜欢使用农业和医学术语的话，那么，民盟则常常借用军事术语）。

然而，兹沃布戈为他放了一枪。他警告说：“如果卡林

顿继续走他已经开始走的道路，同傀儡们（指穆佐雷瓦和史密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我们就将回去重新进行武装斗争。卡林顿勋爵，这样的话无疑就不会有什么和平！”这是兹沃布戈的第一次警告，在此以后，他又一再在会议上发出类似的警告。

英国外交部的一些人认为，直到这时恩科莫和穆加贝一直在故意拖延时间，以便让他们的人从赞比亚和莫桑比克越过边境，回到罗得西亚去。在他们看来，这时制宪会议应该向前推进。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时穆加贝思想上对除了武装斗争以外的任何解决办法都抱有严重怀疑。

当然，彼得·沃尔斯是认识到的。在10月的第三个星期里，这位罗得西亚武装部队的总司令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伦敦。他终于使所有人的头脑都清醒了。如果说伊恩·史密斯只是偶尔在制宪会议的谈判桌上对穆加贝发起攻击的话，那么，沃尔斯将军差一点宣布发动一场新的战争。

6个月前，沃尔斯就已在私下承认索尔兹伯里在一年之内将受到威胁，除非有关各方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这时，他发现同英国人做成交易，是赶在爱国阵线将他消灭之前搞垮爱国阵线的一个好办法。10月27日星期六，制宪会议在经过了整个会议期间最紧张的幕后交易之后，穆佐雷瓦不得不暂时克制一下他那强烈的傲气：同意解散他的政府，辞去总理职务，把权力交给一位英国总督。于是，卡林顿的阴谋计划——首先让穆佐雷瓦和白人表示同意，然后用已经达成的“二等解决办法”来对付穆加贝和恩科莫——开始付诸实行了。卡林顿向爱国阵线施加压力，告诉他们或者接受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或者就被排除在外。在穆加贝的寓所，他的一些助手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喜剧性的动向。



“你们听到卡林顿和穆佐雷瓦之间的谈话了吗？”穆加贝的一位助手问道。

“彼得（卡林顿）打电话给艾贝尔（穆佐雷瓦），问他：‘艾贝尔，你将……’穆佐雷瓦马上答道：‘彼得，你不用说了，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沃尔斯对穆佐雷瓦和英国达成的协议一点也不感到轻松愉快。2天后，他答应接受戴维·史密斯对他的首次采访。尽管史密斯曾明确地告诫沃尔斯的军队“恐怖分子星期天不休息，我们也不能休息”，并说沃尔斯的任何一位士兵“都能击退一大帮恐怖分子”，但连他都感到沃尔斯的讲话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武力炫耀。以下是史密斯和沃尔斯的谈话：

史密斯：将军，您曾几次说过，冲突需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您现在仍然相信政治解决是有可能的吗？

沃尔斯：是的，我想我们正在获得政治解决。毋庸置疑，目前发生的一切，正是象我这样的人所一贯主张的。我认为，如果没有军事实力和稳定，如果没有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恢复力，就不可能获得政治解决。但问题的关键是，随着我们目前的进展，随着我们的政府接受英国提出的建议，我相信，就政治方面而言，我们会有办法相当快地恢复正常。

史密斯：那么爱国阵线是否包括在里面呢？

沃尔斯：包括或者不包括，谢谢您，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并不在乎。我要说的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机会是有的。事实上，如果英国方面的建议付诸实施，就会出现政治稳定，就会取消制裁，我们就会得到英国的承认，而且可望得到世界其他国家和所有通情达理的人民的支持。我认为，其中许多国家和人民已经暗示要承认我们。

史密斯：可是如果不包括爱国阵线，将军，战争就会继续下去。

沃尔斯：您说得对。但这样一来，爱国阵线就会被摧毁。

穆加贝被激怒了，通戈加拉也不差，而卡林顿则更加恼火。当时，卡林顿正在设法劝说穆加贝和恩科莫必须接受索尔兹伯里政府为唯一能够领导罗得西亚走向选举的机构。沃尔斯无法估量地加深了爱国阵线对索尔兹伯里政府的不信任。英国方面就大选前的过渡时期提出的建议是相当明确的：总督将依靠索尔兹伯里白人统治的行政机构行使职权，大选期间将借助罗得西亚现有的警察部队——彼得·沃尔斯为其最高司令——维持法律和社会秩序。

“我相信英国人常说的一个关于闻到老鼠的气味的短语，”兹沃布戈在一次晚间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我们闻到了老鼠的气味。”

11月1日，即在沃尔斯接受史密斯采访的两天以后，穆加贝在会上发起了他的第一次进攻。他说，英国在利用制宪会议迫使爱国阵线投降，英国的建议是阴谋，目的在于扶植穆佐雷瓦上台。如果照此办理，罗得西亚就会在一个偏向于穆佐雷瓦的行政机构的引导下走向大选。

穆加贝坚持要求联合国派遣一支维持和平部队。

卡林顿的回答是两个字“不行！”

这时，穆加贝提高了嗓门，真的发火了：“如果说有什么地方需要派遣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话，那就是罗得西亚。如果不召开这次会议，我们将会赢得胜利，虽然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除非卡林顿勋爵缓和其强硬态度，否则我们将打起背包，回去进行武装斗争！”

据各方面的消息说，彼得·沃尔斯听了之后一句话也没有说。

后来几天，穆加贝设法在非洲谋取朋友们的支持。他感到卡林顿必须摆脱这种信念：前线国家确实想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实现和平，它们将对穆加贝施加压力，迫使其结束战争，不管对方作出多大让步。

莫桑比克首先作出了反应。马普托政府说：“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进行讹诈，并接连不断地暗示说这次制宪会议是给爱国阵线提供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些做法是傲慢无礼的。大不列颠的代表在许多场合都试图用威胁、施加压力和制裁等手段来代替明确而又建设性的对话……他们是在为津巴布韦的内战创造条件。”

接着，尼雷尔在达累斯萨拉姆他的家中发表了讲话。他说：“叛逆政府<sup>①</sup>终于完蛋了。但它不是由于殖民国家派军队去击败了反叛分子，而是由于当地人民拿起武器进行了战斗，从而使殖民国家才有条件任命一位总督。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英国人之所以任命这位总督，是因为爱国阵线决定同史密斯进行战斗……因此，实际上爱国阵线是英国的盟友，他们理应受到盟友的待遇……而沃尔斯却应该被解职。”

11月7日，穆加贝和萨丽忙中偷闲，与沃尔斯顿勋爵和夫人共进了午餐。穆加贝终于感到可以痛痛快快地谈话了。沃尔斯顿勋爵对这次会面感受非常强烈，因此他在第二天就亲自给卡林顿写了封信。

---

<sup>①</sup> 指以穆佐雷瓦为首的罗得西亚过渡政府。——译者

他在信中写道，尼雷尔总统在达累斯萨拉姆所提出的原则是至关紧要的。

“倘若要理解穆加贝的态度，就必须认识到他的思想和行为，是基于以下的根深蒂固的信念的：英国政府在同一个仍属反叛性质的政权谈判；在过去几年里朝着解决罗得西亚问题方向迈出的任何步伐，都是爱国阵线的活动所导致的。

“除此以外，穆加贝还对卡林顿勋爵和英国其他一些政界要人有怀疑。但愿我们已经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使他减少了忧虑，至少是减少了他对外交大臣的忧虑。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极力主张进行某些非正式的个人接触。

“除了穆加贝毫无疑问地希望和平解决这一事实以外，我们的主要印象是，穆加贝对英国方面在谈判中的坦率有严重怀疑。他承认英国在急于实现罗得西亚问题的解决，但他认为它强烈地偏向于穆佐雷瓦，并正在努力确保他担任新政府的首脑。

“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希望会谈能够获得成功，战斗能够停止，但他不准备接受和平解决，除非提出的条件合乎情理。他表示，如果在主要问题上不能得到满足，他就将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毫无疑问，穆加贝的以下活动只是为了强调他的上述立场：在与沃尔斯顿共进午餐之后仅仅过了两天，穆加贝即飞赴埃塞俄比亚，去见门格斯图中校，商讨在亚的斯亚贝巴郊外的一个营地请古巴教官训练民族解放军新兵方面的事宜。与此同时，“津巴布韦之声”——马谢尔总统在马普托为穆加贝建立的电台，以便他向丛林中的部队发表广播讲话——广播了由穆加贝亲自撰写的告民族解放军官兵书。穆加贝要求他们别理睬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在罗得西亚境内展开



活动。他在结束语中呼吁道：“同志们，让我们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自由！让我们继续进行斗争！”

卡林顿心里想，尽管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警告，但他没有得到任何人关于穆加贝已经退出制宪会议的暗示。和平仍在继续之中。仅此而已。

11月8日，肯尼思·卡翁达飞抵伦敦。这个人是不会失去在国际舞台上抛头露面的机会的。他的忧虑与尼雷尔和马谢尔的忧虑大致相同：担心恩科莫和穆加贝得不到公平合理的机会，谈判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从而抛弃制宪会议。

不过，卡翁达除了这种忧虑以外，心里还有别的想法。他担心穆加贝和恩科莫的爱国阵线会发生分裂：穆加贝走向战争，恩科莫走向一种可能在纸上都不值得签订的和平。卡翁达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是为了敦促穆加贝和恩科莫团结一致并采取温和态度。

穆加贝和他的中央委员会中的许多主要成员，始终怀疑卡翁达是卢萨卡和平倡议的设计师，因为他们觉得当时正值恩科莫返回罗得西亚展开竞选的有利时机。而且，他们还怀疑卡翁达可能会赞同一项将穆加贝排除在外的协议。其实并非如此，卡翁达确实非常渴望实现和平，这并不是因为他对恩科莫抱有任何希望，而主要是由于战争给赞比亚造成了影响。他对为了选举而分裂爱国阵线的决定极度不安。

## 穆、恩矛盾

穆加贝和恩科莫之间的合作向来是不愉快的。他们的结合与其说是出于互相尊重，或因为有着共同目标，毋宁说是

一种权宜之计。他们之间不只是一种种族之争（穆加贝是马肖纳人，恩科莫是恩德贝莱人），两人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是迥然不同。恩科莫是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而穆加贝则原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后来才成为民族主义者。穆加贝认为，恩科莫接受莫斯科的武器以及伦敦—罗得西亚矿业集团的财政援助是利欲主义的作法，他对这些感到厌恶。至于他自己，总是小心翼翼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譬如他说：“中国是一个朋友，但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他坚持认为，凡是 he 所得到的帮助，都不会附加任何条件。最主要的是，这两位盟友之间怀疑很深，彼此都知道最终将会分道扬镳、成为敌手。在1977年秋天，恩科莫暗中与史密斯和穆佐雷瓦的“内部解决”方案调情以后，穆加贝就几乎对他失去了信任。而且，穆加贝还在私下指责他在战争中没有承担应该承担的义务。在过去几年中，穆加贝的部队遭受的损失要比恩科莫的部队大得多。并且不算什么秘密的是，直到这时，恩科莫还在将其训练有素的部队留在赞比亚。下述情况可以说是英联邦停火监督部队最吃惊的发现之一：他们抵达罗得西亚后，发现穆加贝和恩科莫的一些部队在停火前的几周里，一直在为控制某些地区——主要是西南部的拜特布里奇附近地区和中部省圭洛城周围地区——而混战。

直到这时为止，爱国阵线的两位领导人表现得团结一致。不过，他们显然也只是在表面上保持一致。每当电视记者采访时，他们总是一起出现。但是当恩科莫在场时，穆加贝始终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表现出与他的性格不相符合的文静和克制。因为恩科莫在采访时，似乎总是喜欢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有一次，当穆加贝走进兰开斯特大厦地下室的一间电视拍摄室时，看到恩科莫在那里等着他一起

接受采访，他马上退了出来，声称他可以肯定，他们俩都更愿意单独接受采访。不过当他意识到恩科莫可能会表示某种使他非常窘迫的拒绝时，他又和恩科莫一起接受了采访。但是，他随即就对他的新闻官员说，以后决不允许再发生类似情况。

英国人对于穆加贝和恩科莫之间的紧张关系真是太清楚了。毫无疑问，如果卡林顿满足于“二等解决办法”，那他就已经设法把恩科莫也拉进去了。英国外交部有一种感觉，认为恩科莫实质上是英国人的朋友，比穆加贝“顺从”，可能会屈从于英国提出的一揽子解决办法。卡林顿战略的一个重大前提是：为了将穆加贝、恩科莫和穆佐雷瓦纳入一种解决方案，必须使他们都离开兰开斯特大厦，并都相信自己会赢得罗得西亚的大选。因为英国外交部认为，这三个人中间只有乔舒阿·恩科莫最合适。

卡林顿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会见了卡翁达。他虽然对卡翁达将带来什么信息感到担心，但还是乐意见到他，因为这时制宪会议正需要有一种“催化剂”，而肯尼思·卡翁达也许正好能充当这个角色。这位赞比亚总统只是在机场简单地说他对兰开斯特大厦会议缺乏进展深为担心，说完便离开机场，前往帕克·莱恩大街的伦敦德里旅馆，等待络绎不绝的访客去了。这时，甚至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竟然也说，他的心情正好与卡翁达相同。他说，英国政府必须做一些“光彩体面的事情”，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办法，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把爱国阵线包括进去。

当天下午两点半，穆加贝离开了他的寓所，恩科莫离开了他的旅馆。他们原定在三点钟的时候赶到兰开斯特大厦，

就英国提出的关于罗得西亚过渡时期的建议答复卡林顿。但是，这两个人实际上谁也没有打算按计划行事，甚至根本就不想到会场上去露面。相反，他们准备去会见卡翁达。这是制宪会议期间的一个喜剧性的时刻：穆加贝去到恩科莫的旅馆，恩科莫驱车前往穆加贝的寓所，不料两人在警车的警报器和护送他们的摩托车发出的尖啸声中，互相没有碰上头。当两人最后在海德公园对面交通繁忙的贝斯沃特大街上相遇时，穆加贝的一位助手对记者说：“让卡林顿空等一会儿吧！”外交大臣对于穆加贝和恩科莫的缺席不是感到惊奇，而是恼羞成怒。下午四点钟，他的发言人尼古拉斯·芬恩在一项声明中几乎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愤怒。芬恩先生说：“会议主席对他们的失礼感到遗憾。”

在伦敦德里旅馆的七层楼上，卡翁达在听着穆加贝和恩科莫对英国建议提出一系列抱怨。

穆加贝说，他不能同意在大选之前由索尔兹伯里的行政机构和警察部队来管理国家。“它们都处在那些自‘单方面独立’以来一直效忠于史密斯的人的控制之下。他们的效忠和偏见将不会改变，他们在各级、特别是在基层的影响，可以破坏我们在大选中获胜的机会。”穆加贝一针见血地说道。

卡翁达在回答时没有提出什么容易的解决办法，但他直率地发出了警告：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无力再忍受战争了。这并不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和平，但它确实意味着今后双方的交往将比过去和现在多得多。他说，制宪会议比以往的一切都更进一步接近问题的解决。难道肯定有办法打破这种僵局吗？恩科莫早已盼望听到这种和解建议，而穆加贝却没有。也许，他第一次认识到他可以回去单独进



行民族解放战争，这样的话，他还可以期待稳住他的中央委员会中的最激进的委员。

当天晚上，卡翁达总统在唐宁街会见了撒切尔夫人。向她，卡翁达也呼吁妥协。他强调了南非通过罗得西亚向赞比亚的饥民重新开始供应玉米的重要性。事后想来，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突然的。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肯尼思·卡翁达知道，和平可以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获救。

三天后，卡翁达总统离开了伦敦。他在私下对穆加贝和恩科莫最终将会同意和平感到乐观。虽然他极少透露他们作出了何种妥协，但显而易见已经投桃报李。穆加贝和恩科莫将不得不承认索尔兹伯里行政机构是罗得西亚过渡时期的唯一政府机构，因为没有时间再来建立另外一个政府机构了。作为回报，他们的军队将会获得与索尔兹伯里当局的军队完全相同的地位。彼得·沃尔斯将不得不象恩科莫和穆加贝那样保持和平。

伊恩·史密斯并不知道卡翁达这次调解的结果，但是他的本能告诉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在卡翁达逗留伦敦的最后一天，史密斯飞回了索尔兹伯里，以特别温和和坦率的口气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单方面独立”以后的14年里，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特点。“我毫不怀疑爱国阵线将参与‘内部解决’”，他说，“我必须接受这一点。铁匠站在寒冷之中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裁判已经吹响哨子，比赛结束了。”

## 争得合法地位

其实未必完全如此。仅仅4天后，穆加贝就和恩科莫一起，在兰开斯特大厦私下会见了卡林顿。穆加贝缓和了态

度。他用干巴巴的谈判语言，婉转地坚持了他的真实思想。

“根据我们所进行的讨论，”他对外交大臣说，“如果您准备在英国起草的文件的第十三段里把我们的武装力量包括进去，我们就有可能同意你们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的建议。”

卡林顿丝毫也没有流露出他内心的激动。他平心静气地回答说，第十三段中还应该再加上一句话：“爱国阵线必须与总督的方向保持一致。”

就是这么一句话，穆加贝使他的军队和战争——至少他在思想上是这样认为的——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这是他始终不渝地渴求的。从此，他的士兵不再是“恐怖分子”或“游击战士”了，他们可以与索尔兹伯里的军队平起平坐了。对于穆加贝来说，这一原则是极其重要的。有位观察家后来说，穆加贝争取承认和合法地位的决心，使他想起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甚至使他想起了意大利的红色旅。“他几乎象一个站在机舱内的劫机分子，首先要求人们承认他的事业。如果得不到承认，他就决不开始谈判。他必定有正当的理由来使他的战争获得承认。”卡翁达经过一番深思，也提出游击队“应该获得适当的住房和食物”。这一建议后来也写进了和平计划。

“我们的军队现在是合法的军队了！”当天晚上，穆加贝兴高采烈地说道。兹沃布戈接着问道：“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很多。”穆加贝说道。

英国人也在感到高兴。“对于我们这些为罗得西亚问题努力了14年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奇迹。”卡林顿的一位高级顾问说道。但是，沃尔斯将军的情绪并不怎么高。他对记者说：“有人提出让他们与我们享有同样的地位，这简直

是胡扯！如果谁向我们开枪，我们就将制止他们不再开枪。”

其实，卡林顿离目的地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而爱国阵线仍稳坐钓鱼台。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发展的势头，就象尼古拉斯·芬恩每天晚上在举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那样。就象兹沃布戈在为民盟大吹大擂一样，英国外交部也在发起宣传攻势。在大多数日子里，芬恩先生都要向采访会议的记者“简短地吹风”。在窄小、拥挤的房间里举行的那些非正式的会议上，记者们常常可以得到各种背景材料，从而使他们能够突破制宪会议上的那些干巴巴的措词，把报道面扩大一些。对于卡林顿来说，芬恩敏捷而又灵活的头脑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在这段时间里，芬恩每天晚上都兢兢业业地为外交部准备口径，因为他知道翌日早晨穆加贝和恩科莫将阅读他们发出的信息。外交部的信息是：“全速前进”。英国政府暗示，不管穆加贝和恩科莫对制宪会议的最后阶段——就停火问题作出安排——是什么样的反应，它都将取消制裁、派遣总督，甚至不惜中断制宪会议。到此为止，卡林顿采取的“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策略是奏效的，而芬恩的新闻发布又给穆加贝和恩科莫增加了额外的压力。报刊的每一篇报道都说“和平已经在望”，这便使得他们更加难以变卦了。卡林顿这时感到，他已经把他们束缚住了。难道他没有一点怀疑吗？不！穆加贝毕竟还是穆加贝。卡林顿认为，穆加贝也许要有人推着、甚至拖着才会走向和平。

卡林顿给穆加贝和恩科莫六天时间慎重考虑他的停火建议，然后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或者确切地说是最后意见，因为他先后宣布了两次）。11月22日，卡林顿要求交战双方在24小时内作出保证：穆加贝和恩科莫保证停止从赞比

亚和莫桑比克向罗得西亚境内发动侵袭，索尔兹伯里保证停止从罗得西亚向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境内发动侵袭。他要求他们在下周一，也即3天之后，对他的建议明确表态：“赞成”或“反对”。

穆加贝并没有试图掩饰他心中的愤怒。他一气之下退出了会议，并告诉兹沃布戈说，当天晚上将由他亲自接待新闻界人士。他在进入新闻室时，仍还怒气冲冲。“卡林顿勋爵见鬼去吧！”他高声骂道，“这个出色的勋爵挖空心思、诡计多端，真是太聪明了！”

卡林顿事先就已估计到，这将是制宪会议中最困难的阶段。他担心沃尔斯和通戈加拉的同伙会在会场上突然采取敌对行动，从而将到此为止所取得的谈判成果全部毁灭。因此，他在此之前就已小心翼翼地将制宪会议改为冲突双方分开举行的双边谈判。他总是上午去看望索尔兹伯里的代表，下午去看望爱国阵线的代表。这种做法正合沃尔斯的胃口。沃尔斯相信，他能够做成一笔有利于他的军队和政府的交易。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也正合卡林顿的心意。一旦索尔兹伯里方面同意了他的“二等解决办法”，他就可以带着这个已经确定的解决方案，再回到穆加贝和恩科莫那里。但是，这样做不适合穆加贝。

“双方有必要直接进行接触，”穆加贝平静地站在电视摄像机前，对记者们说，“双方必须在英国的主持下直接谈判，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穆加贝再一次含蓄地发出警告说，如果制宪会议失败，他就要继续进行战争。他说：“鉴于我们已经在战争中取得了进展，我们不能在伦敦看着他们在大笔一挥之下而发生改变，把我们的胜利变为失败，而让沃尔斯将军却在兰开斯特



大厦获得他在战场上所未能获得成果。”

穆加贝甚至不愿知道卡林顿的最后通牒。他强调说，摆脱制宪会议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全面讨论由爱国阵线提出的停火建议：在竞选运动开始之前停火两个月；向罗得西亚派遣一支数千人的英联邦维持和平部队。穆加贝知道，卡林顿对于这两个基本要求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作出让步。但是，正如卡林顿外交大臣感到，他已将穆加贝封锁在制宪会议之中一样，穆加贝也意识到，这时卡林顿不可能赞同那种不把他包括在解决方案之内的外交失败。因为据他分析，卡林顿也陷得太深而无法自拔了。这是穆加贝所掌握的绝无仅有的一张牌，他决心从中获得一切可能的好处。为此，他再一次转向了前线国家。在卡林顿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穆加贝便和恩科莫飞赴达累斯萨拉姆会谈。这次会谈是匆促安排的，从中不难看出危机的严重性。在穆加贝和恩科莫前往坦桑尼亚的途中，英国方面由撒切尔夫人出面表了态。“决不能出事，”她说，“不能发生任何有损于会谈的事。胜利已经在望！”

正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班机上的穆加贝，对撒切尔夫人的讲话作出了不屑一顾的轻蔑反应。“撒切尔夫人算老几，竟然对我们指手画脚？”穆加贝责问道，“她在津巴布韦有什么权力？”穆加贝并不打算退出制宪会议，但确实想显示一下前线国家的力量和团结，为他在兰开斯特大厦的会议上助威。他是会达到目的的，只是在认识到罗得西亚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出于愿望，而且是不得不这样做的问题上还有不少保留。

马谢尔总统赶在穆加贝和恩科莫之前抵达了达累斯萨拉姆。一切迹象都表明情况的严重性，甚至马谢尔的打扮也强调了这一点。他穿着一身军装，甚至蹬着古巴皮靴，这是他在

最重要的场合才穿的。他和尼雷尔在机场上紧紧拥抱，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仅象征着他们之间有着父子一般的关系，而且表明他们将在英国人和爱国阵线面前采取一致的立场。

在其他人尚未到达之前，马谢尔和尼雷尔在国家宫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由于英国人固执己见，他们决定支持穆加贝和恩科莫反对英国提出的建议。但是他们认为，如果英国方面作出一定的让步，特别是如果卡林顿能将英联邦停火监督部队的人数增加到可以胜任的程度，爱国阵线就必须接受英国人的建议。

这是一个酷热的星期六。下午五点钟，穆加贝、恩科莫以及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赞比亚三国的特使也加入了马、尼两位总统的会谈。肯尼思·卡翁达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谈。在罗得西亚人对赞比亚境内发动突然袭击后，他已经下令他的国家处于战备状态。这天早上，他指责英国在对付索尔兹伯里时，象一条“没有脊梁骨的鬣狗”。

会谈是在一个豪华的、用栎木镶嵌的房间里举行的。房间俯瞰着烟波浩淼的印度洋。穆加贝向各位介绍了他的情况。他说，各种情况表明，在英国外交部和索尔兹伯里当局之间存在着阴谋。卡林顿总是先同索尔兹伯里方面的人会谈，然后再同他们交谈，这表明他有偏见，倾向于接受穆佐雷瓦和沃尔斯提出的一切条件。穆加贝接着又说，他们的军队虽然获得了与索尔兹伯里当局的军队相同的地位，但这仅仅是一纸空文而已。他强调说，在罗得西亚人依然驻留在他们原来的地方，而他的部队却要进入罗得西亚人所说的集结营的情况下，两支军队怎么可能平等呢？！他说：“我不想看到我的部队象牛一样被赶入这些拘留中心，听凭罗得西亚陆军和空军宰割。否则，我的部队不用多久就会被消灭。”

尼雷尔和马谢尔象以前卡翁达所做的那样，极力劝说爱国阵线和解，如果不能立即作出让步的话。据可靠报道，马谢尔当时对穆加贝说：“你说的话我们都听了，但我们知道当我们说战争必须停止时，你也将会听我们的。”会谈进行了很长时间，最后，穆加贝只好表态说：“那我们就回到伦敦去谈判。”

当穆加贝和恩科莫飞返伦敦过冬时，尼雷尔将英国的电视和电台记者，包括戴维·史密斯在内，邀请到他的海滨之家。他在表面上——接受史密斯采访时——指责卡林顿在“玩弄花招”以保证穆佐雷瓦执政，并警告说如果卡林顿不能达成一项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协议，将会引起灾难，但在私下里却感到卡林顿就是不可能让制宪会议失败，因为国际社会对此寄予很大希望。由于相信谈判双方最后将会作出足够的让步，尼雷尔实际上感到很乐观。他说：“如果会议失败，那他们双方的损失就太大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制宪会议在失败和成功之间不断徘徊。芬恩代表卡林顿勋爵，执行了一条咄咄逼人的强硬路线。“现在回旋的余地已经非常小，”他说，“而且余下的时间也极少极少了。但是英国代表团仍然希望这次会议能胜利结束。”

乔舒阿·恩科莫也许是出于无意，加剧了英国外交部争取和解的势头，尽管穆加贝并不这样认为。11月30日，恩科莫在同卡林顿举行了又一次危机性的会谈后，与穆加贝一起从外交部的一个边门走了出去。刚出门，就碰上了一大群记者和许多的电视摄像机。在记者们提出了一些狡猾的问题后，恩科莫回答说：“协议即将达成。”他的这句原话，正是新闻界人士在芬恩先生无所畏惧的乐观态度引导下所盼望已

久的。

穆加贝马上插话道：“不，我们甚至不能自称已经接近达成协议！”然而新闻界因为害怕漏报制宪会议上的重大突破，最后大多没有理睬穆加贝的话。第二天成了报纸的“D日”<sup>①</sup>。有的说会谈已经达成了协议，有的则说还没有；有的说即将达成协议，有的则说决不会达成协议。这一天，卡林顿随同撒切尔夫人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就英国与共同体的摊款问题，同共同体进行争辩。他在那里并不太高兴。可是当他在下午六点钟因为要同爱国阵线会谈，而特意提前回到外交部时，又从穆加贝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坏消息。

穆加贝没有答复卡林顿的最后通牒，而是提出了他的新建议。他要求彼得·沃尔斯的部队赶在他的部队从丛林中出来之前，就回到他们的基地去。此外，他还要求南非人尽可能作出最有力的保证：撤走他们已经承认在罗得西亚所驻有的军队。穆加贝在11月初与沃尔斯顿勋爵共进午餐时，就曾详细地谈到了外国插手的问题。他说，从爱国阵线方面讲，它并不面临着来自苏联、古巴或中国的威胁，唯有南非卷入罗得西亚的冲突，才有可能使局势发生变化。在11月的最后一周里，南非总理博塔透露，他有两个营在罗得西亚保护贸易通道，为罗得西亚空军驾驶直升飞机以及提供重炮和后勤支援。如果南非不作出撤离这些部队的保证，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就不可能达成协议。

穆加贝的建议使卡林顿着实大吃一惊。他原以为能达成

---

<sup>①</sup> 原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军向希特勒德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日。——译者



协议了。不料还差得很远，或者说可望而不可及，这使他感到十分着急。他不是第一次意识到，他要对付的穆加贝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有才智的人，而且是一个能够捉弄他的可怕对手。

英国外交部深感沮丧，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前几天对会议前景吹得天花乱坠，现在却在自食其果了。卡林顿突然意识到，他可能不得不采用“二等解决办法。”他现在担心的是如何、或者说能否修复同穆加贝的关系。穆加贝认为卡林顿采取的是专横跋扈的高压手段，他为此感到越来越愤懑。这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决心不操之过急。卡林顿觉得，僵局的症结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反感。他知道穆加贝把他看成是贵族政客，而这样的人按照定义是不可能理解和同情所谓的恐怖分子的思想 and 目标的。在这一周的周末，穆加贝和卡林顿都认识到，他们俩在个性和作风方面的冲突，可以破坏制宪会议。

但是，这时有人出面调解了——不是来自卢萨卡或达累斯萨拉姆方面，而是由马尔博罗宫出面。马尔博罗宫就在兰开斯特大厦的拐角处。从星期五晚上起，英联邦秘书长什里达思·兰法尔开始进行调解。他强调，英联邦的调解进程在此以前就已经开始，现在只是继续下去。兰法尔是恩科莫和穆加贝的耳朵。早在这一年的10月，他就已进行调解。他提醒与会各方：如果会议不能达成一项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解决方案，就将是一场灾难。兰法尔是一位出色的律师，曾于1966年为他的祖国圭亚那起草过独立宪法。现在他成了英国外交部和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说客。他告诫穆加贝暂时不要去担心停火期间敌军的部署问题，这是会议最后阶段才该考虑的事情，如果卡林顿保证秉公办事，就没有必要再保持

这种担心。穆加贝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尽管显得勉强。

可是南非人又会怎么样呢？这时，穆加贝的心里几乎充满着对他们的担忧。他害怕他的部队一旦开进集结营，会遭到南非人的轰炸。兰法尔起草了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后来打破了僵局。兰法尔说：“在英国总督管辖下的罗得西亚，不允许有外国干涉。这一立场已向有关各国政府阐明。”

“包括南非，”穆加贝插话道，“南非必须包括进去。”但是恩科莫并不在意，他似乎对南非人的介入感到很高兴。兰法尔指出，只要不具体提及南非，卡林顿就会接受这份宣言。他的猜测不无道理。卡林顿感到相当高兴，因为毕竟没有人在这方面向他提出很高要求。宣言规定：罗得西亚人的所有武装力量（包括陆军和空军）将同爱国阵线的部队完全一样，接受监督停火部队的监督和指挥；由英国和英联邦其他一些国家组成的监督部队，将从原先设想的600人增加到1,200人，以确保其人数多得足以胜任。不错，英国外交大臣承认英国总督管辖下的罗得西亚防止任何外来干涉十分重要，但是他不允许具体提及南非，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会导致沃尔斯生气和不悦。当时沃尔斯已经返回罗得西亚，他同意了停火建议，唯一的要求是这些停火建议今后不能改变。

真没想到，仅仅因为“包括南非”这几个字，制宪会议竟然耽搁了3天。穆加贝觉得他已经作出了足够的让步，不能再作退让了；而卡林顿则说他不能允许在会议宣言中写上“包括南非”这几个字。这是一场毅力战，它使一切都受到了威胁。英国外交部的正式公告说，它在这个周的周末，没有与爱国阵线进行接触。卡林顿决定在星期一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因为当天晚上，他必须向政府内阁汇报会议的进展情况

况，他需要穆加贝和恩科莫作出答复。

可是，穆加贝说他没有什么可以答复。卡林顿获悉后，立即取消了这次全会。他暗示说，如果有必要，英国将在没有爱国阵线参加的情况下朝前行动。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危险的赌博。”穆加贝满不在乎地说道。在以后的几天里，卡林顿的战争边缘政策获得了许多人的喝采。但在穆加贝看来，穆加贝在这个星期一只是挖空心思地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危机。用兰法尔的话来说，穆加贝在“戳戳脚跟准备决战”。恫吓难道会奏效吗？卡林顿的观点是它必须奏效，不管穆加贝多么不乐意，也必须逼着他行动。他认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来实现和解。任何进一步的拖延，只能意味着穆佐雷瓦、或者说更有可能的是沃尔斯推翻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谈成的一切所作的保证。芬恩先生指出，如果拖延下去，“一切便会象一团毛线似地松散”。这样，外交大臣就会一无所获，甚至连“二等解决办法”也得不到保证。

## 突 破

兰法尔再一次向卡林顿外交大臣发出呼吁。这次他强调说，穆加贝是不会作出让步的。宣言中增加有关南非的条款，难道不是为实现停火而付出的小小代价吗？英国外交部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沃尔斯和南非人。沃尔斯听后火冒三丈，但他知道此时的潮流是反对他的，因此，他对上述条款虽然很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表示愿意凑合。于是，穆加贝就象在要求他的部队和索尔兹伯里当局的部队享有同等地位的问题上一样，在原则方面赢得了胜利。但是，他们在有关南非人

问题上的让步，只是穆加贝唯一的真正收获。英国的建议除了加上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以外，基本上依然如故。出席制宪会议的一位非洲外交观察员认为：“穆加贝赢得了这场争论，但却输去了战争。”

在正式确定停火的会议上，卡林顿一反常态，设法使穆加贝平静下来。他对爱国阵线同意实行停火表示满意，对穆加贝个人表示感谢，并赞扬有关各方以“积极和负责的态度”进行了谈判。当时，穆佐雷瓦已经返回罗得西亚，他的副手西拉斯·蒙达瓦拉拉在会议上发展到居然称穆加贝和恩科莫为“我们的和平兄弟”。

几分钟后，卡林顿走进了兰开斯特大厦的地下室，开始接受他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而约定的第一批十多位记者的采访。他屏息凝神地走进了电视录像室，显得确实很激动。他承认，他还必须经受各种考验。平时，卡林顿站在摄像机前时，常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担心这样做会过于突出自己，突出自己的讲话，然而今晚他却情绪正常。随着肾上腺素的缓缓流动，他偶尔独自发出轻轻的笑声。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卡林顿一开口就说道，“我们制定了宪法，确定了过渡时期。现在，我们又达成了停火协议，这一切都不错吧？！”

有哪一方会表示反对呢？

“我非常希望没有人会这样做。我几乎不该这样想。”

难道他真的没有想过制宪会议会失败吗？不！

“两天前，我曾想这次会议可能会失败，感到有一种前功尽弃的巨大危险。我曾不断地想，如果会议一旦失败，那将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悲剧，因为我们毕竟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了。”



卡林顿的讲话正待完毕，穆加贝走进来了。难道他会愿意坐下来和这位外交大臣一起接受记者的采访吗？

“不会，我想我的这位出色的勋爵是不会喜欢这样做的。”穆加贝答道。

穆加贝在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时，总是衣冠楚楚，穿着深蓝色的西服。最近几个星期来，他仿佛成了新闻工具的主人。他们对他们给他起的各种绰号——“恐怖分子的总头目”、“强硬的马克思主义者”——太清楚了。因此，他非常自觉地设法消除蒙在电视屏幕上的神秘色彩。他比采访他的记者显得更轻松，讲起话来声音相当柔和，以致不得不提醒他保持高一点的声音。他只想让他们听到和听着就行，不想随心所欲地大喊大叫，否则只能使他显得适合于他的那些绰号。

这天晚上，他表现得彬彬有礼，紧紧地握着记者的手，不时眨动着双眼，似乎在问：“你们干吗这样大惊小怪？”他甚至还设法对电视室的技术人员说，他希望在他掌权后的津巴布韦电视台也能够拥有这一切“现代化设备”。

他看上去心满意足。他确实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我是否心满意足。如果我看上去是这样的话，那是因为我感到高兴，我们已经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而且我们还将进一步朝前走，直至实现我们大家所希望的和平。”

他在期待着选举吗？他相信他会获胜吗？

“啊，那当然，那当然！”他咧嘴一笑答道，“如果我们的运动不能获胜，那还有谁能获胜呢？我相信，我们在斗争的岁月里做了最多的动员群众工作。创造权力基地始终是我们战争的目标。我们不会缺少什么，因为我们事先就已作

好了准备。”

如果穆加贝赢是大选，津巴布韦会实行真正的民主吗？

“是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胸有成竹地答道。说完之后，他又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似乎在问：为什么非要我来证实自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呢？

“津巴布韦将实行真正的民主，它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权力必须依靠人民，权力必须为了人民。现在，人民必须选择他们的政府。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作出选择。”

当天晚上，卡林顿拒绝公布英国准备派驻罗得西亚的总督的名字。其实，这差不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早在几个星期前，总督就已选定。他就是克里斯托弗·索姆斯。此人和卡林顿一样，是麦克米伦的信徒，原任英国战时内阁大臣、农业大臣和英国驻法国大使。他还是已故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女婿。在通知他于“4天之内赶赴索尔兹伯里”担任总督时，这位枢密大臣正在宣布裁减英国行政机构的计划。虽然穆加贝对他的敌对反应听起来令人吃惊，其实他并不认为，如果选派别人去担任总督会有很大区别。

“索姆斯勋爵和儒略·艾默里之间有什么区别？”穆加贝在获悉索姆斯已被任命为罗得西亚总督后责问道。

这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不祥的开端。但后来他们的关系，对兰开斯特大厦和平协议的生效获得成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索姆斯以前从来没有在非洲工作过。由于在前几年动了一次大的心脏手术，他的身体很不强壮。不管他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有些人对他能否胜任都表示怀疑。然而，事实将说明他是一位杰出的人选。一事当前，他幽默、耐心而有原

则，这在以后的岁月里证明得很重要的。“我想我们今后将不得不耐着性子度时光。”索姆斯在宣布对他的任命那天说，“从事这种工作不能带有任何先见，我们全都必须表现出灵活。”

然而，索姆斯实际已经在一、二个问题上拿定了主意。其一是认为对付穆加贝将是他最棘手的问题，其二是认为穆加贝最有可能获胜。

在任命索姆斯为罗得西亚总督后，卡林顿又进行了另一场赌博。这时，兰开斯特会议在究竟如何以及何时、何地结束战争，并开始实行停火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尽管如此，卡林顿照样派遣索姆斯和他的夫人玛丽到索尔兹伯里去。当天晚上，卡林顿亲自向英国记者吹风，企图为他采取的行动辩解。他声称，他仍然认为穆加贝必须在推动之下才会越过最后的障碍。

卡林顿的理由是，索姆斯总督要做以下三件事：保持和解的势头继续发展，和对爱国阵线施加压力；在非洲争取罗得西亚的新朋友，考虑重新开始向赞比亚供应对卡翁达总统来说非常重要的玉米；阻止罗得西亚人向莫桑比克和赞比亚境内发动任何袭击，以博得马谢尔和卡翁达的好感。

不管卡林顿派总督到罗得西亚去是多么的合乎情理，这样做不能说不是一个大胆的举动。

索姆斯离开伦敦希思罗机场后才一个小时，民族独立事业的辩护士兹沃布戈便在记者招待会上扼要发出了暗示。

“不要搞错了，”他不快不慢地说道（这时，在场的所有记者都意识到他说的这几个字等于向他们发出了拿起笔、铺开纸和上好照相机胶卷的信号），“英国派总督到罗得西亚去，意味着它发起了反对爱国阵线的战争。”

使爱国阵线更为恼怒的是，卡林顿故意选择在索姆斯总督启程这天公布了他关于停火的最后方案、地图以及其它与之有关的一切。根据卡林顿的最后方案，罗得西亚军队将拥有47个活动基地，而爱国阵线却仅有14个。我们不能象预言者那样，光去注意听穆加贝高喊“犯规了！犯规了！”事实上，从穆加贝当时的处境考虑，卡林顿的停战方案，只是使他雪上加霜：不仅受到损害，而且遭到凌辱。在罗得西亚的经济中心地带，无论是他还是恩科莫，都未得到一块营地。所谓经济中心地带，指的是中部的白人耕种地区，它从东北部的索尔兹伯里连绵到西南部的布拉瓦约。

这一带是罗得西亚最主要的战略地区，也是白人殖民者的主要居住区。全国主要的交通线路、工矿企业和大大小小的城镇都集中在这里。穆加贝坚持认为，把他排除在中部地区之外，将会对他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和心理上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们会把游击队撤到其它地方的营地去，看作是民族解放军失败的信号。以下事实同样很重要：穆加贝和通戈加拉不相信他们能够说服一部分游击队撤出他们长期来所驻扎的地区。

“你们知道这些地图是谁画的吗？”穆加贝在当天晚上问道，“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些地图是彼得·沃尔斯画的。”

卡林顿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他接着提出了最后期限：12月15日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到时制宪会议就结束，不管情况如何，也不管有没有穆加贝和恩科莫。

穆加贝不打算理睬这一套，但是他准备诱使卡林顿作最后的摊牌。兹沃布戈随即进入了只能被说成是战斗的状态。星期五深夜，在离开最后期限仅有几个小时的时候，兹沃布戈把



当时在兰开斯特大厦所能找到的记者统统叫了起来。记者们集中在大厦的酒吧间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因为他们实在太疲倦了，再则对兹沃布戈将要给他们提供的情况毫无准备。

“卡林顿见鬼去吧！”兹沃布戈大声嚷道，“撒切尔夫人跳进泰晤士河去吧！”

接着他又说：“撒切尔夫人在同撒旦博塔暗中偷情。”最后，他挥舞着英国地图，朝着室内每一家电视台的电视摄像机直截了当地摇了摇头，坚定地说：“卡林顿勋爵，我们的回答是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最后期限到了。穆加贝开始就兹沃布戈在讲话中用词不当一事向卡林顿表示道歉。这是他作出的唯一让步，因为这时他的回答仍然是“不同意”。

翌日早上，卡林顿随同撒切尔夫人前往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据他说，当时他心里抱有希望。实际上，他不仅抱有希望，而且坚定地期待着出访回归伦敦时能听到穆加贝说“同意”。

原来，这时卡林顿勋爵已经知道，最后他将幸运地有所突破，因为有人向穆加贝提出了他所无法拒绝的要求。

## 马谢尔的忠告

费尔南多·翁瓦纳担任他这个工作似乎有点儿太年轻了。他才28岁，而且看上去也不比这个年龄大。当1975年马谢尔总统在莫桑比克执政时，即将在英国英格兰约克大学毕业的翁瓦纳毅然乘飞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一个营地，接受了短期军事训练后，即被作为南部非洲事务的专家分配到马谢尔总统的办公室工作。几个月后，他

成了马谢尔的一位最亲密的顾问。翁瓦纳之所以受到如此重用，是因为他在西方接受过教育，对西方有所了解。在过去的一年里，当马谢尔开始在苏联集团以外寻求支持和经济援助时，翁瓦纳的地位又有很大提高。他被派到伦敦，以便随时向马谢尔总统汇报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的情况，并建立起莫桑比克与西方之间的桥梁。

星期五，即在卡林顿确定的最后期限的前一天，翁瓦纳从伊拉克——马谢尔正在那里进行国事访问——乘飞机赶到伦敦。他随身带着马谢尔总统给穆加贝的一份急件。这是一封给朋友或者说同志的信。但信上非常清楚地告诉穆加贝，战争已经结束，他必须接受兰开斯特大厦的和平协议，不管它将造成多大的损害。

一个时期以来，马谢尔已经意识到穆加贝的战争威胁着他自己的前途。其实，早在兰开斯特大厦会议召开之前的几个月，他就对穆加贝这样说过。不过，说的最清楚是在穆加贝前往伦敦参加会议的前几个星期，马谢尔在哈瓦那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时候。

穆加贝的战争给马谢尔所造成的负担，不只是分布在整个莫桑比克北部地区各个营地的成千上万难民，以及这些难民由于罗得西亚人的突然袭击，纷纷从乡村逃往城镇。更为重要的是，最近几个月来，马谢尔了解到沃尔斯将军准备——如果制宪会议失败的话——伺机进犯莫桑比克北部，彻底消灭穆加贝。在莫桑比克北部地区，已经爆发了所谓的“抵抗运动”，这一运动显然是由罗得西亚人和南非人支持的。虽然目前这一运动还不过是一种刺激而已，但它清清楚楚地表明如果兰开斯特大厦会议失败，索尔兹伯里将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英国外交部一直在向马谢尔施加压力，要他出面进行干预。此外，马谢尔还有赞比亚的卡翁达作榜样。“史密斯、南非人和英国人的战略，是打断赞比亚的脊梁骨，”马谢尔在给穆加贝的信中写道，“但如果战争再度爆发，沃尔斯将集中力量向莫桑比克发起进攻，而我们将根本无力进行抵抗。”他甚至提到了他的政权最有可能垮台的日子：1980年7月。

马谢尔发出的最后信息是直截了当的：穆加贝必须冒着兰开斯特大厦和平协议的危险，进行竞选。他没有这样说，但婉转地发出了警告。如果穆加贝表示拒绝，他可以在莫桑比克得到庇护，但他再也不会会有武装斗争的基地。穆加贝本来不应该对此感到突然，但一切已成定局不免使他大吃一惊。

星期天中午午餐时间，穆加贝召集了他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穆加贝在会上告诉大家，现在除了接受卡林顿的一揽子建议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也作出了一种让步：在罗得西亚的经济中心地带给爱国阵线提供一块营地。其实，这一让步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穆加贝回到了他的寓所，萨丽为他和沃尔斯顿准备了午饭。据沃尔斯顿勋爵说，穆加贝在吃饭的时候难过得差一点掉下眼泪。

穆加贝是一个长期来善于用理智控制感情的人，然而他最后却在友情的激动之下发生了动摇。如果是任何其他的人对他提出这种规劝，他是不会相信的。但是他知道马谢尔真诚地认为，如果兰开斯特制宪会议失败，他自己的革命政权就会垮台。对穆加贝来说，这就足够了。马谢尔的劝告，把他带入了和平，但是他在这个星期天并不相信这会把他引向胜利。

## 第六章 期 待

### 竞选战略

也许，这时本来应该是圣诞节早上的欢乐时刻，但是当穆加贝这位绝对戒酒主义者看到他的助手们把班机变为舞厅时，却象慈父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并不赞成。助手们打开了在伦敦机场买的免税威士忌酒，呼喊着重盟的口号，甚至唱起了革命党的抒情歌曲。歌声压倒了坦桑尼亚航空公司从达累斯萨拉姆飞往马普托的511号班机的引擎声。

埃迪森·兹沃布戈请求穆加贝允许他到机舱去组织大合唱。

“如果他觉得行，就行。”穆加贝说。

兹沃布戈和他的几位稍稍有点儿醉了的同事，一边走一边唱，蹦蹦跳跳地走到飞机的前舱。不一会儿，穆加贝也站起身来，顺着过道慢慢地往前走去。他边走边同每位乘客握手问好，并且接过他们手里的小孩，亲热地吻一吻。是啊，竞选运动已经开始，穆加贝看上去完全象一位候选人。

马普托机场的情形，使机上所有的乘客又惊又喜。马谢尔总统及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排着长长的队伍，在那里等候迎接他们。从现在起，穆加贝开始得到不同寻常的待遇，他似乎已经赢得了罗得西亚的大选，似乎是一位来访的国家元



首。穆加贝花了整整半个小时同欢迎他的人拥抱——不仅同莫桑比克的高级官员，而且同在场的数百名民盟的工作人员都一一拥抱。工人们举着“继续斗争”的横幅标语。

穆加贝重又回到了他的“家”。他本准备只在这里逗留几天，然后马上回到索尔兹伯里，去开始他的竞选运动。可是没想到，他在这里呆的时间竟长达五个星期。

在逗留伦敦的最后几天里，穆加贝几乎什么都谈——过去、将来、大选、独立，但就是闭口不谈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所达成的协议。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前线国家迫使他接受这一协议的方式感到失望，确切地说是由于他相信他可能会被这种和平所毁灭。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部队已进入冲突的最后阶段——“人民战争”时期。部队不光注意赢得对城镇和乡村的控制，而且重视组织和教育人民。鉴于现在他的部队都驻扎在各个营地，穆加贝认为，他们将无法在竞选中进行传播信息和“动员群众”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穆加贝觉得，这样他们在争取胜利的斗争中就丧失了作用。

不过，这一点还不算什么，穆加贝真正担心的是兰开斯特大厦和平协议根本不会起作用。说到底，他不相信彼得·沃尔斯和索尔兹伯里当局会坚持停火。他的部队营地数量少，且又分布在农村和偏僻地区，这使他们极易受到攻击。穆加贝认为他们会受到袭击，甚至预料他们会遭到罗得西亚空军的轰炸。如果说他对这一切感到恐惧的话，那么，他把这些恐惧完全隐藏在自己的心里。为了确保他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强硬分子，特别是埃德加·特克雷接受既定协议，穆加贝的日子很不好过。

1979年11月21日，当与会各方在兰开大厦的大厅里签署

和平协议时，穆加贝的疑虑实在太明显了。可是，恩科莫在签字仪式上却非常高兴，他兴致勃勃地同大厅里的每一个人握了手，甚至同沃尔斯将军握了两次。

“现在您是我们的总司令了，”恩科莫对沃尔斯热情地说道。

穆加贝故意避开沃尔斯，并且非常勉强地同穆佐雷瓦、卡林顿和恩科莫站在一起照了个相。穆佐雷瓦抓住战机，首先发表了竞选演说。

他说，如果最后由于出现“某种糟糕的奇迹”，他的党遭到失败、津巴布韦的“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就会完蛋”。

穆加贝拒绝理睬这一套。他说，他对这种胡说八道根本不屑一顾。

在穆加贝返回莫桑比克——再从这里返回罗得西亚——之前，有一桩很重要的事情没有了结：他和恩科莫究竟是联合竞选还是单独竞选，也即究竟是以爱国阵线的名义参加竞选，还是（恩科莫的）人盟和（穆加贝的）民盟分别展开竞选。在穆加贝逗留伦敦的最后几天里，穆加贝和恩科莫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穆加贝和他的中央委员将通过投票，决定他们两人分别展开竞选，不搞联合。

这样，竞选便成了一场危险的赌博。如果民盟和人盟联合起来，它们显然会稳操胜券。因为恩科莫正如他在后来的竞选运动中所宣称的，是罗得西亚民族主义之父，而穆加贝则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率领的军队站在战斗的第一线，终于迫使史密斯坐下来谈判。穆加贝因此而有不少有利条件。恩科莫在国内的名声比穆加贝大得多，虽然人们对他的游击

队袭击子爵号民航班机一事极为恼怒，但依然普遍认为他比其他人温和得多。而且，恩科莫和穆加贝还可以在选举时将国家一分为二：恩科莫在他的家乡马塔贝莱兰省肯定能获得全胜，穆加贝则可望在索尔兹伯里周围的马肖纳人部族和与莫桑比克接壤的整个边境地区，与穆佐雷瓦相匹敌，如果不能击败他的话。

恩科莫丝毫也没有隐瞒他的这样一种观点：他和穆加贝应该一起竞选。“团结一致就会胜利，一分为二就会失败。”他有时这样承认道。但是，他主张联合是有条件的。

恩科莫强调说，作为民族独立斗争老战士的他，在竞选胜利后必须担任总理。穆加贝和民盟中央委员会中的主要成员觉得恩科莫的要求太苛刻了，实在无法忍受，——事实上，除了通戈加拉以外，民盟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这样认为的。

在逗留伦敦的最后一个星期里，通戈加拉一次又一次地力主与恩科莫联合展开竞选。他认为，这不光是权宜之计，为了在大选时最有可能获胜，还有别的因素。在兰开斯特大厦会谈期间，通戈加拉对恩科莫的政治手腕和精明灵活已经五体投地，——百分之百的钦佩。

会议期间，通戈加拉和恩科莫单独会见了几次。恩科莫总是十分主动地强调爱国阵线有必要在大选中保持完整统一。他甚至向通戈加拉暗示说，他在他领导的政府中，可以担任某种高级职务。不过，通戈加拉并没有被这种高官厚禄的许愿所动摇。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家，而只认为自己是他们在竞选中争夺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主张民盟和人盟保持以竞选运动和计划合并部队为主题的会谈，并提出一俟停火协议生效，即把他的部队并入恩科莫的部队。

通戈加拉和恩科莫的关系发展良好，双方都认为比以前想象的要好得多。通戈加拉对恩科莫提出制定两党联合竞选的纲领印象深刻。他越来越深信，如果不搞联合竞选，穆加贝和民盟就会冒被排除在权力大门之外的严重危险，因为他知道恩科莫迟早会被诱入一个包括穆佐雷瓦和白人在内的反穆加贝联盟。穆加贝允许在他的中央委员会内，继续进行这方面的辩论。而且，这一次他比以往更加注意采用集体领导的方式。他主张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而不是由他独自作主，然后强行实施。一向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中央委员会这次竟然作出了一个迅速而又果断的决定。通戈加拉的意見在投票中被压倒多数否决了。特克雷、穆增达、兹沃布戈和萨丽全都坚决反对把恩科莫说成是一个“宝贵人物”。他们强调说，他们的许多支持者都憎恨恩科莫，因为他在过去曾想同史密斯做交易；如果打出“恩科莫—穆加贝”的旗号联合竞选，民盟的获票率也许不如单独竞选高，甚至可能会促使许多人投穆佐雷瓦的票，——尤其是在马肖纳部族地区。

在穆加贝和他的代表团12月22日离开伦敦时，单独竞选还是联合竞选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穆加贝的一位最亲密的助手说道：“人民会说：‘如果我们在投穆加贝的票时，意味着也在投恩科莫的票，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投穆加贝的票呢？’为此，我们将以民盟的名义，而不以爱国阵线的名义进行竞选。倘若我们和恩科莫勾搭在一起，人民就会投穆佐雷瓦的票。”这位助手小心翼翼地一再声明，不应把上述观点看作是他个人的。

穆加贝离开伦敦后，首先抵达累斯萨拉姆，会见了前线国家的领导人。他因为要求单独竞选，在那里马上遭到了反对。



多年来，尼雷尔总统和前线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辛辛苦苦地培育和建立了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他经常听到穆加贝和恩科莫互相攻击，为此，他总是劝告他们保持团结，互相原谅。尼雷尔不仅对爱国阵线的破裂感到郁郁不乐，而且对其后果感到害怕。他认为，民盟和人盟单独竞选，将分散民族主义者的选票，有助于穆佐雷瓦。

“你可不能给穆佐雷瓦以可乘之机。”尼雷尔语重心长地告诫穆加贝。

穆加贝以及他的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与恩科莫正式结盟，将会严重削弱人们对民盟的支持。穆加贝试图用这种观点来说服尼雷尔，但终于没有成功。他向尼雷尔保证，在回到马普托后，将召集他的中央委员会重新考虑与恩科莫结盟的问题。

上述情况并非穆加贝一行在达累斯萨拉姆作短时间停留时所发生的唯一“故障”。对于尼雷尔和马谢尔为说服他们签订和平协议而采取的行动，穆加贝的几位最高级的助手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恨。他们逢人就说，有人诱迫他们放弃武装斗争，同意实现和平。不过，穆加贝比较谨慎，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暴露出任何忿恨情绪。

“十多年来，我们充分利用了并非由我们自己选择的环境。我们相信，我们也一定会充分利用目前的环境。”穆加贝在离开坦桑尼亚的时候说。

在返回莫桑比克的途中，民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几乎一点没睡。他们差不多在连续不断地开会，而且其中不止一次会议持续到天亮。通戈加拉再次主张同恩科莫结为联盟。这一次他可以呼吁马谢尔和尼雷尔支持他，强硬派再次反对通

戈加拉的意见，而且这时他们比以往更加坚定地蔑视迫使他们在伦敦妥协的前线国家的总统们。

为此，恩科莫在圣诞节时从赞比亚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去同民盟谈判。代表团警告说，如果民盟和人盟两党不能携手合作，就会在大选中失败。穆加贝和往常一样，尽量做到不固执己见。他拒绝匆匆忙快地作出决定，也不愿催促他的中央委员会草率地作出决定。在一次通宵达旦的会议上，穆加贝终于明确表示：他宁愿单独竞选。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因素，恩科莫的代表团因此而两手空空地回去了。

在同一次会议上，通戈加拉发出了他的最后呼吁：抛弃人盟和民盟这两个名字，干脆以爱国阵线的名义竞选。他说，战争不是个人或党派之争，而是为了消除种族歧视和压迫。

通戈加拉坚持认为，民盟不承认恩科莫为爱国阵线的领导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民盟已经和他们联合一起，在伦敦谈判了14个星期。通戈加拉的这番话，使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出现了少见的沉默。

通戈加拉知道他失败了。他与其说感到生气，毋宁说感到大失所望。但当组织上派他到莫桑比克北部和中部的游击队营地，去向指挥官们解释兰开斯特大厦停火协议和民盟的竞选战略时——在正式决定民盟单独竞选的会议之前——他没有表示反对。临行前，穆加贝亲自到通戈加拉在马普托的家中送行。这是穆加贝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通戈加拉。

通戈加拉在车祸中不幸遇难的噩耗，是在莫桑比克北部港口贝拉的一位官员，打电话告诉穆加贝的副手西蒙·穆增达时，传到马普托的。这位官员不会讲英语，穆增达几乎不会讲葡萄牙语，而电话线路又非常糟糕，尽管如此，穆增

达还是听清楚了这位官员在电话中所说的主要意思。

通戈加拉的奔驰车在试图超越一辆卡车时，不幸撞上了它的尾部。车祸发生在马普托以北大约一百英里的地方，靠近帕默里阿镇。那段公路的糟糕和崎岖不平，是臭名昭著的。事故发生时，四周一片漆黑，被撞的那辆卡车又没有开灯。

两车相撞时，坐在前座的通戈加拉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甩出了挡风玻璃，脑袋被摔得稀巴烂。据那位莫桑比克官员说，通戈加拉的司机也受了重伤。穆增达获悉后，试图打电话告诉穆加贝，不料，穆加贝这时已经在前往马谢尔总统官邸的途中了。原来，总统早已亲自打电话给穆加贝，让他火速前去。马谢尔在告诉穆加贝通戈加拉去世的噩耗时，差一点流下眼泪。他始终感到，他对穆加贝的这位将军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也许甚于他对穆加贝的感情。

数小时以后，当穆加贝打电话给英国大使馆时，他显然非常悲痛。但是他说，他并不怀疑有人干了卑鄙肮脏的勾当。

他告诉民盟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他将亲自主持安排通戈加拉的治丧事宜。穆加贝试图将通戈加拉的尸体迅速运回马普托，不料遭到彻底惨败。它只是加重了人们的怀疑和谣传：通戈加拉是被人谋杀的。

莫桑比克政府派了一架飞机前去收尸。可是当飞机在莫桑比克中部的一个小小的简易机场——靠近出事地点——降落后，驾驶员发现机上没有足够的燃料返回马普托了。于是，飞机不得不搁置在原地。驾驶员发出了求援电报，但马普托方面直到第二天才收到。当局获悉后，随即从陆路派出一批人前去接应。两天多后，通戈加拉的尸体才运回马普

托，暂时安放在医院的太平间内。

怀疑通戈加拉被谋杀——罗得西亚人、英国人，甚至恩科莫后来都接受了这种怀疑——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外界众说纷纭，就连穆加贝自己的军队内部也产生了这种怀疑。在罗得西亚国内，大部分人最初是从罗得西亚广播电台的新闻电讯中听到通戈加拉遇难的消息的。电讯说车祸是由恐怖分子所制造的。人们简直难以相信，通戈加拉这位分裂爱国阵线的首要反对者，设法与恩科莫进行单独对话者和民盟中央委员内绝无仅有的强有力的持异议者，竟然会在这种至关重要的时刻和这种情况下死去。他原定在圣诞节后的第4天，就在索尔兹伯里监督他的游击队集中，并在他们驻扎的营地发表讲话。

英国人私下感到沮丧。在兰开斯特大厦的会议上，通戈加拉由于以一个考虑问题超脱党派利益的领导人的面目出现，曾使他们感到惊奇。他们担心，通戈加拉的死，不仅会破坏罗得西亚的立即停火，而且会有损该国将来的稳定。

总督府中那些相信其间有某种阴谋的人，后来提出了如下事实：通戈加拉的接班人雷克斯·尼翁戈专门向数百名游击队员发出命令，要他们在竞选期间呆在营地外面。他们还为失去了通戈加拉的爱国阵线，编写了一部令人可怕的“电影剧本”。

这些人叹息说，一个能够把穆加贝和恩科莫撮合在一起、能够将他们的两支军队合为一般的人去世了。他们认为，内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事实上，穆加贝对通戈加拉的死确实感到震惊和不安。在噩耗传到马普托的当天晚上，他就跑到通戈加拉家，陪伴了他们全家整整一宵。在通戈加拉的尸体运回马普托后，他



带着他的遗孀前去太平间看望。然后，他又亲自安排罗得西亚一位专门承办丧葬的白人（民盟的一位老朋友），从索尔兹伯里乘飞机赶赴马普托，给尸体涂上香油和药料，以防腐烂。穆加贝知道人们大多会得出通戈加拉是“被谋杀”的结论，因此，他将几名外国记者叫到马普托他的家中，对他们说：“在我本人、或者民盟的任何其他领导人与通戈加拉之间，不存在分裂。”

“我承认通戈加拉一直在想方设法修补民盟和人盟之间的裂缝。他是博得民盟战士高度尊敬的寥寥无几的人之一。”

“但是，通戈加拉和民盟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所有成员一样，也认识到民盟有必要单独参加竞选。”

诸如此类的声明并没有消除人们的怀疑：通戈加拉是被谋杀的。但是，它们终究导致一些曾相信有人搞谋杀的西方外交官们说，如果说其中有阴谋的话，那么穆加贝对此可能也是一无所知的。

事实上，从当时所获得的各种证据——一些西方国家的使馆试图对所发生的事情得出自己的结论——来看，这确是一起车祸。

通戈加拉的尸体在马普托医院的太平间里停放了两天。1月2日，当通戈加拉部下的第一批官兵开始不拘人数地从罗得西亚东部的游击队集中营，赶到马普托向他的遗体告别时，他已经入殓了。

穆加贝领着吊唁的人走进太平间里的一个小房间，在灵柩旁循序缓步而行。紧随穆加贝的是几十名穿着军装的民盟游击战士，其次是几十个坐在轮椅里的人，他们都是在战争中受的伤。在绕过打开着的灵柩时，他们唱起了民盟的战歌，举着拳头高呼“民盟！民盟！”看着这些残废人从灵柩旁经

过，穆加贝差一点掉下眼泪。但他设法保持了足够的沉着，以便让吊唁的队伍相当快地往前走。

原以为萨莫拉·马谢尔会到太平间去，不料他托人捎信去说，他直接到墓地去了。民盟战士挤在仅有的几辆小汽车和卡车上，通戈加拉的灵柩安放在一辆奔驰车里。灵车在队伍的最前面。数百名莫桑比克人排列在街道两旁，低头看着送葬队伍从身旁经过。

在公墓的门口，马谢尔和穆加贝首先紧紧地拥抱，然后带着随行人员进入一间小礼堂，在那里举行了安葬仪式。当时，民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莫桑比克政府内阁的成员和数十名前去表示敬意的外交官没有受到什么款待，甚至供他们使用的房间也只是勉强足够。穆加贝和马谢尔首先向通戈加拉的灵柩分别献了花圈。接着，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大使也都献了花圈。

穆加贝以其惯常的温柔的声音和低沉的调子发表了讲话。他说，通戈加拉是（罗得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缔造了津巴布韦民族解放军。他是谁也不可能代替的。但是，尽管民盟遭到了这样的损失，它仍将继续进行斗争。

马谢尔讲话时的声调一直很低沉。“永别了，通戈加拉同志。”他刚刚开始宣读他那感情充沛的悼词，就放声痛哭了起来。

马谢尔总统讲的是葡萄牙语，但即使是象穆加贝这样一些不懂葡萄牙语的人，也很快就领悟了他讲话的主旨。

马谢尔的悼词既是对“亲爱的朋友和同志”通戈加拉发出的一种誓言，又是对民盟中央委员会的一种教育。他说，通戈加拉毕生都在谋求解放力量的团结和统一。

“我号召在场的每一个人以实现统一的实际行动，来纪念通戈加拉同志！”马谢尔提议道。

虽然这番话对于实现解放力量的统一来说为时已晚，但由马谢尔发挥关键作用、说服穆加贝唯有温和政策是通向胜利之路来说，却并不晚。

## 真正的敌人

凡是既见过马谢尔又接触过穆加贝的人，都会觉得他们俩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在于思想敏捷。有趣的是，他们俩从小都受过天主教方面的教育。但以后两人所走的道路就截然不同了：穆加贝先是教书，接着蹲监狱，在被监禁期间成长为一个理论家；马谢尔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他领导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战争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通过使穆加贝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书本。“战争是最好的大学。”马谢尔总是喜欢这样说道。

马谢尔孩提时代的教士，希望他长大以后从事教士方面的工作，但是马谢尔拒绝了。他没有成为教士，而是当了一名护士。作为护士，他在莫桑比克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所见所闻大多使他既愤慨又惊愕。1961年，马谢尔参加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前往阿尔及利亚接受训练。回国以后，他开始在军事和思想方面担任解放阵线的领导工作。60年代末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强烈地反对白人，其游击队员大多是通过发誓消灭剥削和凌辱非洲人的葡萄牙人之类的方式招募来的。马谢尔作为一名护士，曾发现莫桑比克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存在着种族歧视，即使是象他这样有一技之长的人，挣的钱也只有和他从事同样工作的白人的几分之一。

但是，这时马谢尔已经在放开眼量。他不只是考虑武装斗争的短期需要，而是想到解放阵线接管政权那一天。在党内围绕着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究竟是从事种族斗争还是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展开大辩论时，马谢尔挺身而出，站在那些反对从事种族斗争的指挥官的前列。

他争辩说，黑人民族主义和白人殖民主义一脉相承，只可能是剥削性质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决不能成为种族主义者，相反，它必须去粉碎莫桑比克的种族主义。

马谢尔获得了胜利。从那以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便献身于消灭殖民主义而不是白人的斗争。该党与非洲大多数其他革命政党不一样，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白人、亚洲人和其他有色人种。1980年，白人还被吸收进内阁。

这是一种重大的区别，它与通戈加拉在兰开斯特大厦会议之初，谈到伊恩·史密斯和他的母亲时所作的区别是一样的。通戈加拉和穆加贝在流亡莫桑比克期间，都从马谢尔那里学会了这种区别。这时，穆加贝准备坚定地以同样的原则去夺取政权。

1977年，马谢尔亲自确定了他们的共同敌人（当时大部分白人已经逃离莫桑比克，搞得总统对当初的做法感到悔恨）。“殖民主义是一种反人性的永久性罪恶，它象癌细胞一样，天天都在起腐蚀作用，吸吮穷苦人和被压迫者的血。

“殖民主义是一种反人类的永久性罪恶，它使人们失去了个性和尊严，使人们屈辱到这种地步：由于皮肤带有颜色而自认为低人一等，外人是很难想象我们怎样受苦受难的，——我们甚至希望出生的时候，皮肤与父母亲的不一样。我们不禁自问：为什么会生有这种倒霉的皮肤？只有有色人，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在人类尊严方面所遭受的长久侮辱。



“现在，我们已经在莫桑比克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关系。由于这一缘故，那么多的葡萄牙人在纷纷出走。他们无法面对真正的种族平等。我们反对种族主义是最坚定不移和毫不妥协的。但是我们也感到，如果过分强调种族隔离问题，就会产生这种危险：革命势力可能会转而发起一场反对白人的运动。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让我们确定共同敌人的问题。我们的敌人不是白人，也不是皮肤带色的问题。

“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我们的敌人是殖民资本主义的压迫。”

对于马谢尔和莫桑比克来说，发表这样一项关于敌人和目标的公正声明为时已晚。在莫桑比克宣告独立的前几个月里，损害已经造成。葡萄牙殖民者因为预料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会干出暴行，纷纷外逃。他们的逃跑仅仅是因为对解放阵线有恐惧，还是由于解放阵线进行了恫吓和强迫？这个问题始终没能搞个水落石出。当然，几乎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白人受到了什么损害，白人住家遭到袭击的情况极少，财物被盗的现象则更少。

白人外逃的最大可能是，他们被一种蓬勃发展的、鼓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浪潮吓坏了。白人专家——工程师、农学家、医生——感到，解放阵线的调子和性质，已经向他们预先发出了警告：可以预料，他们将在一夜之间被“国有化”。在解放阵线采取任何措施以阻止白人外流之前，出走的葡萄牙人已经达到25万之多。

对此，马谢尔的悔恨甚于其他任何人。莫桑比克独立时，他接管的是一个有文化和有技术的劳动力奇缺的国家，因为葡萄牙人早已留心采取措施，确保各级技术培训只囿于

白人。以下的统计数字颇能说明当时的情况：1975年7月25日，莫桑比克独立那天，马谢尔在已更名为马普托的首都所拥有的莫桑比克工程师两人、农学家三人、兽医五人、医生三十六人。而当时这个国家的总人口却有1,200万。

马谢尔一方面想方设法给他的人民提供他的革命所承诺提供的基本东西——食品、衣服、教育、工作和医疗，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地承认，白人出走造成了空缺。

而且，诚如马谢尔总统本人所喜欢说的那样，对他的革命政权造成威胁的不只是白人的出走，还有他们出走时的所作所为。马谢尔的一位亲密助手是这样说的：

“现在的问题不只是葡萄牙人出走了，问题还在于他们在出走的时候，毁掉了他们的所有东西，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如果他们捣坏一辆拖拉机，那他们就会把拖拉机的说明书也烧掉，以确信我们无法将机器重新安装。”

五年过去了，马谢尔仍然在遭受着一场被白人视为种族主义战争的灾害。

在穆加贝从伦敦返回马普托时，战争的后果实在太明显了。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城市满目疮痍，或者无数的人在仅有的几家仍在营业的商店门口排着长龙，抢购寥寥无几的食品和商品，甚至还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以革命为题材的壁画亟需油漆一新。整个国家正面临着严重衰败，革命处在十字路口。

基层的数百个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情况又如何呢？它们既缺设备，又缺技术，生产根本就没有接近独立前的水平。莫桑比克本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出口国，然而这时却不得不大量进口基本食品。

结果，莫桑比克1979年的国际收支赤字达二亿三千万美

元，比它在1978年的出口总额还多。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外援（主要是瑞典的援助），国际收支的赤字比这还要多两倍。

诸如此类的数字——近期内不可能有所改善——使得和平成为马谢尔总统的当务之急。由于要搞和平，他的革命便只能暂缓进行。

但是，总统利用这一时机，把注意力转回国内，和他的人民一起发动了攻势。

12月初，当穆加贝在伦敦逐步走向和平时，马谢尔开始发表一系列旨在使莫桑比克人认识自己弱点的演讲。这是总统在策略方面的根本变化。他想使他的人民感到震惊，从而摆脱会使他和莫桑比克的革命毁于一旦的官僚主义、冷漠无情和无所作为。

他说：“我不会允许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以极端民主和左倾思想来破坏我们的政权。他们在制造一种虚假的平等，让没有技术的人去从事他们不能胜任的工作。他们这样做是在破坏整个经济。”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连串莫名其妙的话，实际上却是向每个人发出的一种严厉的信息。

几个星期后，这番莫名其妙的话便变成了行动。莫桑比克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变化。

譬如，全国各地的“人民商店”统统关闭。这些商店主要销售食品和衣服，办得毫无生气，相当糟糕。由于商店的经理（据马谢尔总统说，他们的收入比护士还高）几乎不想办法寻找货源，他们的店里经常空空如也。在这种情况下，否定个体商人的作用便是“左倾主义”。实际上，政府以前接管小型企业是错误的。几周后，马谢尔发表讲话说：“国

家将创造条件，支持私人办商业、农场和工业，私人的活动可以在加强我们的国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了做到这一点，马谢尔每天都亲临商店、工厂、农场、发电站，甚至到马普托机场视察，告诫工人们消除腐化堕落和懒散怠惰的现象。这就是说，在穆加贝从伦敦回到莫桑比克时，马谢尔已经不仅在宣传实用主义政策，而且在身体力行地贯彻这种政策。马谢尔在策略上的变化、以及后来他提出的忠告，给准备回到津巴布韦展开竞选的穆加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克服“左”的倾向

1月9日，马谢尔接受早已向他发出的邀请，在马普托对穆加贝的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讲话。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正在忙于准备竞选纲领。穆加贝再一次允许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对每一个问题都尽可能进行全面的辩论。强硬派再次提出了一条战斗的路线：制订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包括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将白人的土地立即分给非洲人，甚至断绝与南非的关系。

马谢尔总统的干预——主张实行温和和现实主义的政  
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下的事实，已经算不得什么秘密：一个时期以来，马谢尔和他的高级助手对民盟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感到怀疑。这倒不是他们对民盟的思想意识有疑阂，而是认为穆加贝及其中央委员会从未有过足够的时间和自由，来为党制定一条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所需要的统一路线。他们说，作为一个政党，民盟内部的纠葛、清洗和个人之间的对立实在太多



了，以致它无法确定其方向。马谢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盟即便是谈论马克思主义，也将是极端危险的。只要民盟最高领导层中间有任何意见分歧，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就决不会达到。而且，谈论马克思主义只会造成罗得西亚白人的惊恐不安。

马谢尔在对民盟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时，首先考虑的是白人。他说，“在冷酷腐败和残酷无情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与罗得西亚白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罗得西亚的白人——不管他们有什么缺点——在罗得西亚独立后，可以给新生的津巴布韦发展经济提供很多东西，而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则不然。马谢尔以莫桑比克的情况为例作了解释。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白人的出走，将会造成多大的灾难。“快别说那些娓娓动听的话，否则你们会把白人吓跑的，你们需要他们。”马谢尔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如果你们迫使白人纷纷逃走，你们就会面临毁灭。”

据莫桑比克人士说，马谢尔在他的党准备大选时，改变了它的思想路线。这是一种坦率和理智的显著表现。

“不要试图模仿我们，”马谢尔说，“你们回去以后不要搞虚假的马克思主义游戏。你们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因此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

“莫桑比克的处境已经够困难的了，我们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民盟领导的思想情绪立刻发生了变化。在几天以后宣布的竞选声明中，温和的信息非常明显。

声明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甚至连社会主义也只是一带而过。声明在从白人、工业到农业、教育、甚至宗教等各个问题上，都反映出民盟领导人试图面对现实、放弃不切实际

的空想，试图从莫桑比克人所遇到的困难和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当然，声明也展望了“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声明说：“在努力实现津巴布韦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民盟组成的政府将……承认津巴布韦历史的、社会的和其它方面的既成事实。资本主义制度是这些现实之一，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因此，在对现存的经济部门的许多领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我们将承认这一点：私人企业将不得不继续存在，直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成熟。”

最后，穆加贝和他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将他们自己置身到了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就象马谢尔在前几年所做的那样。但是，穆加贝与马谢尔不一样，他有机会说服白人留下不走，而且他决心抓住这一机会。

“民盟愿向所有白人、亚洲人和混血人作出最全面的保证：民盟政府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社会或行政实践中，都决不会歧视他们。不管是白人实行的种族主义还是黑人实行的种族主义，都是与民盟的人道主义哲学所背道而驰的。种族主义与部落或地区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津巴布韦决不能只是一个黑人国家，它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共存的国家。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团结的、强大的国家。”

## 阴 谋

英国方面对于马谢尔总统向穆加贝提出的忠告一清二楚。但由于存在着互不信任这一障碍，索尔兹伯里总督府和

穆加贝之间仍然相距甚远。总督府的人对穆加贝所作的承诺表示怀疑，而穆加贝则对他们所作的保证表示怀疑。这种互不信任使得穆加贝一直留在莫桑比克，直到马谢尔向民盟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后又过了三个星期才离开。

虽然这时罗得西亚的空军还没有轰炸穆加贝的部队，但穆加贝却担心有人会做出比马基雅弗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情，——担心英国的真实目的，是通过确保罗得西亚产生一个温和的、亲西方的和将毫不犹豫地粉碎他的革命的政权，来保护它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英国总督索姆斯勋爵先是从索尔兹伯里传去话说，由于其他政治家（包括穆佐雷瓦主教和西索尔牧师）打算在几个星期天——穆加贝计划返回罗得西亚的那些日子——在首都举行集会，穆加贝不能在这些日子回去。恩科莫已经在1月12日返回索尔兹伯里，受到了一大群人的欢迎。穆加贝不愿让人们看到他吸引的人数少于恩科莫和穆佐雷瓦所吸引的人。他想，只有在星期天回去，他的支持者们才有可能全部出来迎接他。总督拒绝穆加贝在星期天回去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两个对立的党派在同一天、同一个地方举行集会，警方就会无法保证维持法律和秩序；穆加贝的对手已经赶在他之前预定了举行集会的日期。

接着，索姆斯又要求穆加贝将70名政治上的反对者（即两年前被他清洗出去的“持不同观点者”）从莫桑比克的监狱中释放出去。索姆斯勋爵说，穆加贝必须在赫伯特·哈马德齐里皮和鲁加雷·贡博之流获释后才能返回罗得西亚。

在此之前不久，索尔兹伯里传来消息说，一小部分游击队员因为未向游击队集结营报到，而被罗得西亚治安部队打死。与此同时，索尔兹伯里方面宣布说，索姆斯勋爵已经表

态，同意南非在罗得西亚境内驻扎一小部分部队，以保护至关重要的公路和铁路枢纽，如横跨林波波河的拜特布里奇大桥等。

穆加贝发觉其中有阴谋。

1月14日，他在马普托同戴维·史密斯交谈时，毫无保留地谈了他的这一看法。他说：“英国人设法反对我们，在两条战线设法反对我们：首先是在军事战线，英国人玷污了停火协议。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确保罗得西亚人解散军队。现在，他们又背信弃义，不顾当初作出的将南非军队撤出罗得西亚的保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追捕我们的部队，残酷无情地向他们开枪，不让他们有机会向游击队集结营转移，尽管事实上有足够的<sup>时间</sup>通知他们停火，并被带往集结营。”

“其次是在政治战线，英国人以种种借口推遏我们离开这里。其中之一是穆佐雷瓦要在周末举行群众集会，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人进入索尔兹伯里。请注意，仅仅是因为穆佐雷瓦自己要举行集会，我们就不得不推迟回国。”

“我简直无法相信，索姆斯勋爵竟能以这种方式来行事。这种方式赤裸裸地表明他站在穆佐雷瓦一边反对我们。”

史密斯：您仍还相信英国人吗？

穆加贝：不！不！我……我……我恰恰失去了……我是说我已经不信任他们，我已经失去了我对英国政府的任何一点信任。我一点不知道他们会这样的不诚实，实在令人震惊！

史密斯：您认为您还能获胜吗？

穆加贝：啊，是的，肯定，肯定，肯定！迹象相当明显。我们得到举国上下的全力支持，我们相信事实将证明我



们的估计是正确的。

史密斯：方才您谈到了迹象问题，请问您指的是什么迹象？

穆加贝：什么迹象？支持我们的迹象！倘若您在街上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交谈，他会告诉您他是支持我们的；倘若您和乡下人、和农民交谈，他们也会告诉您，他们基本上都是支持我们的。难道这些还不够吗？英国政府和罗得西亚部队之所以在追捕我们的游击队，在各个方面给我们作难，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将会赢得胜利。他们企图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阻挠我们的胜利。

不管穆加贝多么强烈的相信存在着一个针对他的阴谋；他对自己、对他的党的信心却比过去更加坚定了。

鉴于停火的障碍已被冲破——罗得西亚人未能摧毁他的部队——他毫不怀疑地相信，他将赢得这次大选。正因为如此，在马谢尔坚持要将关押中的民盟反对者释放出去，并要求他们在他们“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星期就立即回国时，穆加贝作了让步。

在接受史密斯的采访之后没有几天，萨丽·穆加贝给沃尔史顿夫人写了一封信：“看来，我们终于能够回国了。我们本来打算早些离开这里，可是总督捎信来说我们不能走。请注意，现在离开大选只有一个月时间了。其他人都已获准投入竞选，并且已经在积极展开竞选，有些人甚至得到了总督大人的公开支持……”

“我们对总督采取的偏向立场深感失望。虽然现在国家已经恢复了所谓的法律，但我们的条件却依然是这样的艰苦。然而，我们将不顾这一切，继续进行斗争。在我们的坚强后盾——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下，我们将会赢得胜

利……如果索姆斯总督阁下允许的话。”

在流亡的最后10天里，穆加贝挤出时间，做他一贯允诺自己的事情：学习、阅读、就政策问题展开讨论。他深深懂得，如果想要当一位名副其实的总理，他非这样做不可。10多年来，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此之前，出任总理始终是一种遥远的前景。

对于穆加贝在居留莫桑比克的最后几天里，所接待的屈指可数的访客来说，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不象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在关心新作出的决定、当今政治、来自索尔兹伯里的最新消息……而是在考虑明天的政治、他统治下的津巴布韦、他将面临的各种问题……。凡是可能找到的关于罗得西亚的一切材料，他几乎都看。他最关心的是津巴布韦的工业、特别是矿业。当时，津巴布韦的各种矿几乎全都掌握在私人手中。他说，他不打算对这些矿实行国有化，但想让国家对它们进行比较多的干预——不仅要获得利润，而且要改善矿工们的待遇。

穆加贝可以如数家珍似地说出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数字，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津巴布韦的新政府将面临的各种问题：100万人离乡背井，当年让他们返回家园，播种谷物以养活自己，对他们来说为时太晚；由于战争造成学校关闭，近50万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在广大农村地区，仅有寥寥无几的医生仍然在那里工作，而需要他们服务的人却有数百万。

总之，穆加贝在以总理的身份阅读。他之所以对赢得大选这样满有把握，并不完全是由于他知道“人民战争”已经在全国广大地区垄断了选票，也不是因为他受了自己那些雄辩的欺骗。当然，他也没有天真到认为由于他最能干才将赢

得胜利。

穆加贝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有着坚定不移的、几乎是宗教式的信念。他认为，如果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就不会使得史密斯和沃尔斯作出妥协，他自己一生也就不会有机会建立一个自由和公正的津巴布韦。人民将会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多数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当穆加贝说“我们通过武装斗争赢得了和平”时，人民将会听从他。穆加贝对此深信不疑。

## 第七章 大 选

### 终于回国

多年来，穆加贝的睡眠一直不好。这是铁窗生活的一种后遗症。这一天晚上当然也不例外，他虽已想方设法，也只是睡了二、三个小时，凌晨四点半，他就在马普托的寓所内起床了。尔后，他象往常一样进行一小时的健身体操、体质锻炼和沉思默想。至于早餐，他一点也不想吃。这一天是他毕生所盼望的日子，但是正如他事后所承认，当时因为过于激动而未能真正享受其中的乐趣。

早晨七点半，他和萨丽来到了马普托的马瓦拉内机场。莫桑比克国家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27飞机在等待着他们。莫桑比克直到几个月前才成立一家航空公司。现在，这家航空公司已同英国的一家航空公司（米德兰航空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为它提供飞机、驾驶员和技师。随同穆加贝夫妇一起回国的还有一百名民盟的工作人员，其中很多人与他们夫妇俩一样，已经在莫桑比克度过了五个年头。当初他们跟随穆加贝来到莫桑比克过流亡生活，现在又跟随他返回自己的祖国津巴布韦。

从马普托到索尔兹伯里的航程为90分钟。这一个小半小时正好给穆加贝用来为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作准备。他



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重新过目他将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上。他很清楚，这项声明，对于他有机会赢得大选是举足轻重的，对于他从一开始就给人以正确的印象是至关紧要的。毕竟恩科莫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的竞选，穆佐雷瓦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竞选。穆加贝不时透过飞机的舷窗眺望，禁不住思潮翻滚，浮想联翩。霎时，过去发生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眼前：11年铁窗生活、孩子的不幸死去、战争岁月、兰开斯特大厦艰苦的和平。他对自己默默地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时刻——回到自己的祖国津巴布韦。在一些人看来，他是一个“残暴成性的共产党恐怖分子”，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是一个英雄好汉。

上午九时半，穆加贝乘坐的飞机在索尔兹伯里机场徐徐降落。机场上冷冷清清，只见一些监督停火部队的士兵在机场跑道尽头的帐篷外等候。不过他们等待的不是穆加贝，而是预定晚些时候运送给养和设备来的英国皇家空军的运输机。

在雷克斯·尼翁戈和民族解放军的其他指挥官12月26日回国后，索姆斯总督已命令禁止在索尔兹伯里机场为“回国者”举行任何欢迎集会。在尼翁戈等人回国那天，成千上万名爱国阵线的支持者蜂拥到机场四周，警察闻讯立即带着警犬前去驱赶，许多人遭到了逮捕。总督为了避免发生类似冲突，宣布从此以后禁止举行集会。

穆加贝第一个走下飞机，边走边向候机大楼阳台上的一小批人——几乎全是记者——挥手致意。然后，他大步流星地朝入境手续办理处走去，一路上连蹦带跳地，仿佛他可以不必等候办理手续了。不料，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并没有受到达官贵人的待遇，他们必须同其他旅客一样，向海关申报，到移民办事处办理有关手续。机场的一位白人工作人员在经

过入境手续办理处时，对他们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虽然没有当着他们的面，但在他们的听力范围之内，响得足以使他们知道此人在嘀咕些什么。过了3个月，在穆加贝当选为总理之后，萨丽回顾了当时的这番情景。

“现在当我前往机场时，有人会以护送达官贵人的方式来护送我。”1980年5月1日萨丽在给伊丽莎白·沃尔斯顿的信中写道，“可是仅仅3个月前（1月27日），当我们在被流放——罗伯特5年，我17个月——后返回自己的祖国时，我们受到的却是粗暴无礼的待遇，机场的一位白人工作人员对我们讲了一大通侮辱性的话，而现在护送我的就是这帮人。这种做法难道有必要吗？”

机场的新闻室很小，数十名记者拥挤在里面听穆加贝发表讲话。兹沃布戈与往常一样，作了一个贴切场合的引子：

“女士们，先生们，我十分荣幸地向诸位引见——不是引见，而是再次介绍——即将担任自由的津巴布韦总理的罗伯特·穆加贝。”

在座的记者中，有很多人是穆加贝在达累斯萨拉姆、马普托、卢萨卡、罗马、斯德哥尔摩、日内瓦和兰开斯特大厦的时候认识的。这些地方都是他在流亡中曾经逗留过的。当时，他似乎觉得自己将会终生流亡。

“想不到能够在这里见到您，”他指着其中的一位英国记者说。以前，穆加贝在索尔兹伯里毕竟没有举行过什么记者招待会。

穆加贝的声明堪称精确的典范。由于当局的新闻检查，以前罗得西亚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几乎都不了解穆加贝。他知道，罗得西亚的报纸、电视和广播将首次报导他的讲话，而且将把他作为大选中的一个候选人，而不是恐怖

分子的声明加以报导。

穆加贝的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而且，他讲话的时候不断地环顾听众，以确信他们在听他讲话，并察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对于许多当晚在电视上看到他的罗得西亚人来说，这是一个焕然一新的穆加贝，而不是他们所听说的穆加贝。不过，任何一个在前几个月里注意了穆加贝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位富有思想、聪明灵巧和能言善辩的政治家。他在兰开斯特大厦的谈判是那样的老练。穆加贝激情洋溢地发表了一篇温和与和平的声明，试图减轻所有罗得西亚人的担忧，并消除那个最有可能损害他的东西——围绕他的名字所形成的神秘色彩。他说：“津巴布韦这个国家必须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也就是说，必须彻底改变目前这种存在着‘平等’与‘不平等’、‘上等’与‘下等’以及‘白人’与‘黑人’之分的状况。

“我们将改变这种状况。但是，我们不会使黑人多数成为压迫性的种族。我们通过民主保持人人平等，决不搞任何以种族和肤色为基础的歧视。

“我们将保证实行这种形式的民主，保证每个人——不管他（她）是什么样的种族和肤色——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因此，没有必要忧虑或害怕。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我们诚实地进行了斗争，为了我们认为是我们正当的目标而英勇战斗；我们在和平时期也将表现出诚实的态度，为实现一个个人人都有一席之地的社会而奋斗。

“这是我们的目标！”

天刚破晓，人们就开始络绎不绝地涌到会场。有一些人乘坐小汽车而来，数百人骑自行车而来，数千人乘坐公共

汽车而来，还有数万人则是徒步而来。到上午十一点钟时，作为会场的索尔兹伯里海菲尔德区津巴布韦体育场，已经人山人海——岂止挤得水泄不通，简直是在充溢了。人们打着“穆加贝万岁”和“继续斗争”等横幅标语，穿着印有民盟的象征——小公鸡的短袖圆领汗衫。还有人把穆加贝的像高举到头顶上。突然间，穆加贝在十天前对支持他的力量所作的一番评论，听起来不象是竞选中的夸夸其谈了。

会场上有维持秩序的人员，他们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站在大门口对每一个人进行检查；有急救小组负责救护在炎热中突然晕倒的人；还有一支歌唱队，队员们情绪高昂，不断演唱民盟盟歌《津巴布韦》。

穆加贝迟到了，但是谁也没有介意。当他乘坐的白色梅塞德斯车缓缓驶入主席台背后的空地时，几十名支持者跳到了汽车的引擎盖上，爬到了汽车顶上。穆加贝并没有攀登主席台后面的台阶，在如潮的人群不断的簇拥下，他的双脚腾空了。这时，穆加贝的两眼不禁湿润了，眼眶里滚动着泪花。他已经看不到萨丽，因为她被后面小车旁的一大堆人围住了。当穆加贝走上主席台时，会场上20万人异口同声地高呼：“穆加贝！穆加贝！穆加贝！”呼喊声持续了五分钟，这是津巴布韦人的一种标准的欢迎仪式。穆加贝把双手高高地举到头顶上，象一位演说家似地，向着各个方向的人群挥舞，并鞠躬致意。这时，作为公开的名流，他满脸笑容；作为私下的个人，却暗自饮泣。当会场终于安静了下来后，穆加贝首先对着麦克风为那些把他带到这一胜利时刻的盟友进行深沉的祈祷：

“尼雷尔总统万岁！”

“卡翁达总统万岁！”



“萨莫拉·马谢尔总统万岁！莫桑比克万岁！”

他稍稍停了一下，告诉人们，或者说是命令全体与会者肃静，仿佛他一生都在这样做的。

“决不要忘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我们要继续进行战斗！”人群先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一阵长时间的响亮的掌声。

穆加贝终于回国了，他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来争取赢得这场他已足足准备了20多年的大选。

几周来——或者说整个一月份——迹象不断增加。圭洛警察站呈交的一份报告、乌姆塔利选举专员打去的一个电话、党的一位官员到总督府进行的一次上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同一件事：罗得西亚出现了严重的恐吓现象，它有可能使大选成为一场闹剧。

总有一天，这些材料会引起选举专员约翰·博因顿爵士或他的副手马尔科姆·卡拉瑟斯的重视。而且，他们不久就会把它们转交给总督。

索姆斯勋爵从12月中旬抵达罗得西亚的时候起，就已经意识到，恐吓是一个未知的因素，它不仅会破坏实现和平的机会，而且会为（他管辖下的罗得西亚）内战创造条件。

早在12月22日，索姆斯勋爵就得到了第一次警告。这天上午9点45分，一辆蓝色的普吉奥小汽车从海菲尔德区穆加贝妹妹家的住房前经过。汽车在马路的尽头掉了个头，然后慢悠悠地转到这间房子的后面。车内的两个非洲人用自动步枪和一挺机枪开了火，还有一个人从车内猛地掷出一颗苏联造手榴弹，手榴弹当时没有爆炸，但后来爆炸时炸伤了穆加贝的两个外甥。事件发生后，各方互相指责。穆佐雷瓦说这是

穆加贝自己党内的判乱分子干的勾当，索尔兹伯里的警察暗示说，这是恩科莫的人干的，而穆加贝——他在当晚离开伦敦返回非洲——则指控罗得西亚保安部队。索姆斯总督无可奈何，只好说：“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必须制止！”

尽管如此，英国人仍然感到宽慰，因为圣诞节和元旦期间的停火相当成功。不过，象约翰·艾克兰——英联邦监督停火部队态度生硬，但又令人钦佩的司令——这样一些人私下里却在为他们的部队忧心忡忡，因为他们已分为15至20人不等的小组，前往等候游击队进入集结营。各小组在徒步进入情况不明的地方，仅仅带有一些轻武器和三等给养。头几天，仅有数百名游击队员进入集结营报到。这时，由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爱尔兰警卫部队、肯尼亚步枪队和新西兰步兵队组成的停火监督部队，看来因为行动过于鲁莽而糟糕地暴露了自己。他们知道，他们在许多营地被游击队包围着。游击队始终对他们疑虑多端，在进入集结营之前就已经在“窥探他们”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恩科莫和穆加贝的）两支游击队严守纪律、以及艾克兰和他的士兵更为沉着和更加耐心才能奏效。穆加贝的将军雷克斯·尼翁戈和恩科莫的指挥官杜米索·达本瓜强烈要求艾克兰和索姆斯延长游击队到各集结营报到的时间，不再坚持在兰开斯特大厦达成的最后期限——1月4日星期五午夜之前。艾克兰是根本不会同意他们的要求的。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把这些混蛋弄进集结营，那我们就再也甭想了。”但是索姆斯总督同意了。冒险果然奏效。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数千名游击队员陆续进入了集结营，在短短的24小时内，集结营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总督府的人总算全部松了一口气。实现停火的第一个障

碍终于清除了，但是依然存在的障碍比这大得多。为了确保自由和公正地进行选举，索姆斯总督不得不尽其所能，使这个国家摆脱各个党派的恐吓。

他自己觉得，他已经作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按照规定，如果他需要的话，他有权取消候选人的竞选资格，取缔政党，甚至可以宣布投票无效和作废。但是，索姆斯不想这样做。他已拿定主意，把说服力当作他的主要武器。

就象道义导致卡林顿走向了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一样，道义也促使索姆斯决心让所有政党都参加大选。总督是一位赛马迷，因此他用赛马运动中的术语来比喻他采取的策略。

“在这场特殊的赛马中”，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所有的马——不管它是什么种类——都必须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也许，我们将不得不拉出一、二个赛马人，甚至进行一番查询，但是，他们全都要去参加比赛。”

罗得西亚终于实现了停火，艾克兰本来应该感到高兴，但是他在1月中旬得到的一些类似情报的报告，向他反映了另一方面的情况：在12月22日至1月6日的两周时间里，穆加贝的三千多名民族解放军战士，从莫桑比克渗透到了罗得西亚东部地区，从而违反了禁止偷越边境的兰开斯特大厦停火协议。除有一些人已经进入集结营外，大部分还没有。使总督府感到更为忐忑不安的是，这批人将他们的武器藏进了边境地区的地窖了。

据悉，尚未进入集结营的游击战士大大超过两千人，他们显然是按照雷克斯·尼翁戈的命令才这样做的。这一证据是从在停火期限过后，被罗得西亚人俘获的三百名民族解放军的游击队员那里获得的。当罗得西亚警察部队中的英国顾

问对他们进行审讯时，他们坦白说，尼翁戈曾亲自下达命令，让他们呆在集结营外面。据他们说，尼翁戈还告诉他们，以后他如果是由于迫于压力，而发出相反的命令时，决不要理睬。在掌握了这一线索后，对于以下的事实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当尼翁戈在索姆斯总督的催促下被迫在广播中呼吁那些士兵进入集中营时，他们没有理睬。这意味着在整个东部高地——从北部的森特纳里到南部的齐雷济——仍有数百名游击战士在自由活动，他们可以捉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随即，选举监督委员会开始接到各种报告。在穆加贝回国时，一个由八名英国选举监督员组成的小组，已经在给一份关于竞选运动进展情况的中期报告写结束语了。他们得出了骇人听闻的结论：罗得西亚50%以上的人民在遭到穆加贝的游击队和支持者们的恐吓，全国八个选区中，有五个不存在“公正和自由选举”的条件。

选举监督员们几乎没有找到什么根据来证明罗得西亚治安部队的辅助分队有恐吓行为。这与穆加贝的说法截然不同。辅助分队共约2.3万人，是由穆佐雷瓦建立的，其成员都是在1978年和1979年期间他发起大赦运动时获释的游击战士和失业青年。

只有在维多利亚省，英国选举监督员报告说，辅助分队曾采用过“武力竞选的手段”，迫使农民参加了穆佐雷瓦举行的一次集会。

但也正是在维多利亚省，总督获得了最糟糕的恐吓证据。而且，这种证据是由穆加贝昔日的盟友乔舒阿·恩科莫提供的，这对穆加贝的损害就更加严重了。恩科莫对总督说，他的3位工作人员（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马科姆贝的候



选人和他的两位助手)在维多利亚堡附近的奇比部落托管地张贴标语时,遭到两名持枪人的劫持,持枪人自称是民盟解放军“战士”,他们把马科姆贝等3人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庄,然后把村民们集合到一起,命令他们不要理睬恩科莫的党。据恩科莫讲,随后,持枪人对人群说,穆加贝的党有办法查明人们在大选中投了什么票。谁要是不投穆加贝的票,而投其他党的候选人的票,就会人头落地。

马科姆贝的两位助手遭到了毒打。最后,有人看到持枪人将烧得通红的煤块,塞进了马科姆贝的咽喉。

“使用‘恐吓’这个词,未免有点儿轻描淡写”,恩科莫说,“人民在受到恐吓。这是一种恐怖。人民的心里感到害怕。”当然,这种恐怖根本不象中期报告所说的那样,纯属一方所造成。

谁要是到索尔兹伯里哈拉雷区(这地方几乎没有恐吓现象)的临时居民区走一走,就可以发现无数穆佐雷瓦的辅助分队的受害者。就拿一位名叫约翰·塞克雷的年青商人来说吧。1月27日,他在津巴布韦体育场参加了欢迎穆加贝回国的集会后,开着装有民盟(爱国阵线)标语的汽车返回索尔兹伯里以东大约30英里的戈罗蒙齐区。到了那里后,他飞快地将这些标语贴在村里的各个地方。穆佐雷瓦的辅助分队获悉后,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塞克雷逃之夭夭了,但辅助分队的人在他那间小棚屋里发现了他的侄子,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打死了他。棚屋被他们付之一炬。此外,帕特里夏和艾琳也都是辅助分队的受害者。这两个人均为大家庭的母亲,也住在戈罗蒙齐区。据她们说,2月初的一天早晨,辅助分队来到它们的村子,先是朝村民们头上开枪,然后见人就打。为什么呢?据两位老妈妈说,就是因为民族解放军游击

队前一天曾来过这个村庄。穆佐雷瓦主教因为遇到了这类挑战，就说人们受到了“洗脑”，学会了“撒谎”。其实，所有这些“牺牲者”都被送回了家乡，而他们的乡亲们由于对记者的到来，毫无思想准备，于是稀里糊涂地支持了这种说法。

总督府获得的大多数证据仍然表明，穆加贝的人应该对大多数恐吓行为负责。因此，在穆加贝返回国内时，索姆斯勋爵意识到某种形式的最后摊牌，不但无法避免，而且已经迫在眉睫。总督的一、二位助手，在感到比较悲观的时候也承认说，也许“有一个赛马人和一匹赛马，不会保证站在起跑线上。”

穆加贝花了大约3万英镑，在索尔兹伯里以白人为主的快乐山郊区买了一幢房子。具体地址是夸恩大街27号。夸恩大街是一条浓荫披盖的马路，两旁是宽敞的房屋和众多的大轿车。27号原先住的是一户富有的白人，在摩托车比赛和赛马界颇有名气。这幢房子唯一的美中不足是缺少一个游泳池。

穆加贝在2月1日搬了进去。园内有一块两英亩大的草坪，草坪四周是一道高大的石墙，大门是用铁板铸成的。穆加贝住进去后，大门口由一位白人警察把守，遇到有人来访时，则由他自己的警卫人员出去检查。牵着狗来散步的白人，会被告知离开这房子远一点，到马路对面去遛达。开头几天，白人为了报复，在每次开车路经这里时，故意使劲地、长时间地按喇叭。

穆加贝正要乔迁新居，接到了他一直在等待的电话。

“喂，穆加贝先生吗？我是总督办公室。索姆斯勋爵想要见见您。10点钟，行吗？”

穆加贝是一个时间概念非常强的人。但他几个星期后到

总督府去会见总督时，实际上却迟到了一分钟。他一边走上台阶，一边说：“对不起，今天我们在按照非洲人的时间行事了。”

穆加贝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驱车前往总督府。他决心不迟到。汽车驶进了总督府门前的停车场，6名手端冲锋枪的警卫人员刷地一下冲到穆加贝的前面。总督的一位助手从里面走了出来迎接穆加贝。他扫了一眼面前的几支枪口后，摆开双臂，落落大方地继续朝前走了过去。总督助手告诉穆加贝，他的警卫人员不能进入总督府。

穆加贝不禁感到有点儿惊奇。但是，他马上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不进去……不进去……行！你们在外边等着吧。”

索姆斯总督和穆加贝以前从未见过面。两人在紧靠总督办公室的一间大客厅里握了手。索姆斯天生是一个热情和蔼的人。他同恩科莫只见了几次面，就开始拥抱起来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总督在同穆加贝首次见面时，是比较冷淡的。恩科莫和穆佐雷瓦都是直接带着他们的顾问来见他的，但穆加贝的随行人员却要正规得多。

穆加贝只是带去了他的主要内阁成员埃默森·穆南加瓜（在中国受训的第一批五位民盟游击队员之一和一位名副其实的律师）和莫里斯·尼亚贡博（一位老牌的民族主义者，去年11月才从监狱里放出来，此后代表穆加贝经常会晤索姆斯总督），还有一位是奥蒂尔小姐。她是一位文静而又勤快的书记员。她深信总督也需要精确的谈话记录。

索姆斯一开始就说，他希望穆加贝不要因为迟到而心里感到太难受。

“我确感到难受，”穆加贝答道，“当然，这并非完全由于我的迟到……停火的局面被治安部队和辅助支队不断打

破……许多地方出现了南非人的部队……这是我事先所未曾想到的。”

总督耐耐心心地听他说完，然后以指责民盟解放军搞恐吓活动的方式作了回答。穆加贝不承认他的一些部队故意呆在游击队集结营之外，只承认在将有关信息传达给他的部队方面有问题。

“通戈加拉的死引起了很大的混乱，”穆加贝说道。在经过了90分钟“亲热”，但实际上并不太友好的谈话后，索姆斯勋爵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国家必须得到一张无疫证书，我就看你的了。”

三天后，一辆公共汽车在索尔兹伯里以东约一百英里的一条通往乌姆塔利的公路上遭到了伏击，15名黑人平民被打死，20多人受伤。伏击中使用的火箭筒和小型武器表明，这次事件应由穆加贝的民族解放军负责。沃尔斯将军的一位助手说，和平老是这样的脆弱，它不仅在产生裂缝，而且在分崩离析。

根据他所拥有的应急权，总督已经可以禁止穆加贝的党参加大选。于是，他颁布了一条法令。这条法令，使他能够在全国任何选区限制党的会议、中止某个候选人竞选和取消某个政党的竞选资格。2月10日星期六，民盟的强硬分子伊诺斯·恩卡拉（曾被关押了15年，现在是穆加贝在马塔贝莱兰地区的主要候选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如果穆加贝不能赢得这次大选，战争就会恢复。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援引他的话说：“总督可以上吊去了。”

索姆斯说，这是一种煽动。次日星期天，总督府正式宣布，禁止恩卡拉进行竞选。恩卡拉原是一位职员，现在已经成为民盟的司库。



## 竞 选

星期日这天，穆加贝正好在维多利亚堡。这还是他的第二次重大的竞选集会。集会的出席情况相当好，穆乔凯居民区的大约二万五千人参加了集会。他们在会上听到穆加贝向索姆斯总督发起了空前猛烈的攻击。他警告说，如果索姆斯勋爵企图禁止他的党（不是指象恩卡拉这样一些人）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展开竞选，他就下令他的战士撤离集结营。

穆加贝说：“如果索姆斯勋爵准备利用他所拥有的新的权力来禁止民盟（爱国阵线），民盟（爱国阵线）就要考虑废除兰开斯特大厦和平协议；如果我们遭到禁止，我们将不会让我们的部队继续驻扎在集结营。”

穆加贝的车队被人群拦住了，因此，当他们前往当地的一座简易机场，赶乘返回索尔兹伯里的飞机时，已经比原定时间晚了很多。当车队在拐入通往简易机场的道路时，冷不防出了事。在车队经过的公路上，爆炸了一颗重型炸弹。穆加贝受到了震动，一阵强烈的震动，但没有受伤。他后面一辆车上的5个警卫人员受了伤。这是穆加贝最危险的一次逃脱。

一切迹象表明，这次袭击行动手段高超，决非一般人所干。炸弹内装了90磅梯恩梯炸药，其中的一部分是由一个人站在距离公路约一百码的高草丛中，用电子仪器引爆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人在炸弹爆炸后朝穆加贝的汽车开了火，不过这一说法始终未能得到证实）。当时在这条公路的地下管道里也埋了一颗地雷，但它没有爆炸。据后来前去引爆的罗得西亚炸弹专家说，这颗地雷的构造表明，制造它的人具

有渊博的专门知识。第二天，穆加贝回到了索尔兹伯里他的家中。他随即对总督发起了进攻。

“这次爆炸事件，显然是罗得西亚治安部队制造的，而他们却是总督选定在全国部署的部队。”穆加贝在自家后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不过是英国人、南非人和罗得西亚人为了阻挠本党参加选举而精心制定的许多战略之一。”他说，他受到如此待遇，使他似乎成了一名叛徒——背叛了他在游击队集结营的弟兄。

“如果继续受到罗得西亚治安部队和辅助分队的威胁，我将不会坚持让我的部队留在集结营内。如果索姆斯勋爵不制止他们……我们就将重新开始进行战争。”

这是整个和平过程中的最低潮。然而，穆加贝在第二天就彻底改变了这一进程，他表现出一种蔑视、诚实和明智的态度，这使总督府的每一个人都大为惊奇。

索姆斯打电话给穆加贝，约他晚上六点钟到总督府去。穆加贝带着他的中央委员会中的两位最高级成员——他的副手西蒙·穆增达和埃德加·特克雷——如约到达了那里。特克雷是一个强硬派；他反对兰开斯特大厦和平协议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穆加贝没有给索姆斯勋爵很多机会。他礼貌而又坚决地对实行停火的方式发起了猛烈进攻。他不仅列举了维多利亚堡发生的爆炸事件，而且说现在有证据证明罗得西亚空军对莫桑比克东北部边境上的两个村庄进行了轰炸。穆加贝提出，如果总督愿意的话，他可以带他到现场去察看。索姆斯没有同意，他说这样做没有必要，罗得西亚空军没有轰炸过任何人。总督声称，停火监督员们对空军每一架飞机的行动都进行检查，甚至在每次飞行归来后还清点飞机上的炸弹数量，不管这是属于多么的例行公事。总督的工作人员

怀疑穆加贝似乎愿意相信他的支持者们所告诉他的一切。他们说，所谓的“轰炸”是无稽之谈。另外，罗得西亚报纸报导的200张选票“不翼而飞”一事也是胡说八道。但穆加贝声称，已经有二百万张选票丢失了。

索姆斯勋爵明确表示，他将采取行动，除非穆加贝制止他的支持者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在与莫桑比克接壤的马尼卡兰省——的恐吓行为。总督宣称，恩科莫、穆佐雷瓦和其他政党全都控告说，他们简直无法在那里展开竞选，因为害怕有人进行报复。

穆加贝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反驳道：

“请注意，索姆斯勋爵，我对这种把戏并不感到新鲜。您知道吗？马尼卡兰是我的地盘，它是属于我的。是的，恩科莫无法在那里展开竞选，但这完全是因为我控制着这个地区。我在那里建立的基层体系已经有5年的历史。难道那里的人民不出来参加恩科莫的集会，有什么好惊奇的吗？难道我能跑到恩科莫的选区（马塔贝莱兰）去，并能期待在那里召集一大群人吗？我当然不可能！”

这时，索姆斯立即集中思想，重复了他在几天前发出的警告：

“穆加贝先生，我仍然要看着您，看着您停止恐吓。我要让所有的候选人和所有的政党在任何地区都可以自由地举行会议。”

总督府在这次对穆加贝的竞选道德进行攻击以后，再也没有采取同样的做法。但若说他们对待穆加贝大为尊敬了，那也未必符合实际。他们知道，对于穆加贝声称控制全国广大地区是无法抗辩的，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取消他的竞选资格。可是他们又都知道这样做只能引起一场新的战争。

然而，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而且，几周来，这种办法已经成为索尔兹伯里的白人、商人和英国人（包括总督府在内）最热门的话题。

假如穆加贝在大选中只是赢得简单多数（当时最普遍的推测是，他在新议会中获得35—40席）而没有赢得绝对多数（50席以上），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把他排除在外的联合政府呢？从理论上讲，一个反对穆加贝的联合政府，对白人、对商人、甚至对总督府中的某些人（必须说明，其中不包括索姆斯勋爵）似乎是有利的。如果这个联合政府包括了乔舒阿·恩科莫，则会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在恩科莫加入——有可能在包括穆佐雷瓦和白人的联合政府中担任总理——后，新生的津巴布韦至少可以得到两个前线国家——赞比亚和博茨瓦纳——的支持。另外，南非、欧洲经济共同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它毕竟是恩科莫的武器提供者）也会表示支持。这样就具有意义了。至少对于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际商务界来说会具有意义。

总督府中的一些高级人士不仅滋长这种思想，而且积极地鼓励这种思想。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恩科莫本人呢？也根本没有反对他们这样做。他虽然更愿意与穆加贝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但实际上却把各种选择的大门统统敞开着。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穆加贝竟然试图跑到恩科莫的地区去竞选。他预定于2月17日出席在布拉瓦约巴伯菲尔德足球场举行的集会。两周前，恩科莫曾在那里吸引了一大批人，据估计有20万。等待着穆加贝去举行集会的人约为5万，这样便使他在不久前所说的，他不可能在这一地区集中一帮人的话成了废话。但是，穆加贝最后没有露面，因为有人威胁要暗杀他。



就在这个星期天，索尔兹伯里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公报，对上星期四夜里在首都发生的一系列炸弹袭击事件进行解释。治安部队试图掩饰他们的困窘，然而欲盖弥彰，最终却使人们发现了最有力的证据，证明有人在以“卑劣的手法”，发动目标对准穆加贝及其政党的运动。案情清清楚楚：市中心的两座教堂被炸弹严重炸坏，其中的一座教堂爆炸时，还给市中心的莫诺姆塔帕旅馆造成了重大损失。当时，这家旅馆住有一些英国官员，包括约翰·博因顿。不过，谁也没有严重受伤。

同一天夜里，在哈拉雷黑人区的一座教堂附近也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确切地说，这次爆炸发生在两名投弹手的汽车后部，两名投弹手（均是黑人）被当场炸死。

警方立即宣称，他们已经得出“结论”：这是一种矛头对准基督教堂的恐怖主义运动。穆佐雷瓦主教和罗得西亚阵线党声称，这种事情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干。尽管穆加贝曾经说过在他领导下的国家，将取消基督教徒的所有假日，他也说过国家的宗教信仰将和他的无神论一样，但是，他在声明中也表示将允许有宗教自由。

第二天，在索尔兹伯里罗马天主教的大教堂旁边又发现了一颗没有爆炸的炸弹。炸弹上面写着支持穆加贝的口号。虽然这些口号是用公认为蹩脚的马肖纳语写成的，但警方立刻就辨认出这种语言是那些最强烈的支持穆加贝的地区使用的。

所有这一切都把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者。难道果真如此吗？不！

穆加贝的一些支持者抢在警察之前赶到了发生爆炸的汽车旁，并发现了汽车的牌照。

原来，这辆车的主人是塞卢斯侦察队的成员。塞卢斯侦察队是罗得西亚军队中的精锐部队，战争时期曾策划了对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突然袭击。

联合行动指挥部在星期天对这一切所作的解释非常拙劣，它公布了两位死者的名字：中尉爱德华·皮林冈多和下士摩根·莫约。至于他们究竟属于哪个分队，则谁也无法猜测。

联合行动指挥部的公报说：“现已查明，大约在哈拉雷区发生爆炸之前55分钟，皮林冈多和莫约曾打电话给值班军官，报告说发现了两名民族解放军恐怖分子。随后，两人奉命跟踪他们所发现的情况，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上司作了汇报。”

公报没有解释这两名士兵是怎样坐在那辆尾部装有炸弹的汽车里的，也没有说明他们为什么要自告奋勇地充当警察，甚至没有讲到这两名士兵在黑人区干什么，因为他们在停火期间本应呆在营房内。

穆加贝的一位发言人当晚指出，在塞卢斯侦察队受训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在一旦需要的时候伪装成游击队员。

一周后，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一个周末，索尔兹伯里街头突然出现了在中部省圭洛城出版的左翼报纸《火报》。这是否意味着出现了新的问题呢？

《火报》刚复刊不久。这家报纸在史密斯和穆佐雷瓦执政时，因为支持爱国阵线而被查禁。

报上的日期是“1980年2月12日，星期六。”当然，它没有必要在这上面露出破绽。其他的一切也显得它确有其事：刊头与《火报》相同，字体与《火报》的字体也毫无二致。它甚至还刊登了倾向于爱国阵线的报道。然而，该报的头

版头条报道却表明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火报》。这篇报道的标题是《罗伯特·穆加贝传略》。

这是一份对穆加贝严酷的起诉书，它把各种各样的罪名都加给了他——从“恋母情结”到贪得无厌、无所顾忌地追求权力。总之，它充分利用了围绕穆加贝这个名字所产生的一切荒诞说法。

“罗伯特·穆加贝是何许人也？”文章一开始就问道，“他究竟是追求自己命运的、人民的一位开明和进步的基督教领袖，还是一位残酷无情的、渴望权力的马克思主义异教徒？”

文章最后写道：“谁都不可避免地会得出如下结论：穆加贝是一位精神变态者，患有妄想症——用普通人的话说，此人神经有毛病。”

凌晨两点，在这份伪造的《火报》发行之后，平常印刷《火报》的曼博印刷厂突然发生了爆炸。毋庸置疑，制造这起爆炸事件是为了让人们认为，这是穆加贝的支持者进行的报复，因为他们看到《火报》对穆加贝进行了庸俗不堪的攻击。然而，投弹者又一次成了牺牲品——他们在爆炸时也被炸死了。被炸药烧焦了的尸体表明，他们并不是穆加贝的破坏分子，因为其中之一是白人。

在“自由和公正选举”的情况下，各个候选人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一个周末，按理应该走出去，在发表竞选演说的地方竭力向选民们致意——至少兰开斯特大厦是这样计划的。

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穆加贝依然呆在夸恩大街他自己的家中。他原计划在乌姆塔利举行一次集会，后因警察在距离会场仅仅数百码的地方发现了暗藏的火箭筒和迫击炮，他只好取消了这次集会。

恩科莫在圭洛（当时，这座城市在前天夜里曼博印刷厂发生爆炸后产生的余波尚未平息）已经进行了一场老练而又巧妙的竞选运动，不过，他在故乡马塔贝莱兰以外地区却极少能证明这一点。这天，实际竞选运动的最后一天，他准备表现出自己所有的才能，他发表了讲话。这不是一篇战斗檄文，而是一番激情满怀的证明他是罗得西亚民族主义之父的动听的演说。他自诩为统一的化身，唯有他能使大家团结一致。

穆佐雷瓦主教在索尔兹伯里，主持他的最后一次盛大的竞选集会。他的竞选也许是非洲花钱最多的一次竞选，大约使他的罗得西亚和南非老板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这一天的集会是他整个竞选活动的最高潮。集会在津巴布韦体育场举行，前后历时4天（从星期四到星期天）。组织者对所有参加集会的人免费提供膳食、住宿和纸帽。

这时，数百名观察家已经从世界各地陆续抵达索尔兹伯里，准备亲眼目睹罗得西亚的大选。他们是由各国政府、政党、甚至研究机构派来的。那些参加了穆佐雷瓦主教召开的群众集会的人学到了第一课。“我实在无法相信，”一个来自荷兰的观察员说，“此人简直是在不知羞耻地花钱购买选票。”

沃尔斯将军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度过了竞选运动中的最后一个周末。星期二早上，他象往常一样打完网球后，即同罗得西亚中央情报局的总头目肯·弗劳尔秘密飞离了罗得西亚，去执行整个罗得西亚史话中一项最富有戏剧性的使命。这很可能是总督府，特别是约翰·艾克兰的旨意。

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沃尔斯将军和弗劳尔先生前往会见莫桑比克政府的部长，讨论大选后的罗得西亚局势。其实，



他们是专程去争取马谢尔总统作出保证的——保证承认罗得西亚的选举结果，不管它多么的不理想，不管它的结果如何。作为回报，他们向马谢尔的部长们保证：如果穆加贝在大选中获胜，他们将不搞军事政变。

沃尔斯星期天晚上回家时，一大堆的文件在等着他处理。第二天早上，在离开大选还有48小时的时候，600名恩科莫的人民军士兵来到埃塞克斯维尔（靠近布拉瓦约）的一个营地报到，表示要同罗得西亚部队一起训练。恩科莫早就梦想建立一支由游击队和罗得西亚正规军组成的联合部队。他声称，这将是罗得西亚新秩序的象征，并可能除去总督府的主要心病——一旦大选结束之后如何安置这批游击队。沃尔斯接到恩科莫写给他的短信后，认为恩科莫部队的行动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是他无法肯定这是否能解决问题。他的脑子里毕竟还在想着其它事情。军事政变并非毫无可能。虽然沃尔斯不会去领导这种政变——他诚实地表示，今后不管哪个政府上台后邀请他，他都愿意效劳——但他知道他手下的那些“中层”白人军官，将会请求他赞同搞政变。此时此刻，沃尔斯简直不知道他应当对恩科莫的信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随着选举的迫近，灰心丧气在沃尔斯的思想 上占了上风。他对穆佐雷瓦在兰开斯特大厦上当受骗，在选举中将会败北——他是这样认为的——感到失望。他已意识到穆加贝会赢得大选，只是不知道他获胜的程度有多大。因此，他才同意到莫桑比克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种局面。为了发泄心中的失望，他给撒切尔夫人写了封信，请求她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但是，这位女首相一直没有答复。

在这个星期天，索姆斯勋爵对形势作了最后分析。摆在

他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在恐吓活动猖獗的地区禁止投票。他的助手已经有地图表明，在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地区只有穆加贝的党能够参加竞选。停火监督委员会的一份最新材料说，它记录在案的207起违反停火协议事件绝大多数应归咎于穆加贝的部队。罗得西亚治安部队和“土匪”（指没有进入集结营的游击队）之间接触的次数发展到了每天9至10次，为几个星期前的两倍，而且主要发生在穆加贝的家乡——东部高地一带。一些英国顾问认为，这是民盟（爱国阵线）发起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和恐吓运动。

其中有一位英国顾问解释说：“你们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8个黑人政党在设法开展一场政治运动，而有1个党却在从事半军事性质的活动。”

确实，倘若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来看，（罗得西亚）竞选中的恐吓行为已经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而且，不只是穆加贝的党有这种行为。但是，如果能考虑到罗得西亚是一个经历了7年战争的国家这样一个前提呢？

索姆斯决定——至少在思想上——孤注一掷。不管人们对大选的公正性有什么怀疑，他准备让它如期进行，而不是对大选实行禁止，以免有可能引起一场内战。

在评价索姆斯总督的作用时，我们不应该忽略总督夫人出色的工作和天生的政治才能。她不仅帮助建立了同各党领导人的关系，而且作为慈善机构的代表，不知疲倦地安排孤儿和难民。这给萨丽·穆加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5月，萨丽在给伊丽莎白·沃尔斯顿的信中写道：“索姆斯夫人对受苦受难的儿童怀有深厚的感情。她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我只是希望她能在这里呆得更长久一些。”

这天下午，总督和夫人玛丽在索尔兹伯里公众娱乐场出

席了一次教派混合仪式。参加者约有500多人，其中大多是白人。总督夫人和其他人一起为罗得西亚的和平祈祷——不管大选结果如何。

## 投 票

星期一上午，约翰·博因顿爵士和选举工作人员准备出发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严格地说，自12月份以来他们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进行着工作。他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或者说将会投票。这个问题非同小可。

据说，罗得西亚的黑人大约有700万，其中有资格参加投票的（即18岁以上的成年人，包括已经在这个国家居住了两年以上的外国人）不到300万人。罗得西亚没有选民登记册，确切地说是没有可靠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了防止有人投两次票，最后不得不采取一种简便的化学防范措施：投票者到达投票站后，必须先让安装在那里的扫描仪检查他的双手。如果扫描仪没有反应，他就可以领一张选票，同时将双手浸入一种能够反射出紫外线的无色化学物；如果他（她）试图第二次投票，扫描仪就会立即对其手上的化学物作出反应。当然，在过了3天的投票期后，这种化学物留下的痕迹便会自动消失。

全国一共设立了657个投票站，其中近一半是活动性的。一辆辆装有投票箱的卡车在农村和边远的部族地区来回行驶。每个投票站均有一名英国警察，这似乎有点儿不合时宜，其实他却是当时许多非洲人真正承认的权威人士。英国警察的任务是：确保只允许投票者进入投票站；在进入距离投票站一百码的范围后，任何人都不准再唱歌、哼小调或呼

喊具有党派色彩的口号。在当天的投票时间截止后，英国警察必须保证将票箱密封起来。如果有必要，他还必须睡在票箱旁边，以确保选票不被人作弊。

星期二一大早，大规模的空运开始了。数百万张选票，数千个投票箱以及数百架扫描仪，从索尔兹伯里运往全国各地投票站。飞机是由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提供的，流动卡车是罗得西亚人的，每辆卡车都有乘坐防地雷车辆的治安部队加以保护。谁也别想存有侥幸心理，至少沃尔斯将军手下的所有官兵是这样。星期二早上，凡是能够出动的士兵和警察统统外出执行任务。军警的休假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已取消。这天，沃尔斯将军又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后备军人——不管是年老还是年少。为了大规模地、高度明显地显示安全，他总共动用了6万人。在首都索尔兹伯里，凡通向市区的路口都设置了路障。路障专门有警察看守、部队保护，其中有一些甚至还配备了重炮。载有警察和士兵的一辆辆卡车在全市各区巡逻，步兵负责守卫电台、电视台和各部行政大楼等要害设施。在索尔兹伯里大学的校门外，甚至还停放了一辆坦克。自去年12月民族解放军和人民军的军官回国后，他们一直住在这所大学。

在广大农村地区，部署了由辅助分队作后盾的数千名民兵，每个居民点大约数十人。配备加农炮的装甲汽车在各个部族托管地缓缓行驶，遇到村庄便停下来，以便让村民们知道他们在执行任务。

据联合行动指挥部在下午4点报告，这一天平安无事，治安部队和“土匪”之间，没有发生接触。



## 转折点

下午3点30分，穆加贝与穆南加瓜·尼亚贡博和奥蒂尔小姐一起来到了总督府，总督的私人秘书在门口迎接了他们。

“总督希望单独见见你，”他对穆加贝说。

“单独见我？”穆加贝疑惑不解地问道，“什么……您是说我不带秘书？”

“是的……只能您一个人去。”

“我想您会在场吧，”穆加贝说道。

“不，只有您和索姆斯勋爵两个人。”

穆加贝走进了接待室，总督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他把穆加贝领进了自己的公办公室，然后关上了门。

索姆斯总督开门见山地责问穆加贝为什么迟迟不让他的部队进入恩科莫的部队正在同罗得西亚人一起训练的营地。穆加贝否认他一直在“拖拖拉拉”。他说，他希望尽快开始合并部队，并说一俟与总督的会谈结束，即去会见约翰·艾克兰。

尔后，穆加贝迅速改变了话题。他说，警察几天来采取了“无中生有”的做法。他声称，在过去的一周里，大约5,000名他的支持者已被警察拘留。索姆斯勋爵对此不以为然，但既然穆加贝已提出了所谓恐吓这个问题，他就随口责问民盟（爱国阵线）在竞选中又表现得如何。“我不会忘记这个问题，”总督对穆加贝说，“您必须知道，你们的人所进行的恐吓，在这次大选中是一个多么大的因素。”

穆加贝没有回答总督的指责。

索姆斯总督接着说。不过，他不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某个地方禁止选举，或者在某个地区剥夺选民的选举权。

他说：“我认为，所有各党都参加这次大选是最有利于罗得西亚的。”

穆加贝也许会感到很高兴，但是他没有表露出来。在正儿八经的话题谈完后，总督问穆加贝有什么计划，对今后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穆加贝略略思索了一会，解释说，他当选之后不会立即进行激进的改革，不会对工业或土地一概实行国有化，也不会驱逐白人。他希望白人能留下来。他说，如果没有白人，经济就有可能崩溃。他还希望沃尔斯将军留任，以减轻白人的担忧，并希望从他自己的部队和爱国阵线的部队中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接着，穆加贝谈到了独立问题。他说：“如果我当总理，独立不该来得很快。我们需要假以时日，索姆斯勋爵，……而且，我很希望您能尽可能长久地留下来。”

总督对此表示感谢。他说这一愿望可以考虑。一个小时后，穆加贝离开总督府，前往艾克兰那里讨论部队的合并问题。

“再见，罗伯特！”在穆加贝离去的时候，索姆斯总督直呼其名地对他说道，在此之前，双方在接触中从未用教名称呼过。“再见，索姆斯勋爵！”穆加贝答道。

这是一次至关紧要的会谈，无论是穆加贝还是索姆斯，后来在回顾这次会谈时都把它称为他们关系中的“转折点”。这次会谈之所以重要，虽然有着一系列因素，但以下的事实绝非一般：无论索姆斯还是穆加贝，当时都不怀疑究竟谁会担任总理。

半小时以后，穆加贝在总督私人秘书的陪同下走向他的汽车。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选举和有关选举的计划。在秘书与他握手告别时，穆加贝胸有成竹地说：“我将赢得56席。”

这天夜里，正当穆加贝和其他各党的领导人在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发出最后号召——他们的讲话是事先录好音的——的时候，一辆银灰色的奔驰轿车，在夸恩大街穆加贝的寓所前停了下来。当穆加贝的卫兵看清来人后，便不停地向汽车挥手致意。

原来，沃尔斯将军应穆加贝的请求驱车来到了这里。沃尔斯告诉穆加贝，如果他当选，将不会有军事政变，穆加贝请求沃尔斯，在他当选后继续担任武装部队司令职务。

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的黑人区，选民们从午夜起就开始排队等候投票了。到清晨5点，哈拉雷中心投票站前的队伍已经有半英里长。人们不时高呼一句党的口号，穆加贝的一些支持者甚至在队伍里蹦蹦跳跳，手舞足蹈，并且模仿民盟的象征——小公鸡啼叫。拂晓时分，各市镇出现了装有高音喇叭的汽车，提醒人们前去投票。

早晨7点，全国各投票站按时开放。在城市里，人们急匆匆地赶在上班之前就去投票。但在农村则比较悠闲，因为那里的许多人不得不等到流动投票车到了以后方可投票。然而从头几个小时的投票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参加这次投票的人数将会很多。

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比如，布拉瓦约有位妇女，发现她在选票上划叉时划错了党派后，便把选票揉成一团，塞进了自己的乳罩。然后，她又偷偷地溜回队伍的末尾，企图再次投票。结果，她被当场抓住，并被带到一位法

官那儿接受训诫。

还有一位出租汽车司机——也是在布拉瓦约——用一辆贴满了支持恩科莫的标语的汽车，把人们带到投票站，他自以为这样做完全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

使选举监督员们真正感到吃惊的是，各主要政党都接受了邀请，派代表前往恐吓行为最严重的地区观察投票情况。至少在大选这一天，投票看来是符合自由和公正这个标准的。比如，在东南部的奇雷齐，由穆佐雷瓦、恩科莫和西索尔的代表——其中有一些人违反规定张贴标语——聚集在该市的主要投票站旁，观察人们投票，然而，这批人中没有一个曾在那里进行过竞选，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民盟（爱国阵线）的报复。

这里是穆加贝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多年来，战争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穆加贝的人可以宽宏大量地容忍反对派。

“我告诉我的支持者别去理睬他们（反对派），”穆加贝在奇雷齐的主要候选人纳尔逊·马维马说，“他们愿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他们在这里不可能获胜，毫无可能！”

到投票第一天的下午中段，大约有100万人投了票。据观察员们说，投票时几乎没有发生恐吓情况，人们只是表现得心情激动和情绪良好。

索姆斯先是亲临哈拉雷区观察选民投票，然后回到总督府去作另一项决定。这时，他已经在期待大选以后的日子——3月4日，下星期二，大选揭晓那天。

进驻游击队集结营的英国停火监督部队大约有三百人，他们被数千名武装的游击战士包围着。这些人对大选结果——不管什么样的结果——的反应是无法预料的。



约翰·艾克兰坚持认为，在大选揭晓之前应将大部分停火监督部队撤出，由罗得西亚部队取而代之，尽管人数可以少一些。他觉得，如果有必要的话，只要留下少量监督部队——所有人都凭自愿——维持和平即可。

艾克兰在他的士兵中德高望重。这些士兵虽然同大多数战士一样不信任政治家，但是他们对于艾克兰却毫无怀疑。他们普遍相信，如果情况不妙，艾克兰就会把他们撤出去。这便是当初保持停火监督部队的士气和活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现在，艾克兰想把他的兵马撤出游击队集结营，因为他觉得，如果大选结果否定了监督部队所看管的游击队的领袖，让他们统统处于危险境地是毫无道理的。

沃尔斯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在大选揭晓的前一天悄悄地、谨慎小心地向游击队集结营进驻一小批他的部队。根据周密制定的计划，如果有必要的话，六名停火监督部队的士兵——大多已同游击队建立良好的关系——将在大选揭晓那天同沃尔斯派去的部队呆在一起。

在大选揭晓的前夕，英国少校在民族解放军的一个最大的营地内，向记者们概要介绍了上述计划。他说：“如果情况不妙，我们的人就全部撤到山坡上去。我们已经在那里部署了足够牵制他们一、二个小时的迫击炮。然后，我们的直升飞机就能飞进去了。”

据埃迪森·兹沃布戈解释说，穆加贝希望修补尼雷尔和马谢尔之间在选举的有效性问题上出现的裂痕。仅仅两天前，尼雷尔声称英国将使选举有利于穆佐雷瓦，而马谢尔则坚持认为这次选举将是有效的，不管其结果如何。其实，马谢尔有费尔南多·翁瓦纳在索尔兹伯里向他简要汇报情况，而尼雷尔则一个人也没有。

艾克兰十分恼怒。他说，穆加贝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告诫他的人安分守己。总督的工作人员同艾克兰一样感到很气恼，尤其是当他们在马普托与马谢尔核实时，发现总统的访问不是他自己提出的，而是由穆加贝主动邀请的这一情况以后。

于是，穆加贝再次遭到了总督府中一些最高级人物的怀疑和不信任。

周末的时候，恩科莫陪同艾克兰视察了他的游击队营地，向士兵们清清楚楚地下达了命令。然而，视察民族解放军营地的却不是穆加贝，而是西蒙·穆增达。那里的气氛显然已经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最后投票的是驻扎在各营地的游击战士。星期五晚上，各投票站一律关闭，投票箱被陆续空运回索尔兹伯里。星期六早上，计票工作正式开始。

这时，所有的人——索姆斯勋爵、约翰·艾克兰、乔舒阿·恩科莫、穆佐雷瓦主教——都在焦虑不安地等待着选举结果。是的，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似乎唯独穆加贝例外。星期天，他从坦桑尼亚乘飞机回到罗得西亚时，对记者们说：“总督将义不容辞地挑选我组成政府，这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我们是否会在选举中赢得多数。”

## 获 胜

最初是根据有关情报——党的耳目和选举专员所透露的风声，他们已经看到计票情况——进行推测。到了星期一下午4点，也即在离大选揭晓还有17个小时的时候，索尔兹伯

里的800余名记者终于得到了一个严酷的消息：穆加贝获胜了。而且，他的胜利是压倒性的，以致没有必要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光是在索尔兹伯里，民盟的人就看到25万张选票是穆加贝的，而穆佐雷瓦的选票仅有5万张，恩科莫的选票则更少，大约只有2.5万张。在马尼卡拉和维多利亚两个省，穆加贝获得了全胜。他甚至还赢得了恩科莫原以为能取得好结果的中部省。

兹沃布戈象往常一样，为新闻界提供了原话。他在走进索尔兹伯里中心米克莱斯旅馆的新闻中心时，预言穆加贝在新议会中可以获得60个席位。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在于我们是否会获胜，而只是在于我们获胜的程度有多大……对此谁也不必大惊小怪。”兹沃布戈说道。

他甚至得以对恩科莫表现出宽宏大量：“我们希望他加入我们的行列。恩科莫先生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遭受了痛苦。他是我们大家的祖先。”

当兹沃布戈在向恩科莫首次表示敬意时，索姆斯总督的办公室分别给沃尔斯将军和穆加贝打了电话。总督要求他们和他一起，在当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呼吁人们在第二天保持平静。

索姆斯总督首先发表了讲话。他说：“这是津巴布韦庄严的时刻，决不能出现任何形式的暴力或暴力反应……我们的目的是将权力有条不紊地转交给一个稳定的政府。”

接着，沃尔斯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呼吁大家保持安静，保持和平，不要产生仇恨和抱怨……但若谁不听劝告，就会立即受到有效的对付。而且，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将非

常积极地去对付！”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穆加贝。他说：“让我们团结一致，携手并进！让我们对获胜者和失败者都表示敬意！”

本来，这可能已经算不上什么高潮——穆加贝毕竟已经知道自己获胜——然而他还是决心亲身体会一下其间的每一分钟。翌日上午9点前，穆加贝和萨丽以及数十名支持者——穆增达、恩卡拉和特克雷等同志——坐在夸恩大街穆加贝家中的电视机前，翘首盼望着计票结果。有几位姑娘——都曾跟随穆加贝去过马普托、日内瓦和伦敦——不忍观看了。但是，萨丽还是强迫她们坐了下来。

上午9点整，约翰·博因顿开始宣布各党在新议会中所获得的席位：恩科莫的党20席——在场的人一片欢呼；穆佐雷瓦的党3席——在场的人一阵嘲笑。民盟（爱国阵线）的席位到最后才宣布。

穆加贝等人仅仅听到了“57”这几个字，后面的话全被欢呼声盖住了。萨丽当众紧紧拥抱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而穆加贝则独自呆愣了片刻，他似乎被自己获胜的程度惊呆了。

“我的心在怦、怦、怦地直跳。”他一边说，一边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部。

突然，响起一阵电话铃声。电话是索姆斯总督的秘书打来的：“10点钟来，行吗？”

萨丽兴奋地走到门外，同数十名聚集在夸恩大街收听新闻广播的人站到了一起。当穆加贝前往总督府时，萨丽在街头欢乐地跳起了舞蹈。

在索尔兹伯里以东大约200英里的福克斯特罗特游击队



集结营，罗得西亚黑人和白人士兵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块小小的阅兵场上。场地四周是一个个帐篷，这些士兵刚在里面度过第一夜。他们是前天傍晚到达这里的，随后便在离游击队主力约500码的地方支起了帐篷。指挥官告诉他们不要紧张，可他们就是做不到。

在离大选揭晓整整十分钟的时候，驻扎在营地内的6,000名民族解放军战士中的大约一半行军到了一块巨大的训练场。“稍息！”指挥官首先命令道，说罢立即掏出收音机，转动天线，以获得良好的接收效果。几十名战士肩上扛着卡拉什尼科夫式步枪，聚集在他的周围收听。广播里先是报告了恩科莫的爱国阵线、穆佐雷瓦的统一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和西索尔的民盟所获得的席位数。

接着宣布了民盟（爱国阵线）的获票结果……全场顿时欢声雷动。指挥官花了整整十分钟时间，才使战士们平息下来。

“穆加贝主席万岁！”指挥官带头高呼道。

“万岁！”战士们用震耳欲聋的声音附和道。

爱尔兰警卫队少校蒂姆·珀登站在一旁观看着。“谁会想到……”他不无感慨地说道。

在索尔兹伯里、布拉瓦约和乌姆塔利等一些主要城市，有些白人儿童上学时，家长让他们带上背包，准备在上午9点穆加贝获胜的传说证实后离去。有些白人丈夫给妻子打电话，告诉他们作好去南非的准备。在各家银行、矿业公司和行政部门，辞职书象雪片一样飞来。房地产中间商多年来一直在忙于白人的出走，这天早晨，他们在市场上出售的房屋达数百间。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骚动，穆加贝仍然准时赶到了总督府。对于总督来说，如果这时向穆加贝表示祝贺未免有点不合适，因为他想，撒切尔夫人自会在英国下院这样做。但是，保守党同罗得西亚白人一样感到忧郁。很明显，撒切尔夫人在这一天尽量不在公开场合表示祝贺。她的一位议员说：“我只知道和平比子弹可取，不知道它们的效果相同。”索姆斯勋爵只是同穆加贝握了握手，然后招呼进他的房间。随同穆加贝去的有伊诺斯·恩卡拉。这位候选人在大选中被总督取消了竞选资格。

“我想您不会认识恩卡拉先生吧？”穆加贝对总督说。

“啊，是的，我不认识。”总督随口答道，“恩卡拉先生，最近我好象没有听到您发表很多讲话。”

即将成为津巴布韦财政部长的恩卡拉并未感到其间有什么风趣。他在马塔贝莱兰没有获选。他对总督说：“您使我丧失了议席。”

穆加贝在一旁勉强地笑了笑，心里感到一阵紧张。接着，他和总督单独进行了谈话。这位获胜者对总督大加赞扬。他说，索姆斯勋爵一向品格高尚。穆加贝以前并未想到总督真会允许大选“顺利进行”。

“我们大家必须携起手来，进行合作！”穆加贝说。

索姆斯勋爵告诉穆加贝，在他晚些时候向全国发表讲话时，给人以这种印象将是非常重要的。在后来的45分钟里，穆加贝和总督经过认真商议，拟定了广播讲话的初稿——没有写在纸上，而是印在穆加贝的脑子里。

“如果我处于您的地位，”索姆斯勋爵对穆加贝说：“我将这样做……”

会谈结束时，穆加贝说道：“再见了，克里斯托弗，谢

“谢谢您！”

接着，恩科莫来到了总督府。他显得疲倦不堪、垂头丧气，两眼泪水汪汪的。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使在场的所有人默不作声，确切地说是使大家感到愕然。“您给他们一人一票，看他们怎么办！”恩科莫伤心而又愠怒地说道。

恩科莫对穆加贝及其单独竞选的决定怨气甚大。他说：“我们本来应该一起进行竞选……可是罗伯特把我甩了。”

索姆斯勋爵递给恩科莫一杯烈酒，但恩科莫仍然不能得到安慰。

“我年岁太大了，不能再喝这种东西了”。他怏怏不乐地说道，“我打算退出政界。”

这天上午，总督府的最后一位访客是穆佐雷瓦主教。当他的副手西拉斯·蒙达瓦拉拉博士开口指责恐吓行为时，穆佐雷瓦对他厉声说道：“住口……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对索姆斯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对落选者进行迫害！”

## 生命 线

在各个黑人居住区，庆祝活动持续了一整天，而在白人居住的郊区和农场，则是震惊和沮丧的气氛持续了一整天。不过，到当晚八点时，全国似乎又集中到了一起，收看或收听新当选的总理发表演讲。

一位表情相当呆板的白人女士在电视荧幕上介绍说，他就是“罗伯特·穆加贝同志”。也许，这是唯一可能使人感到担心的时刻。

实际上，这位“残暴的共产党恐怖分子”、这个曾经说

他掌权后将处死伊恩·史密斯和被伊恩·史密斯指责为“腾云驾雾的妖魔”的人，是一个能言善辩、富有同情心、富有思想、尤其是善于调和的人。

“就我们的愿望来说，我们无意利用所占有的多数来迫害少数。我们将确保每个人在这个国家都能享有一席之地。我们希望确保获胜者和失败者都有一种安全感。”穆加贝坚定地说道。

他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愿望——建立一个包括白人和恩科莫在内的、具有广泛基础的联合政府。

他逐步地减轻了那些认为他的上台意味着他们离去的人的种种忧虑。他一点一点地谈到了对他们的政策：

对企业界人士：“我们决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搞国有化。”

对白人文职人员：“我们将保证你们的退休金和职业。”

对农场主和房东：“我们将尊重你们的财产权。”

对全世界：“津巴布韦决不会依附于任何国家，它将严格地奉行不结盟政策！”

他甚至对南非表示：“我们主张和平共处。”

“让我们采取宽恕的态度，忘记过去的一切！让我们携起手来，和睦相处！”穆加贝最后呼吁道。

到星期三上午，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那些已经提出辞职的人大多宣布撤销辞职决定。数百间准备出售的房屋也不再出售了。

伊恩·史密斯甚至发展到称穆加贝是一个讲究实际和敏感的人。他说：“罗得西亚人懂得了在危机中生活，他们将认清这一点。”



一个星期以后，穆加贝开始部分履行他的诺言。沃尔斯**确实**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恩科莫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两名白人被吸收进他的内阁。

以下两种选择是大胆和勇敢的：伊恩·史密斯在罗得西亚阵线党中的老盟友戴维·史密斯被任命为商业部长，白人农场主联合会主席丹尼斯·诺曼被任命为农业部长。这是穆加贝作出的最终妥协，也是穆加贝的现实主义政策的最终表示。土地是穆加贝进行战争的理由，为他的人民争得土地始终是他的目标。现在，他让一位白人掌管农业部。这个部将监督充分利用国家的一切土地，而不是立即从白人手中没收土地，然后把它们分给农民。

3月底，萨丽·穆加贝给伊丽莎白·沃尔斯顿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她在上面写道：“是的，我亲爱的伊丽莎白，我们终于胜利了，终于获得了和平。悠闲自在地漫步在索尔兹伯里的街头，真是太美了！现在，所有的人都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但是，难道因为战争带来了和平，就意味着是一桩好事吗？”

## 第八章 新 生

### 新生的国旗

1980年4月17日午夜，津巴布韦在鲁法罗体育场的一片欢呼声中再生了。午夜12时整，场内欢声四起，不断高涨，非洲大陆上的最后一面英国旗终于被降了下来，代替她的是新生的津巴布韦的国旗。这面国旗由绿色、金色、红色和黑色条纹组成，其中绿色代表土地，金色代表矿物，红色代表洒下的鲜血，黑色代表人民。庆祝典礼上没有演奏国歌，因为穆加贝坚持要谱写一首恰当的国歌，不愿草率敷衍，所以这时他们还没有国歌。

独立庆典之前，总督府里出现了一幕相当奇怪的情景：在总督举行的鸡尾酒会上，象彼得·沃尔斯和肯尼思·卡翁达这样一些宿敌与（英国）查尔斯王子、萨丽·穆加贝和玛丽·索姆斯等人聚集在一起。现在，在鲁法罗体育场的主席台上，一批似乎更不可能站到一起的人，正在将这个由白人统治了89年的国家的权力正式移交给非洲人。

在场的有穆加贝——他几乎不得不强迫自己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卡南·巴纳纳牧师——新生国家的第一任总统，索姆斯勋爵——他既高兴，又为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发生流血和大动乱的国家的总督而感到宽慰，查尔斯王子——他虽然参

加过许多次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但从未见过象今天这样的独立庆典，还有首席法官赫克托·麦克唐纳——他穿着一身长袍，头上戴着假发，显得神采奕奕。

“根据津巴布韦宪法第二十八章的有关条款……”麦克唐纳在巴纳纳总统宣誓就职时说道。一些在场的人——麦克唐纳的话使他们回想起这位大法官以前宣判时的情景——说，听到里这，他们几乎在期待他接下去说：“我命令你伸出脖子上吊，直到吊死为止！”。

在索尔兹伯里这个狂欢的夜晚，穆加贝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讲话，其主旨是：言归于好、重建国家。宽容大度，尤其是仁慈博爱。

他在谈到索姆斯勋爵的时候说：“我必须承认，我是那些最初根本就不信任他的人之一。然而，最后我不仅暗示出信任他，而且非常喜爱他。”

接着，他把话题转向了他的全体人民。他庄严地说：“如果我在昨天曾把你当作敌人进行战斗的话，那么，今天你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朋友；如果昨天你曾仇恨过我，今天你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使你我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热爱。”

所有的达官贵人在讲话中又补充了穆加贝所遗漏的地方。查尔斯王子说：“治愈过去的一切创伤，使之健康完整，消除一切分裂，使之重新团结，克服一切敌意，使之重新和好，是在你们这个独特的国家，进行重建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最良好的基础。”

英国女王在致穆加贝本人的贺信中说：“现在是各种族和具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人民，忘记过去的怨恨，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的时候了。”

## 压力和考验

第二天，当津巴布韦醒来的时候，各报报道了全国各地载歌载舞的庆祝活动，报纸还刊登了“悼念”专栏。一对白人夫妇撰文对他们的儿子表示悼念。他是“在一年前的今天——1979年4月18日的一次行动中被打死的……谁也不知道失去你意味着什么。我们常常百思不解。难道这一切什么也不为吗？”

这是在津巴布韦独立以后的几个月里，许多罗得西亚人——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向穆加贝提出的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里，穆加贝受到了各种巨大的压力——既有来自他自己党内和军队内的，也有来自象恩科莫和彼得·沃尔斯这样一些他以前的老对手的。

穆加贝他那温和的、和解的说话声，从来没有颤抖过，但是，维持这种说话声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因为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都被迫去试图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始终不断地去讨好所有的人。

不过，这也是事实：穆加贝在仅仅经过了一年——一个极端困难的年头——之后，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大大加强了地位。

穆加贝执政时，受到三个方面的威胁。当然，也可以说是有可能使他垮台的三种因素：内战，他和恩科莫之间的分裂，以及将使他的经济计划成为泡影的白人大规模出走。但是，现在一切迹象表明，穆加贝在这三个方面都在赢得胜利。

我们不妨以游击队和游击队所始终构成的内战的潜在威



胁为例。兰开斯特大厦会议为游击队在停战和竞选期间找到了安身之处——游击队集结营。但以后如何安置他们的问题，则始终没有着手解决。好几个月来，他们一直被留在集结营内，使他们感到心烦意乱，焦虑不安。他们不禁在问：他们这些进行了战争的人将从和平中得到些什么？游击战士大多希望留在军队里，然而他们之中仅有数百人而不是数千人有可能会被编入新建立的国民军。于是，暴力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有些集结营，如索尔兹伯里东北部姆托科镇附近的“X射线营地”，游击战士擅自控制了姆托科周围的主要公路，任意袭击民用和军用车辆，并杀害镇上的警官和农民。数月来，政府在追查那些肇事者和杀人凶手时，表现得无能为力，或者说勉勉强强。甚至在加强集结地的纪律方面也都是如此。

穆加贝早就知道会发生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且，在白人看来，他所采取的行动只是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罢了。1980年9月，穆加贝将大约17,000名游击战士（其中大多数是效忠于他的人，但也有一部分是恩科莫部队的）转移到了奇通威扎临时膳宿处。这地方距离索尔兹伯里市中心仅仅15英里。在游击队住地的四周，竖起了高大的栅栏，出口处均有卫兵把守。游击战士外出时，卫兵便命令他们交出武器。不多久，恩科莫的部队便同穆加贝的部队打起了仗。只是在当局派去重兵和加强了警察力量之后，才防止了在索尔兹伯里的门前爆发一场公开的武装冲突。

但是，同年11月，在布拉瓦约的街头爆发了一场公开的战斗。两支对立的部队，为了控制另一个类似奇通威扎那样的临时膳宿处，进行了24小时巷战，结果至少有55人被打

死，200多人受伤。穆加贝亲自下令新组成的国民军陆军和空军前去维持和平。

从表面上看，布拉瓦约之战，与到此为止发生的所有冲突一样，对穆加贝造成了损害。其实不然。这些冲突是穆加贝走向自我保存的又一步。他同游击队的问题，始终在于怎样解除他们的武器，怎样让他们抛弃卡拉什尼科夫式步枪、掷弹筒和迫击炮。游击队驻留在临时膳宿处时，他们至少无法带着武器外出。在布拉瓦约武装冲突之后，穆加贝有了相当充分的“政治借口”，命令国民军去收缴游击队的所有重武器。

自独立以来，驻索尔兹伯里的部分西方外交官不止一次地断言“穆加贝已经远远地走在他自己的人民和我们的前面”。

而且，总的说来，穆加贝还设法走在乔舒阿·恩科莫的前头。一些西方观察家早就认为，恩科莫有可能会促成战争。他在这次大选中遭到的失败，比其他任何人都惨重。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确实无法相信他已经在竞选中失败了。他勉强地接受了内政部长的任命，尽管这一职务使他获得了一个权力基地，能够控制警察。他虽然遭到了穆加贝的一些激进分子，如伊诺斯·恩卡拉等人的辱骂，仍然坚持不同穆加贝领导的政府发生公开冲突。

恩科莫心里有数，如果发生冲突，他获胜的可能将微乎其微。他那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也许能占领一些城镇，但他们将会面对一支人数多得多的军队，而且这时政府又建立了空军。主要是这种严峻的前景，迫使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寄人篱下。当他党内的9名党员，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其实应该得到他这位主管部长的同

意——遭到逮捕后，恩科莫不无感慨地说：“我感到自己象一个摆在橱窗内的装饰品。”

那么，白人——穆加贝非常强烈地要求他们留下来——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在执政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穆加贝每月平均失去一千多名白人。到了1980年年底，白人出走人数有所增加。许多人在等到自己的孩子学年结束之后便扬长而去。总之，白人的出走率足以同战争高潮时期相匹敌，这种情况可能是穆加贝所不喜欢看到的。

但是，当穆加贝在具体分析究竟谁出走了、以及他们的出走在技术工人队伍中留下了什么样的空白等情况时，他得到了不小的安慰。原来，那些离开津巴布韦的白人大多是退休人员。以独立后头三个月的情况为例，穆加贝在“经济上发挥积极作用”的人员中，失去了以下一些白人：工程师28名、电工21名、生产主管人19名、男教师8名、木工3名。但是，他在同期内净赚了一批医生：每次来的人比离开的人多一个。

然而，正如穆加贝所非常清楚地知道的那样，他没有理由感到骄傲自满。但这也是事实：如果白人的出走率按照现状继续下去，他就可望在5年以后拥有一支坚强的白人核心力量，大约80,000人。

也许，对穆加贝的最大威胁，是由他过去的朋友、对手和敌人所组成的不稳定的和脆弱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是他在3月份的时候拼凑起来的。

私下里，穆加贝承认，如果他保持这一联合，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事故。”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彼得·沃尔斯和埃德加·特克雷——它的联合政府中的两个对手、分属两个极端派——会包括在里面。

沃尔斯在去年（1980年）7月的引退，并未使人感到吃惊，因为他早已宣布他打算一旦有机会就这样做。

但是，下述情况严重损害了穆加贝正在设法加强的脆弱的联合政府：沃尔斯说他应该引退，并且相当清楚地说明，他对穆加贝的领导，几乎不信任和不抱任何信心。也许，沃尔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体现穆加贝的决心：让白人感到他们可以忘却过去，继续留在他领导下的津巴布韦。如果沃尔斯这位头号敌人可以与穆加贝和睦相处的话，那么，其他所有的白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现在，沃尔斯退出了联合政府，而且他还是以故意损害他的方式离去的。后来，在沃尔斯接受记者采访时才知道，在3月份这位将军的军队内部有人起哄，要发动政变推翻穆加贝时，他甚至试图让英国政府宣布这次大选无效和作废。

这时，穆加贝不仅失去了一位对于他推行和解政策至关重要的白人，而且他自己党内的一些激进分子，还在要求对“白人的这种背信弃义”进行惩罚。穆加贝以沉痛的心情，解除了沃尔斯的职务，并在9月份将他流放到国外。这是失败的象征，它也许只是同某一个人交往时的失败，但是这一个人会对所有的白人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沃尔斯辞职后，特克雷案件又足以使白人相信沃尔斯对这个国家新的统治者所暗示——他没有明确地说过——的一切。

一位白人农场主遭到了暗杀。这件事本身并不会在新生的津巴布韦震惊任何人。自从大选以来，这类暗杀事件时有发生。但特克雷本人被指控领导了对白人农场一所住房的袭击，这一事实，只能为史密斯政权多年来最大的怀疑——“恐怖分子”的目标是搞“种族屠杀”制造根据。因为特克雷是



政府的内阁部长，民盟（爱国阵线）的动力和穆加贝的一位心腹。

对于穆加贝个人来说，这既是一次沉重打击，又使他感到大失所望。特克雷在1974年跟随他逃离了津巴布韦，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年月里，他一直和他一起在莫桑比克的克利马内，并忠心耿耿地帮助他维护领导地位。现在，特克雷将因谋杀罪而不得受审。这无论是对于特克雷本人，还是对于穆加贝和他的政府，都是一种羞辱，使他们非常窘迫。

“现在我看上去已经不象是一位部长了。”特克雷在被捕以后说道，“我一直在进行战斗！”

穆加贝意识到了特克雷所发的牢骚，他也清楚地知道党内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他和他的政府过于温和、过于调和和过于讲究现实，而激进却表现得不够。

如果特克雷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大多数人所预料的——无疑会加强穆加贝对他的党的控制。在特克雷离去后，穆加贝可以挫败党内那些招惹麻烦的左翼人士。没想到，特克雷最后被宣判无罪，这使他成了对穆加贝更加强大的威胁，而且也是对他希望赢得白人（他们认为特克雷获得了杀人的许可证）信任的严重障碍。

特克雷领导着党内的激进派，他在家乡维多利亚省建立了牢固的权力基地，并且享有民族解放战争设计师的声誉。这一切使他始终显得有可能成为穆加贝的接班人。现在，特克雷在受审和被宣判无罪之后，比以往更有可能成为接班人了。

如果说那些进行过战争的人期望在革命政权中获取头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恩科莫希望在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说象特克雷这样的人迫不及待地要求进行激进变革的

话，那么，千千万万曾经在大选中投了穆加贝的票，从而使他执政的非洲人，则在等待得到他们应有的报酬。也许，全国700万黑人的期待危机现已成为穆加贝的最大威胁。

黑人们希望立即就有收获——或者是增加工资，或者是得到更充分的就业。革命毕竟是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的，甚至在穆加贝出任总理之前，索尔兹伯里的黑人就已行使罢工权。在伊恩·史密斯统治时期，他们始终未能获得这一权利。现在，各工厂又展开了另一场战斗：不是为了工资或工作条件，而是为了黑人工人的代表权。穆加贝领导的民盟（爱国阵线）在试图控制工会组织。在此之前，这些组织一直是由那些与前政权勾勾搭搭、并支持这一政权的人控制的。

对于整个津巴布韦人民来说，穆加贝没有能够制造出立即见效的灵丹妙药。确实，他的目标对于他来说太遥远了，以致想都不敢想。他在一月份离开莫桑比克之前的日子里，就已认定了以后将会面临的棘手问题。毫无疑问，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安置数百万由于战争而流落他乡的人民。

在穆加贝接管这个非洲大陆同类国家中最富裕的津巴布韦时，救世军曾对它以后将会面临的贫困问题发出过警告：

“如果一年之内对这些人无所作为……饥馑、疾病、孤儿、遗弃儿童、酗酒成性和暴力犯罪的现象，就会比比皆是，从而将影响到全国所有的人。”

## 求实精神胜利

但是，穆加贝在一年之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居住在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难民营的22万津巴布韦人重返了家

园，成千上万的人重新回到了部族托管地。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头一年的玉米收成良好。但是，全国许多地区的生活仍然还很贫困。

穆加贝一再说（他还提出了一些正当的理由），如果国际社会打算让其年轻的革命政权自立的话，那将是非常困难的。早在上台之前，穆加贝就已同60多个国家的政府进行了接触，请求它们提供帮助。然而，它们的反响使他大失所望。西方对他发出的制定一项“小型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呼吁置若罔闻。

即使是象英国这样一些承诺提供援助的国家，最后也被它们本国的经济状况拖了后腿。由于索姆斯勋爵大力支持穆加贝发出争取外援的呼吁，白厅曾答应给穆加贝提供1.8亿美元，以帮助津巴布韦进行重建。

然而，它几乎就象当初作出承诺那样迅速地成了伦敦财政部推行紧缩政策的牺牲品。英国在提供了第一批援助之后，其余部分因为国内经济衰退，不得不拖延了3年多时间。

美国人由于国会设置障碍，提供了大约3,000万美元。美国国会对穆加贝可能会采取的方向非常谨慎。联邦德国、荷兰和瑞典人也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他们的援助保证只囿于一年。总之，国际社会所作出的各种反应，远远没能满足穆加贝的需要。应该说，以下的事实是对和平的一种讽刺：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它们对自己的行为自豪无比，而实际上它们给予津巴布韦的援助，即使与基辛格博士在1976年的第一个英—美建议中所提出的1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相比，也差得很远。

面对这种情况，穆加贝依然表现得相当坚定。不错，他

曾暗示津巴布韦有可能成为一党制的国家；不错，曾有不少人推测他可能会没收白人拥有的土地。但是，穆加贝关于建立一党制国家的设想是与专制统治大相径庭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收土地也不过是一种无稽之谈。

穆加贝本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在去年9月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所概述的原则：

“民盟上台时，我们感到这是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时刻，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刻，是发扬和解和宽容精神的时刻，而不是进行惩罚和报复的时刻。我们不得不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全面和平，而不是眼看着我们的国家滑进内部冲突和持续战争的深渊……我们必须本着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享自由独立和集体负责、团结各方的精神。”

在这次联大会议上，还有人问穆加贝——昔日“精神变态的刽子手”、“吃人的恶魔”和“恐怖分子”——是怎样转变为今天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温和派人士和政治家的。穆加贝的回答是证明他自己是一个人、一个政治家。他说：“我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我并没有去做变形手术。实际上，是那些曾经把我视为‘极端分子’、‘杀人犯’、‘精神变态的刽子手’……的人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这些人不得不进行这种变化。我依然故我，过去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

面对等待着他的危机，穆加贝能否坚强如故，这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的为难之处在于：如果他从白人那里夺取的东西过多，他们就会扬长而去。

“但是，如果他给予黑人的东西过少，他们就会起来造



反。”用一位曾经在兰开斯特大厦和罗得西亚竞选期间与穆加贝共过事的英国外交官的话来说，这种情况叫做“走钢丝”。在津巴布韦独立以后，穆加贝不得不走这条钢丝。

而且，他还不得不在这条钢丝上继续走下去。也许，在他赢得只有白人才能给予他的经济独立之前，他是无法摆脱这种窘境的。

谁也不应该怀疑他对事业的忠诚，问题只是在于他能否为自己赢得足够的时间。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